

炎黄春秋



开国反腐第一案全景写真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高层决策追记

省委书记

叛徒

烈士

？

拒绝尊号的康熙皇帝

4
—
'94

总第26期



开国反腐第一案全景写真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高层决策纪实

自 50 年代以来,没有哪两声枪响象处决刘青山、张子善那样回萦得如此久远,没有哪一桩大案象严惩刘青山、张子善那样使人永远难忘。

本文以翔实的材料、全新的视角详尽披露了刘、张走向自我毁灭之路的全过程,追记了处决刘、张高层决策的始末。

叶剑英与古典诗词

叶剑英同志,半个多世纪以来,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具有时代特点的革命诗篇。他的诗词篇,深受文人学者、社会名流,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也不乏青年的推崇。

省委书记——叛徒——烈士——?

三十年代初,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陈治平,被叛徒出卖而叛变,投到蒋介石营垒,当了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要职。解放前夕,又因反蒋而饮命。临刑高呼“共产党万岁!”他是叛徒?是烈士?至今未敢定论。作者以他经年研究所得,客观地把陈的心理素质,深层动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剖析,让广大读者来评量这一人物的归宿。

根之深——李政道与中国

李政道是祖籍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是获得这一奖金年龄最小的人之一。文章生动地披露了李政道从幼年时起即经历千辛万苦,刻苦读书,钻研科技的动人事绩。李政道得到诺贝尔奖金的殊荣后,不忘祖国,为帮助中国培养科学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

深入虎穴的特殊将军

“解放西南第一功!”——这就是刘伯承元帅代表党和人民对刘宗宽深入虎穴、完成特殊使命的褒奖,他也就此而引以为一生的光荣与欣慰。

编者寄语

人是靠什么站立的?不是肢体,而是思想。鲜活的思维是生命之海上的冲天排浪,它可以使人生诡奇美好,多姿多彩。

刊物是靠什么站立的?不是靠哗众取宠的噱头,而是靠扎扎实实的内容中所折射出来的一种气势,一种精神。有了这种气势和精神,一本刊物才真正有了魂魄。

创刊以来的《炎黄春秋》力图把握的是这样一种气势——以古文化的视角回顾过去、关注现实、瞻望未来,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聚拢起所有黑头发、黄皮肤的炎黄子孙;政见的差异、信仰的不同均不应妨碍这一聚拢;一种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求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力求发表的每一篇文字都情之殷殷、言之凿凿,道人生之真谛,还历史以原貌。

有了这种气势和精神,《炎黄春秋》必定会在她的生命历程中,为煌煌 5 千年的中华古老文明,留下一部可资借鉴的信史。

“干将虽利,非人力不能自断”。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除了编辑部同仁殚精竭虑以外,还要靠广大读者与作者的支持与监督。本刊欢迎一切严肃认真的文字,面对道听途说、编造成篇的文章则坚决反对之,一经发现,即予揭露,以维护刊物的声誉,保障读者精神消费的高品质。

4 月到了。“山深四月始闻莺”,希望您能听到我们真诚的心声,也希望这心声能带着我们对广大作者与读者的感激与问候,传遍祖国的每一块热土,每一方蓝天……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张 镔 李 庄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善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丁洪章

总编辑: 洪 炉

总经理: 徐 孔

副总编: 刘家驹 杜卫东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石福生

责任校对: 尉颖颖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 码: 100802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出版日期: 每月20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编辑部电话: 6016633-227

定 价: 3.20元

特稿

④ 开国反腐第一案全景写真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高层决策纪实

罗先明

求实篇

- ②① 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如何激起政治风波……吴晓梅
- ③⑧ 农村「四清」:十年动乱的前奏曲——一位老记者亲身经历的严酷现实……杨克现
- ④③ 《黄药眠现象》一解——有感于黄药眠九十诞辰纪念会……黄大地
- ④④ 《黄药眠现象》——复黄大地的一封信……文怀沙

英杰谱

- ④⑥ 叶剑英与古典诗词……张廷栋
- ④⑨ 大将许光达和他的娃娃亲……纪流
- ⑤④ 耿飚在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头……石雷

目 录

春 秋 笔	同根结	神州录	古镜台	文荟园
②9 省委书记——叛徒——烈士——？ ——记陈治平将军的曲折人生…… 童乃元 ⑤8 深入虎穴的特殊将军…… 石湾 ⑦0 西蜀沉戈——罗广文将军起义纪实…… 谢谷 祁人	⑧3 根之深——李政道与中国…… 顾迈南	⑦7 原始村遐想…… 王守义	⑧0 拒绝尊号的康熙皇帝…… 彭云鹤	⑤7 林语堂与马…… 杜文彬

《炎黄春秋》1994年 第5期

目 录



- △当代女包公
——刘丽英
- △冯玉祥将军的戏剧人生
- △西伯利亚，
一个中国囚徒的诉说
- △邓小平就是这么个人
- △人民币怎么了？
- △军阀韩复榘不是草包
- △他们创造了中国第二次核打击力量
- △享誉世界的女艺术家
——吕无咎
- △郭沫若和鲁迅的笔墨官司
- △“文胆”陈布雷之死
- △军阀政客与风水迷信



开国反腐第一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高层决策追记

自五十年代以来,没有哪两声枪响象处决刘青山、张子善那样回萦得如此久远。

没有哪一桩大案象严惩刘青山、张子善那样使人永远难忘。

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桩反腐败大案。尤其令人震惊和叹服的是,就在刘青山、张子善这两名特大贪污犯应声倒地的前三年,毛泽东同志在党

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声若洪钟地发出警世之音,谆言告诫人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十分有趣的是,毛泽东同志向全党严肃告诫时的说话地点西柏坡,离处决两名特大贪污犯的刑场保定



案全景写真

●罗先明

市仅相距二百余华里。伟人洞幽察微的眼睛确能透过时空,看到由于场景的转换而可能出现的新的险情。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当年作为党的重要文件下达,当时已担任党内一定领导职务的刘、张二人,无疑是看到和学习过这个重要文件的。为何他俩最终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只有一种解释:两人对毛泽东同志的告诫置若罔闻。

物换星移,在人民共和国已成长为参天大树的今天,枝繁叶茂的长青树内是否又起虫害?对这些败坏共和国肌体的蛀虫该如何处置?又一个洪钟般的声音对此作了回答:“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

一、面对死刑判决,两个特大贪污犯均表

示：我没意见

历史牢牢地记住了这一天：1952年2月9日。地点是河北省公安厅临时看守所。刘青山、张子善分别被关押在两个小房间内。

年初的天气总是那么寒冷，冀中平原广阔的土地几乎全被冻硬。刚刚降下的大雪还没完全融化，这儿那儿残留着斑斑点点的白絮。好在春天的气息已经弥漫开来，地底积存的热气已开始往外蒸发。田畴向阳的地方，小草已顽强地伸出了针尖似的嫩芽，向人们报告寒冬的威胁马上将彻底解除的消息。

选择这个时候宣布刘青山、张子善二犯的死刑，或许是残酷的，谁不希望多多呼吸春天的空气！却又是意味深长的，他们所犯下的罪孽，不正象残雪那样终将要被彻底铲除么！

刘青山、张子善临刑前。照例先有一顿丰盛的晚餐。但这不是刘、张这两个曾经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人物所感兴趣的。

他们是不大不小的政治家，重视的是告别人世之前有关的政治行为。

一个人走进来了，走进关押张子善的小平房。

“同志！”张子善几乎不能自己，张口就要喊出这两个字来。体态文弱的张子善，生就一副白面书生的容貌，粗略看去，很难想象他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关押期间的物质生活虽超过一般犯有重罪的人员，当时珍贵的鸡蛋等营养品都能供给，但这些又如何能补偿他灵魂深处受到的重创？于是这本来就有点文弱的未来的历史著名人物，更显得瘦弱了。

“你坐，坐下。”来人的情绪似乎受了感染，忙抬手让张子善坐下。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来人的身份是省委某负责人，代表河北省委，代表临时法庭，代表正义之剑，代表广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然而你可知道，张子善在两个多月以前，和来人还是实实在在的“同志”关系，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在同一张会议桌上对某些重大问题付诸表决呢。

眼下，两人的地位反差竟如此之大。

小平房是暖和的，火炉烧得很旺。但是张子善的身子仍止不住发抖，穿得再多也没用。他刚刚坐下，又马上站起，泛青的下巴轻轻颤动着，牙齿“咯咯咯”磕得很响。

他已经预感到，决定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而且是凶多吉少。

太年轻了，37岁，这是人生的正晌午时分呀！倘若工作的时间延至70岁，即还有33个灿烂的岁月呀！张子善的眼光不由越过省委代表的头顶，移向门窗紧闭的户外。

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

他的神志是清楚的，小桌上面，还有他没写完的补充交待材料呢。他从被羁押之后就不停地写呀写呀，写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以此保持心态的平衡。应该说，张子善对于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还是有正视的勇气的。

主审人肩负的担子是沉重的，不管怎么说，面前的这个人自己的老熟人。“省委、省委……”主审人坐在桌子的另一面，说话忽然有点结巴起来。

张子善的脸色开始变化，热血似乎全涌了上来。但他还能控制住自己，咬住嘴唇道：“说吧，我……听着呢。”

“省委决定，华北局批准，开除你的党籍！”

张子善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对这个决定早在意料之中了。如果说象他这样的人还能够留在党内，那共产党还叫作共产党吗？

况且，既然是省委的决定，且经过华北局批准了，自己还能再说什么呢？

“我无意见。”张子善很快回答。

“还有，还有……”主审人的发音又开始堵塞。

“还有什么？”张子善两手紧抓住桌沿。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主审人拼尽全力，几乎是喊叫起来。

“……”张子善张大嘴巴，喘着粗气，一个字也说不上来。

这是一种令人窒息般的沉寂，多少东西包含在这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及时提出警告，号召保持并发扬谦虚谨慎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图为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

可怕的沉寂里。已经无法了解此案的当事人张子善当时的真实思想了，或许他在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8个字之后，脑子里便变成一片空白。不过他毕竟是个有着丰富思想、顽强意志的人，据可靠的史料记载，这个历史人物在神志正常之后，对主审人断断续续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我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无意见。这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因为我罪恶深重。

我无什么挂念。我××在村里任支部副书记，和区委宣传委员关系不好，这点请党注意。

我毫无意见，请转告省委、华北局、中央，这样处理我很感激。第一不骂党，第二不喊“共产党万岁”。

和省委说一下，处决我自己，留下青山。

……

主审人努力保持满脸严肃的表情，嘱咐随行者将

他的话一一录下。消瘦的张子善因为好几天没刮脸了，所以脸显得更黑。看着张子善眼里的泪水欲流又止，主审人有点出乎意料，原来有关领导估计，张子善在听完对他的判决词之后，会无理哭闹一番的。

今天的读者，读着这些令人心悸的文字，人们自然会想起那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古语。但张子善临刑前的忏悔，却和他被捕之后所接受的一系列教育有关。1951年11月29日清晨当公安人员逮捕他时，他曾像无赖似的又哭又闹，拒不接受省委的决定：“为什么抓我？我有什么罪？”后来他面对被揭露的种种犯罪事实，联想到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培养和厚望，才终于低下了曾仰得高高的头颅，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确实不可饶恕。

抓捕张子善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且引用中共中

央华北局 1951 年 11 月 30 日给中央的报告原文。

关于逮捕张子善的情况报告

中央：

兹将河北省关于逮捕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情况报告转报如下：

薛迅同志(当时的中共河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笔者注)归来后,当夜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华北局意见,已于本月二十九日晨七时半由公安厅将张子善逮捕。方式是: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后,把张子善叫到省委机关,常委会正式向其宣布省委决定。张开始哭闹表示拒不接受决定,经反复说明、批评,最后安静下来,十时随陆××到公安厅,下午情况反映尚好。张表示沉默,但自觉问题严重,仍应对其警惕严防意外。

……

华北局

三十日

张子善的样子长得像白面书生,其实出身十分贫寒,在老家河北省深县一个偏僻的小村里长大。他的父亲去世很早,母亲拖着病歪歪的身子把他们哥儿仨拉扯大。两个哥哥因为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故发誓勒紧裤带送弟弟上学念书。从小聪明的张子善一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劲儿,还真为母亲和哥哥挣面子。高小毕业后,他考入了县里办的乡村简易师范,并在那儿开始了不平凡的由革命者到贪污犯的特殊生涯。

也许是因为有满肚子话要说,也许是觉得笔头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也许是自知来日无多,得抓紧时间把自己的人生轨迹描画下来,任凭后人评说。张子善打从被收审之后便写个没完没了,发黄的土黄纸上留下了他一行行工整秀丽、颇有点女性味道的字迹。他既写自己,也写别人,但说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笔者有幸接触了这些原始材料,从他最初的交代材料到最后的几页,分明看到了一个罪孽深重者由开头的遮遮掩掩到后来彻底缴械的心理变化过程。

他在给当时的河北省某领导的信中痛切地写道：

××同志：

你现在能赐予点时间吗?我已伤痛到万分!不耻的我,犯了滔天之罪,虽非自愿、自主所为,但这又如何向党、向人民说呢?我已知党和人民不能宽恕我,我也不

愿逃脱对我的惩处;但愿党和人民知道我是怎样走向了绝路,接受此教训,以巩固党与人民的胜利!

我现在渴望能见你们一面,不知能否赐予?盼示复。

孽生 子善

(十二月)十四日

张子善在同一天又写道：

伤痛!万分的伤痛……

党允许的话愿能一谈,我已伤痛到万分!!

伤痛,伤痛,满纸都能见到这两个带着血泪的字儿。这无疑是他内心真情的独白。

和学生出身的张子善不同,长工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的刘青山,当年表示服法是另一种方式。当主审人向他宣布开除党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时,他除表示服法外,只提出一条:“我还有一句话,我的孩子上学问题。”

他得到的答复是什么?是这个曾经在敌人面前无愧英雄称号的大贪污犯所出乎意料的:

“你不用管,孩子是国家的。你想的还不如组织想的周到。你放心,你犯了法,孩子未犯法。”

泪水,泪水,刘青山剩下的只有泪水。很难分解这泪水中所包含的复杂成份。但从他在这以前回答法官的讯问中,可窥一斑:

……自己错了。省委快把材料整理整理处理算了……在反贪污浪费的今天,拿我当典型,处理我算了,以教育全党。南方北方干部认识我的不少,把干部教育一番,在历史上说也有用。

刘青山长得和张子善有些不同,高大粗实,更多一点当时通称的工农干部的味道。这在五十年代,是非常吃香的。刘青山自知对革命确有功劳,故说话办事大大咧咧,骂人训人时常有之。但他又是豪爽的,很少拐弯抹角,要拿就拿,要吃就吃。“老子拼死拼命打江山,享受点算什么”,这话他不仅表现在行动上,而且挂在嘴边。最后一旦知错,认帐也就不再含糊。

但我的心情同样是复杂的,当审讯人员问起他在天津被捕的情况时,刘青山一声三叹,确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慨:

……在天津带铐子,唉!想起过去被敌人逮捕,手腕上留下的痕迹,这一戴我想呀!二十年来怎么着来!

当时想,算然(了),耐怎么着去吧!革命这些年没死了,怎么落这下场?算然(了)……,党对自己培养关怀,自己过去对党不错,今天……今天我是等着了。现在我没考虑,听候党的处理。

我没有求饶的必要!死还要什么价值呢?

当刘青山在与外界严格隔离的小平房里反省自己时,这个从来就不习惯于安宁的灵魂,变得格外烦躁不安。他拿起一支铅笔,在一张土黄纸上写下几行要求和省委领导见面的文字,那字体粗硬得就象用短粗的树枝架起来似的:

××同志:

我来这里已十几天了。仍在病中,肚痛,心中发跳发闷,同时对问题有时想不通,也影响着身体和病。

你能否抽空详谈一下给我指示个出路?

×同志,我在你直接领导十几年,你不要放却(对我)的关心和教导,就是死前,我也希望你教导我。

另不谈。

敬礼

青山(1951年)十二月十五日

无法考证刘青山和张子善写的、要求与省委领导会见的条儿是否送达有关领导手中,因为现在的档案材料中没有记载。而这两份材料后来都装订在卷宗里,无疑说明两人对省委的态度,都还是相当信赖的。他们有话要向党组织说,就象普通死囚中的绝大多数人希望临死前能见一见自己的亲人一样。

罪大该死,死而无怨,这就是两个特大贪污犯临刑前的心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和教育,他们对被判处极刑已有了心理准备。且不说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中央处理“刘、张案件”怎样由衷拥护,从罪犯本身亦能感觉到这一断然措施的绝对必要性。

于是,我们不能不想起,当判处刘青山、张子善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作出后,毛泽东同志在答复为刘、张说情的某高级干部时说过的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952年2月10日下午1时许,在河北省保定市东关大校场上,“砰砰”响起两声石破天惊的枪声。两口子事先准备好的紫红棺木做了刘、张二犯的最后归宿,而

处理该案所形成的强烈的冲击波却不可能随同入土。

二、老百姓骂大街,却何妨地委专署发大财

1949年初冬,三十岁出头的“革命功臣”刘青山,雄心勃勃地到新组建的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走马上任。

与如今某些在和平环境里运用种种手段谋得高位、而后疯狂掠夺的蛀虫们不同的是,刘青山确有过不同寻常的革命历程。

那是1934年秋天,河北蠡县县城暴发过一次农民起义,但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时为日本侵略者在关外东三省横行霸道的黑暗时期,退到河北省内的几十万“东北军”如同大山般压在农民头上,形成官逼民反之势。蠡县起义失败后的第三天,敌人就对被俘的19名游击队员开始了集体大屠杀。

这是北方一带的地方反动政府对付农民革命者的特殊镇压工具——铡刀。情景是够惨的,几十斤重的铡刀躺在地上,锋利的刀刃闪着寒光。一个革命志士被五花大绑地押过来,然后就地按倒,脖子被横搁在寒光浸人的刀刃上。刽子手握紧刀柄,闭上眼睛使劲往下一铡……手段之毒,比法国大革命时代发明的“断头机”残酷多了。东方式的野蛮和世界其他各地的野蛮没什么两样。

刘青山就是那19名被俘的游击队员之一,眼看就要遭到身首各异的悲惨命运。但是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一口气铡死了18名革命志士的刽子手们,当见到这最后一名“叛逆”竟是个稚气未脱的小毛孩时,便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这么小的孩子也会造反?大概是弄错了吧。刘青山也趁机“叫屈”,说自己的“冤情”。于是已累得筋疲力尽、鞋帮都被鲜血浸透的刽子手们,便稀里糊涂地将刘青山当场释放。

刘青山走进革命队伍时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一股立志打江山的慷慨之气。他要翻身,要自由,要过上好日子。为了这些,他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与其不革命饿死累死,不如闹革命和地主老财拼他一个死。前者死得窝囊,后者死得英勇。这对于祖祖辈辈的血管里流动的都是农民血液的刘青山来说,道理再明白不过了。凭着这股劲儿,他在死里逃生之后,很快又重新找到了共产

党,找到了武装的工农红军,继续那眼睁睁倒在他脚边的烈士们未竟的事业。

刘青山象一只猛虎,见到敌人就想往前面扑。

刘青山象一团烈火,跑到哪儿就能在哪儿熊熊燃烧。

这正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所需要的勇士呵,没人勇敢地冲锋陷阵,敌人那毒焰四射的机枪如何能够变哑?带着血色的胜利的战旗如何能够插上敌人的营垒?于是,猛将刘青山在纷飞战火中一次次逃过死神的追捕,并一次次得到升迁的机会。他以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筐的雇工的身份,一步步升任冀中区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等职,随后又调任举足轻重的天津地委书记。

做为一名当初确系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人物,党组织对刘青山委以重任,可谓受之无愧。不过这位1931年年仅15岁时入党、险些在敌人铡刀下丧生的农民英雄,骨子里却和李自成手下那位“牛丞相”一脉相通,他拼死打天下的目的,是为了安然享天下。什么“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他心目中事实上就只有这一步路。地委书记,好大的官儿,鞍前马后的警卫员就有两个。体壮气粗的刘青山见到的地委机关,却是几排普通的灰砖房,办公费也不够开支,享受个球!粗话连篇的刘青山狠狠地咒过之后,小脑袋一钻轱辘,立刻生发出一条妙计,大搞“机关生产”,广拓生财之道。

何谓机关生产?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百业待举,满目疮痍。刚刚建立的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广大民众同处在举步维艰之中。为了缓解暂时遇到的财政困难,带领人民重建家园,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提出机关可适当开展生产活动,弥补财政之不足。这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借用现在的语言,可否称之为“预算外收入”!

而刘青山的所谓“机关生产”,却远不是那么回事,这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便看得出来。搞!大搞!如今政权在手,机关生产还不好办?刘青山本是祖祖辈辈搞生产出身,这“生产”二字岂能使他为难。况且祖辈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搞生产,而现在他刘青山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搞生产?这才叫“今非昔比,鸟枪换炮”呢。

当刘青山决心大搞他的“机关生产”时,且不说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分子怎样的敌视包围

之中,光是天津地委所辖的11县3镇,就足够有责任心的父母官们操心焦虑的了。由于天津专区位于河北省中部与京津两大城市之间,正当海河下梢,故而该地区老百姓被1950年夏天的一场大水闹得痛苦不堪。而刘青山做为天津地委的第一号人物,脑子里灌得满满的却是:一旦地委大院的“机关生产”兴隆起来,我这个机关首长……嘿嘿!刘青山聪明的脑瓜里立刻勾勒出一幅花天酒地的绝妙蓝图。

很难说张子善是不愿在省委机关做文秘工作,还是看中了刘青山描绘的“机关生产”辉煌前景,总之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张子善坚决放弃了省委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躊躇满志地来到天津专区,与动不动骂街的刘青山互为搭档,充任地委副书记兼专员。于是这对臭味相投者沆瀣一气,充分运用刚刚从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派那儿夺取的人民民主政权的高度权威,干起了自己的罪恶勾当。

现略述他们的霸王之道。

不是说天津专区14个县镇暴雨成灾,数百万民众在泥淖饥饿中辗转挣扎吗?刘青山、张子善一眼便看准了这一着妙棋。原来,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省里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决定以工代赈,组织数十万民工整治河道,为此免费下拨大批补贴粮款。而在刘、张的心目中,这居然成了发财的机会。刘、张二人合计过后,当即将本已由专区供销合作社承担的这块“肥肉”抢过来,成立了一个直属于“机关生产管理处”的“河工供应站”。“这是政治需要,必须由地委直接管着”——拉大旗作虎皮,谁敢吱声则个!继而刘青山跑到“供应站”双目圆瞪:“给老子净赚三十个亿(合新人民币30万元)!”可怜饥寒交迫中的治河民工怨气在腹,敢怒而不敢言。其间一次决堤事故就致使数人淹毙,而他们的地委书记和专员却采用以次充好、哄抬物价之法,口中夺粮,苛剥民工粮二百二十万斤。刘青山还甚不满意,因为只折合二十二亿元(旧币)。

1950年10月,中央指示在天津专区境内的武清县杨村修建飞机场,为此拨款二十九亿元,其中含占地移民费用。刘、张贪心大动,竟将其中二十亿元挪用,投入“机关生产”。至于因不能及时安顿而流离失所的移民们,则早被摒弃于刘、张的视野之外。

忽一日,刘、张宠幸的“私生子”——机关生产的骨

干企业电线厂缺钱买铜，张子善立即挥笔批道：“可无息借款……”借谁的去？借国家明令专款专用的水利经费。而且，张口就是10亿、20亿，倘不滥操权柄，焉有此举？

1951年，省政府人事局拨给天津专区干部家属救济粮17.5万斤，折款一亿七千五百万元。其时，不少干部家属捉襟见肘，贫病交加。但是对不起，刘、张二位却已经脱贫致富了。“借钱生利，干！”两个巴掌一合拍，款值一亿四千万的救济粮便作了“机关生产”的流动资金。

还有更叫人瞠目结舌的，刘、张竟敢勾结私商，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军需物资。千万不要忘记，那时东邻朝鲜还是一个大战场，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正在炮火纷飞中饮冰卧雪。这两个蠹贼为了中饱自肥，居然与奸商张文义（女）紧密勾结，出具盖有专员公署大印的公文，令手下人与之合伙，倒卖国家最为紧缺的马口铁。奈何张文义无情无义，趁机大作手脚，反而使刘、张这一对“患难兄弟”赔进几十亿元之巨。刘、张二人不甘罢休，又派人打着为灾民造船的旗号，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前往东北套购木材，高价转卖给本地灾民，从中疯狂渔利。

……

一百七十一亿六千二百多万元巨款，这数字在全国人民都处于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的建国初期，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你看过电影《上甘岭》，就会对当时的国际环境和物质贫乏有深刻印象。我们还不能忘记，全国军民为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一分一厘地捐钱捐物，购买军用物资运往前线的情形。刘青山、张子善两人身为党政大员，无疑在各种大、小会上都发表过许多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老百姓捐这捐那。据查，当时的河北省委还接二连三地转发天津专区的“工作经验”，推广全省。一份刊名叫《河北建设》的河北省委的机关刊物，大力推广“天津经验”，短短几个月里，就发表了五六篇此类文章。

刘青山、张子善深知这种“机关生产”是见不得人的东西，故而在启动“生产机器”时没少设各种“机关”。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动辄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用以压人。请想想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威望之高吧，而刘、张二人则巧妙地将这些威望转化为资本，加上政权所

有者固有的权力，一古脑儿派上用场。这就是刘、张二犯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盗窃、贪污、挪用国家巨额资财成功的秘诀。说奇不奇，所使的一切手段，哪一条不与权力相联？

他们经营的“机关生产”规模有多大？据刘、张身陷囹圄时统计，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天津地委机关生产管理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象吹猪尿泡似的迅速膨胀起来。计有9个工厂，1个招待所，人员在1000人以上，资产达二百七十亿元（旧币）。其中有电线厂、铁工厂、建筑公司、转盘窑、化学厂、木材厂、面粉厂、米面厂等等。资金总计260亿元到270亿元，从业人员超过1000名。本来还有汽车制造厂、农药厂等重大项目待建，可惜未及实施，二人便落入樊笼。

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忙煞两位书记、专员。于是刘青山借口养病，干脆从1951年2月开始离开地委大院，钻进天津市马场道一栋漂亮的小洋楼，遥控指挥起机关生产来，成了名副其实的脱产专业户。什么党的工作，什么灾民困难，统统放在一边。他在小洋楼里一边品尝着“机关生产”的硕果，一边继续筹划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俨然是一位精于生意之道的集团公司总裁。张子善则在机关紧密配合，该他出面的马上出面。

这还是中央提倡的那种原来意义的“机关生产”吗？分明是不折不扣的“官倒”与“官商”！权商结合，害莫甚焉，刘、张二犯早就提供了最好的实例。

张子善对于自己的“病情”，是十分清楚的。趁着组织民工生产赈灾来发财，这和过去的反动政府“发国难财”有什么两样？所以在对他进行审查初期，这位聪明的书记大人极力躲闪：

“一时想不起来”；“记忆不好”；“事先不知道”、“……”

以后，审讯员要求他正面回答：“你（对刘青山克扣民工）同意不同意呢？”

“我基本上没反对。”

“到底同意吗？”

“开始不同意，后来勉强最后同意了。当初不同意，但也没从政治原则反对。另对这样大的问题没检查，×院长这次给我谈理，才知道赚二十二亿。”

在以后的又一次提审中，读过很多书、也懂得很多伦理观念的张子善，扬起瘦长的脸，如实坦白“机关生

产”得以奇迹般发展起来的秘密了。

—总的原则：见钱就抓，见人就拉，违法乱纪。

——资金来源：乱抓是基本方法，违法动用公家粮款是主要来源（共列 11 个项目），招纳勾引别人，利诱、欺骗、硬要、乱抓。

——生产经营管理人员来源：除去区内与合营生产之机关调派之干部、人员外，一般工人、普通人员多为招雇，而有生产、经营技巧之人员，则多为非法私人“勾”“拉”“吞”“挖”而来。

——经营方面违法乱纪情况（略）。其中一项则以政治任务为名，成立河工供应站，行机关生产之实。

刘青山，先是对“机关生产”的问题不以为然，后来不得不交代了成立河工供应站、批准蜕化干部张××身穿解放军制服、佩带解放军符号去东北贩卖木材等罪行。

笔者根据接触的材料，不能不说刘、张二人在最后认罪时，态度是真实的。这两个曾在中国共产党内受过多年教育的人，似乎确有愧对党的培养教育之心。但我又不得不说，当初他们在使尽各种伎俩大兴“机关生产”之妖风时，完全明白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一旦发现，后果难以料想。他们是知法犯法。

这就是他们的悲剧！

这也是绝大多数违法犯罪者的悲剧！

三、上书，抗争，铁盖子终究有揭开之时

刘、张这两个“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的“公仆”的罪恶行径，从犯罪之日起就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抵制和控诉。

请听听泥泞雨中治河民工喊的号子：“拼着命干哪，吃不饱饭哪，咳！”“地委专署发了财，坐好车，看大戏哪，咳！”

请看地委一般负责干部和张子善面对面的抗争：“这样做不行哪，老百姓会骂娘哪！”

当刘、张二人要挪用水利专款时，专署建设科极力反对：“借给财政科可以，不能借给（机关）生产管理处。”

地委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眼看刘、张二人日复一日胆大妄为，顾不得“分裂地委”的大棒，也奋起指控了。有一位领导干部趁着春节期间张子善外出，调阅机关生产账目，指出要缩小经营范围，严格财务制度。

还有的部门干部忍无可忍，使着法子和刘、张两人过不去，给他们“软钉子”碰……

刘、张拍案大怒，岂容后院失火！

对民工们的怨言是不屑一顾的，且莫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两位“人民公仆”干脆不去工地，只遣那一般干部敷衍了事。正是由于天津地委、专区主要负责同志对民工的生活漠不关心，因而使得许多必要的物资供应都跟不上去，导致河堤决口，发生一次淹死 7 名民工的惨剧。对这一惨剧的发生，根子明显在刘、张身上，而事后的处理却是刘、张安然无恙，被遣去当差的一般干部倒了霉，做了“替罪羊”。刘、张既有抓“替罪羊”的看家本领，于是对民工们的怨言，自不当一回事了。

而对于机关后院的反叛力量，刘、张的态度就迥然不同了。

1950 年下半年，地委、行署机关遵照上面的指示，开展过一次“民主运动”。干部们一边看着领导者的脸色，一边小心翼翼地充分肯定书记、专员卓越贡献的同时，提了点不痛不痒的建议。斯斯文文的张子善表面装笑：“好，好，欢迎，欢迎。”过后却不当一回事。他为何不把这些提意见的打入另册？因为那些意见实在称不上什么意见，伤不着他的任何毫毛。而当机关干部们实在看不过去，提出的意见稍稍升温时，张子善立刻敏感地觉察到“势头不好”，于是在机关干部会议上厉声训斥：

“你们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党委意见不一致不能向上反映！”

“过组织生活，所有机关干部都好好过几次组织生活，谁也不准请假！”

“有话还用得着你们说吗？锅我不知道是铁打的？”

张子善的工作作风还真够细致的，有时突然叫某某某送来“党员组织生活记录本”，他要亲眼看看，上面记了些什么。

数九寒天，狼牙大棒，把机关大院顷即收拾得鸦雀无声。而对那个敢于过问机关生产帐目（这本是刘、张自划的军事禁区）的负责干部则另有新招：先支使他去治河工地，再遣去党校学习。直到该同志无法安身被逼调走，刘、张才算去掉心腹之患。

另有一名地委委员，在地委会上提过几次意见，说法非常委婉，尽量考虑刘、张的承受能力。

“你对他的意见是怎么个看法呀?”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呀?”

好招数,这种对其他地委成员一个一个“征求意见”的方式,不是最好的“思想动员”吗?言外之意是:必须和某某人划清界限,否则……下文就不必再说了。

于是那一名地委委员被“光荣孤立”,最终请调。

除了“打”的一手,还有“拉”的一着。刘青山是个粗人,对谁封官许愿总是赤裸裸的,而且他过于看重物质利益,有时不免失之简单。而张子善则不愧读了那么多书,肯动脑子,因而在这方面特别善于捉摸。请看看他的戏法:

“不错,好好干,和地委一心一意,将来肯定会有前途的。我包啦!”

“你们那儿的情况怎么反映不上来呀?想对地委封锁消息?来吧,欢迎你随时谈。”

“我已经把你的表现各方面都向省里汇报了,好好干吧。”

“我对你关心的,问过好几次了。只是某某某……你得留点神。”

他们还有更具体细致的关怀。那轰轰烈烈的“机关生产”,不是创造了大量利润吗?这些利润,便成了刘、张自由支配的特大号“小金库”。他们从这些利润中,买些钢笔、茶缸、毛巾、牙刷、牙膏、肥皂、刮脸刀之类的东西,做为赏赐给“忠顺臣民”的赠品。

为了保持赠品的荣耀,他们在馈赠时总显得很神秘:

“这是我送给你的,一点小意思。不要对其他同志说了,以免产生误会。”

“听说你最近生活上比较困难,特找你来聊一聊。东西不多,你就没必要在其他同事中间扩散了。”

大棒加胡萝卜,说简单也很简单。但那是五十年代初期,刚刚从水深火热中得到拯救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恩戴德之情几乎达到宗教崇拜的程度。

于是,在天津地委和行署机关,阿谀奉承之风盛行,直至演化为小范围的个人崇拜。

“向我们的英明领袖张专员致敬!”

“在英明领袖张专员指导下前进!”

如此等等的口号,居然在地委机关的集会上公开冒了出来,现在读之何等滑稽,当年人家呼喊时竟眼里

满噙泪水。

粗俗鲁莽的刘青山,犹嫌别人的吹捧不到火候,干脆披挂上阵,自封了一顶“刘青山思想”的大红帽:“我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

网罗密致,刀斧俱列,看你小小一个地委行署机关方寸之地,还能生长出异己来?

但偏偏总有些不怕事、爱向上反映意见的好干部。

原天津专区财委办事员王某,在财务开支的问题上与张子善发生冲突,不满意张的许多作为,即成了张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王坚不屈从,于1951年8月5日直接给省委写信申诉:“……究竟张子善同志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我认为从个人成见出发的(其具体事实面诉再谈)……以上问题在文字上实难诉清,其中有好些问题未说或没说明白;再者除对我个人这一问题外,还有其他较重大问题,未在此申诉书上写,故要求亲去省委面诉……”

此信对于刘、张二犯来说,不啻是一颗引爆的炸弹。虽说王某掌握不了他们的核心机密,但谁知省委听其面诉之后,会采取何种动作?好在此信依照当时的组织原则,得由地委转交(其实这种“转交”方式就是他们的私货),张子善便将王某的申诉信打入冷宫,直至东窗事发。

另一位副专员李某,在组织“河工供应站”、挪用水利专款、勾结私商倒卖军需物资等方面,和刘、张二人发生严重冲突。怎奈刘、张分别是地委、行署的一号人物,且将其他大部分地委委员牢牢控制。李某孤掌难鸣,只得要求调动。而调动之路亦被刘、张二人巧妙地堵死,真可谓走投无路了。李某被迫于1951年10月走进省委大院,向主管组织和纪检工作的薛迅同志直接上告。

作风严谨、党性很强的薛迅,虽是个女性,却具有比一般男性更为刚毅的风格。她不声不响地听完第一遍之后,沉思良久,才缓慢地反问道:“你说的都是事实?”

“我可以向党保证。”

“那好,请你再把主要方面重述一遍。”

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谈话,一方代表省委,代表权威,代表希望,另一方即代表地委机关中的反对者。风险是明摆着的,如果李某反映不实,则他必须承担“诬

告”的罪名。但还有另一种情形,即便李某说的一点不假,倘薛迅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把举报详情向刘、张泄漏呢?

窗户关闭了,屋里听不到别的任何声响。李某挺直腰板,一句一顿地又说了一遍。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薛迅一只手压着笔记本,一只手“沙沙沙”飞快地写着,脸色越来越黑,似乎就要发作。但是她始终克制着,不可感情用事。

送走李某后,薛迅摊开笔记本,把刚才记下的谈话要点又看了一遍,开始在屋里踱步。

刘、张二人,职别不低,和她几乎相当。

刘、张二人,功劳不小,档案上都有记载。

刘、张二人,神通不小,省里有好些老领导老上级。

刘、张二人,根子不浅,河北是他们工作多年的地方。

冀中无山,但刘、张二人,堪称够份量的两座小山头。

她坐在硬木椅上,用指尖蘸着口水,把笔记本的前几页翻看了一遍。那上面记的,是省委近期有关会议的精神。而省委的会议精神,来自华北局,来自党中央。

“啪!”她最后将笔记本一合,然后小心地放进口袋,拍拍,毅然向省委负责同志的办公室走去。

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如果李某的揭发检举还带有某种偶然性和盲目性的话,薛迅的举动便有了强烈的计划性和自觉性。她脚步虽轻,却很快震动了整个冀中,整个华北,乃至整个中国。

刘青山、张子善营造的铁桶王国就此炸开一个窟窿;李某的揭发控诉引起了河北省的高度重视。

河北省委何以对李某所谈倍加重视?难道他们在此之前对刘、张二人的罪恶行径毫无所闻?原来在这一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确定为解决财政困难的五条办法之一。稍后的10月23日,承受过失去亲子之痛的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庄严号召:“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

“多行不义自毙”,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挥金如土的大贪污犯总算赶上了。

待薛迅同志向省委常委汇报后,一个精干的、较高规格的纪律检查组立即奔赴天津地委机关。

检查组的行动暂处于保密状态,调查的范围也极小。尽管这样,天津地委被调查的干部们仍提心吊胆,生怕扳不倒刘、张这两棵大树,反而将自己这一棵柔弱的小草给压折了。就连主动向薛迅同志反映情况的李某,也一再叮嘱省检查组的同志替他“保密”。

从1951年10月中旬到月底,调查组先后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先后找了几十个对情况比较了解且比较正派的干部,或小型座谈或个别访问,总算对刘、张二人的情况有了粗浅的了解。1951年11月2日,省检查组向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出了书面报告。

报告最后说:“我们认为天津地委机关生产中的问题,是很多而严重的,建议省委及早考虑解决。”

11月11日,河北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华北局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听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及毛泽东同志对上述有关问题的重要指示。一个解决刘、张问题的方案在省委领导头脑中初步形成。

11月21日,中共河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省会保定召开。当中共中央关于“三反”的决定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指示传达到每一个与会代表时,大会的气氛如同浇了油的干柴,遇火立刻“蓬”地燃烧起来。讨论、揭发,对号入座,磨拳擦掌,群情振奋。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刘、张的罪行如同阴沟里的污秽,骤然间沟盖被掀,便彻底暴露出来了!张子善尽管会议初期仍占据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位置,然土崩瓦解之势已成,只有俯首就擒了。

四、“打江山”和“坐天下”——刘、张腐败的根源和自供状

刘、张二犯何以用那等疯狂劲头大搞“机关生产”?刘的自供状泄露了一切:“把机关生产搞好,开支什么都方便。”

好一个“什么都方便”,原来刘、张搞的“机关生产”创造的利润,是惊人的,两年时间不到,刘青山仅从“机

关生产”中直接贪污挥霍资金即达一亿八千三百九十九万多元,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折算,可购买小米约110.4万斤。其时干部供应标准为每月小米30斤,即相当于3070人一年的定量。张子善更不示弱,直接贪污挥霍达一亿九千四百二十六万多元,可购买小米116.4万斤。

刘、张贪污犯罪期间,正值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普通干部都在过紧日子,毛泽东同志粗茶淡饭,衣服上缀着补丁……

刘、张二犯过的是什么日子?且看张子善自己的交代片断:

——例如在衣着方面,由一般布到好布到皮、毛狐毫;饮食上,由粗细粮并用,到纯细粮,到酒肉俱备,烟茶管够,水果常有……行动非乘车不行,由吉普到卧车;买东西要最好的。吸烟由“五洲”到“恒大”,到“大前门”,个别到“大炮台”(刘经常用“大炮台”);带表由旧到新,到“自动”;洗澡由池而盆而叫人擦背……

——外区去人均格外招待。一般均是八菜至十六菜,以至海味山珍色酒水果……招待极度铺张浪费。请客机关每月开支不下五千斤米。……为刘青山饯行,花五十万左右(或更多)。一般还是叫擦澡擦鞋,十几个人一次洗澡看戏吃饭即可浪费百八十万元……天津生产管理处花钱如流水,挥金似土。常有三辆汽车,实际是作了招待用。——就我个人说,东手要钱西手出钱,左手买东西,右手送或向兜里装,又让别人去买去送等极多……

从今天的目光看,也许张子善的物质享受算不得什么,但我们千万别忘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张子善管辖下的老百姓在吃些什么,穿些什么。张子善洗一次澡的费用,就够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开销,这还是为人民谋利益的那个共产党吗?

机关外的老百姓生活状况如何,张子善、刘青山早已看不见了,就连机关内部的普通干部们,也被两位达官贵人远远地抛开。就在他们花天酒地时,专区机关有一名副科长患了重病,去医院买了一点药品,包括几颗鱼肝油在内,希望能予以报销。

“不行!”事情反映到张子善那儿,他当即断然拒绝。

惯常骂街的刘青山,留下的文字交代材料虽少,但从他有限而坦率的痛悔文字中,仍可窥见其当初花天酒地的概貌。

——刘拿来大把大把的钱干什么?买衣服,买皮大衣、水果、金笔、家具,用自己才买的好表换对方的坏表,买收音机,买高级烟卷,还买高级补品,其中一次买鹿茸精花去1600万元。

——刘青山的祖母死了,这位做了大官的孝孙哪管正值生产备荒时节,强令县镇干部搭台子唱戏,告慰亡灵。几声炮响,上坟时间到,刘青山又命干群多人抬棺送柩,自己则坐在地委机关的小车里缓缓随行。

帮工出身的刘青山,做了共产党的大官之后的心情,正与早年李自成手下的牛金星相似,不知头重脚轻,身子该如何调摆是好。“老子打下了江山,还不该享受享受?”为了享受,他才扔下天津地委机关的几百号人马不管,独自钻进了天津一栋独门独院的小洋楼;为了享受,他才无病呻吟,成天往肚里填灌各种补品,管它对不对症;为了享受,他才领着一帮亲随,一头钻进天津市当时尚未查封的妓院,说是去瞧热闹,鬼知道干了些什么;为了享受,他才不顾党纪国法,一切国家明令禁止挪用的公款,都在他的侵吞之列;为了享受……

一切为了享受。真个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刘、张二犯,完全印证了这一讥讽的古训。

五、毛泽东午夜惊起,巨笔疾书:刘青山、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

1951年11月29日,一份标明“绝密”级、题为“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张刘逮捕法办”的电报,由华北局呈达中央。

毛主席、并中央:

最近我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合计四十五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

活动。为贪图暴利，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整运木材达四千立方米；勾结私商张文义等，以四十九亿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子善、刘青山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只有帐可查者，二人私用达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友送礼，有的达一、二千万元之巨。据有帐可查者，这一亿三千万元。张子善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一亿五千万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一七八张。

由于我们最近派人到天津检查和逮捕了与张、刘等勾结、破坏的私商，张子善已十分惶恐不安。根据其所犯错误和罪状，经华北局讨论，总理批准，决定即将张子善逮捕法办（张现在保定参加河北省党代表会）；刘青山归国后亦予逮捕。刘出国前，我们对其贪污腐化行为未能发现，以致造成今天的被动情况，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应引为教训。

薄一波

刘澜涛

十一月二十九日

该电文发出时，已近午夜。中央办公厅收到电文并按有关严格规定的程序送呈毛泽东时，大约在三十日凌晨。

当华北局标有4个“A”字母的特急电文送呈毛泽东之手时，这个历史巨人的案头，别的文件还堆了许多。

不宜杜撰毛泽东在看到华北局的电文时是何种心情，但珍贵的党史资料证明，这位从湖南农村走上革命舞台的人民领袖，作出决断是多么迅速。在注明“传阅周、朱阅后尚昆办”的中央发往全国各地的电报底稿上，赫然写着“拟稿人毛泽东”。

毛泽东亲拟的电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

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中央

十一月三十日

该电文通过无线电波，立刻传遍祖国各地。它对于正在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三反”《决定》的全党来说，无疑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事作到此远远没完，一贯主张工作“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的毛泽东同志，一月之后的十二月二十九日，又同时采取了两个重大举措：一、在胡乔木同志送呈的、拟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关于刘、张罪行报道的新闻稿上亲笔批示：“照发。应予三十日见报。”二、向各中央局转发华北局关于组织讨论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指示。

华北局指示是：

揭发处理大贪污犯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的报道，人民日报即日公布。请你们重视此事件的公布，各地均应毫无例外地立即利用一切会议，并密切联系实际，在党内外组织广泛的深入的讨论，尤其是河北各地特别天津地委及其所属各县，应把此项讨论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倾听并及时反映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其他各地亦应同时注意利用此事件，切实推动正在逐步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以及在党内肃清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讨论情况和各种意见望及时报告华北局。

华北局

十二月廿九日

神州翻腾震荡开来了。刘、张二犯的罪行材料公开发表，如同掀起九级狂飚。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奔走相告。

毛泽东在冷静地思索：对刘、张该如何处理？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当时还没有完整的法律体系，对刘、张二犯的处理既无现成的案例可以援引，又无已成的法律条文可为依据。而刘、张毕竟是有功于革命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其处理当然须慎之又慎。

善于走群众路线的毛泽东，于是认真听取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意见。

天津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

天津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其死刑的535人，主张处以死缓的8人，处以无期徒刑的3人，处以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其死刑的536人，主张处以死缓的7人，处以无期徒刑的3人，处以有期徒刑的6人。

河北省委对华北局的报告原文是：

华北局：

（一）刘青山、张子善凭藉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二）他们违法犯纪胡作非为，为时已久，而省委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未能及早察觉处理，给以严格的教育，致使国家资财和党的影响受到巨大损失，刘、张二犯走上了不可挽救的道路，实甚痛心。请求给我们以严格处分，以教育全党。

河北省委

十二月十四日二十四时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仔细审阅了天津地委、河北省委报告和所附材料的基础上，将自己的意见也及时上报了中央。有关电文是：

中央：

（一）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克扣、剥削河工、民工费用，勾结私商贪污自肥，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河北省委通过，经我们同意开除其党籍。

（二）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在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三）河北省委事先对此明目张胆的贪污罪行未能发觉，发觉后，又未及早坚决地予以处理，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应受到党的指责。

以上意见，妥否？望中央指示。

华北局

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三时

华北局的、河北省委的、天津地委的意见都汇集到了毛泽东案头。

工作时喜欢抽烟的毛泽东同志，燃起一支又一支

烟卷。

也许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对刘、张二犯的量刑的确缺乏法律条文的依据，因为当时人民共和国颁发的法律条款中，还不曾将贪污、浪费、中饱自肥纳入其间。但我们在考虑特定环境的同时，不可忘了“法”的要义：即人类绝大多数的意志和愿望。

当刘、张二犯的罪恶行径借助新闻媒介公布于众后，人民群众对其简直咬牙切齿，恨不能生吞活剥，尤其是直接遭受刘、张苛剥的天津地区的河工、民工们。据改组后的天津地委组织8个县镇的党员积极分子讨论的情况看，没一人不主张枪决的。其中杨柳青镇的农民说：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真比反革命分子还大，应该把他们弄回来公审枪决。

1951年12月25日，改组后的天津地委根据广大党员的强烈要求，以“天津专区全体党员干部大会”的名义，给中共河北省委并中共中央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表达他们的愿望和心情，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刘青山、张子善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期间，一意孤行，为掩饰其罪恶行为，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实行个人的打、拉、欺骗、收买、软化、利诱等错误的‘干部政策’，确实是无法无天的。因此我们认为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党籍是正确的。”

读着这些字字发烫的信件，你能不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所感染？

毛泽东同志用力摁灭一个烟头，眉头紧蹙凝眸半晌，然后移过华北局当晚送来的电文，拿起了桌上的墨毫。

××老阅。退毛。

他那流畅如水的笔下，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党外人士的名字。该老人德高望重，毛泽东同志平时对他就分外敬重。

毛泽东同志的决心，可不是那样轻易下定的呵！而伟人一旦拿定了主意，一切不可动摇！

1952年元月，经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判决书正式下达了。拟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六、枪声响过之后的思索：假若……假若……假若……可惜历史没有“假若”

“伤痛！万分的伤痛！现已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一条！”这是那震撼大地的枪声打响之前，张子善的悲咽之音。

“告诉我弟弟×××，把尸首起走。津市局（指刘青山本人在天津的住处——笔者注）有大小皮包，亦是党的财产，交给党。”这是刘青山在听完死刑判决词、失声痛哭之后留下的遗言。

面对这些明明白白写在纸上的遗言，我的心象受了电击，好一阵颤抖不已。刘青山、张子善二位，你们的理性复苏也真是太迟太迟了。

应该说刘、张二人都够得上是条汉子，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可谓毫不含糊。巧得很，斯文的张子善同样有过为革命出生入死的经历，那是他在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遍及全国。年轻的张子善满怀报国热忱，在学校里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暗中组织师生们学习革命理论。1934年冬，由于叛徒的出卖，张子善和其他地下党员都被捕入狱了。入监后，有一小部分软弱分子向国民党当局自首变节，而张子善尽管备受折磨，死去活来，仍不肯屈服。有同学买通狱警后去看望他，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张子善最后是怎样出来的？“七·七”事变后，难友们集体暴动，将监狱砸了，张子善才趁乱逃出。逃出后即到处寻找党的组织，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由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表现突出，以至于短期内连升三级。

已经如前面所述，华北局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河北省的官僚主义作风。笔者在采访时接触的材料中，亦见到诸多和当时省委、省政府某些领导有关的文字，其中有的系刘、张亲笔所供。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在目前以及往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些文字还只能尘封。好在当年已有不少见诸报端的一些权威人士的自我批评文章，不妨翻出来在今日的阳光下好生抖抖，或许能发现某些更为深层的东西。

1952年1月8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的文章，题为《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育》。文中就省人民政府对刘、张案件未能及早发现和处置，检讨了省府和自身的官僚主义等等。其中有下面的具体文字：

“张子善的居功自傲，欺上压下，有其历史性。我们

只偏于看他过去艰苦奋斗的一方面，放松了他居功自傲的一方面；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视了他压抑民主、家长式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只看到完成任务，而未深察是怎样完成的……”

就在同一时期，《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的检讨文章：《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给予我们的教训》。马国瑞的文章中写道：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蜕化、叛党的罪行，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固然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严重的自私自利思想，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迷惑和腐蚀，但与我们省委领导上所犯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分不开的。刘、张盗窃国家财产投入‘机关生产’远在一九五〇年即已开始，一九五一年入春以来即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狼狈为奸，剥削治河民工，而我们省委领导竟长期无所闻，说来令人难以相信，自己也无以解说，然而却又是事实。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就在这里。去年八、九月间，我们虽听到过刘、张生活铺张浪费，排斥、打击干部的一些片面情况，也曾向他们进行过数次批评，但由于我们政治嗅觉不灵，认为是一般性的问题，并未加以警惕，予以深追和认真处理……”

他们的检讨可谓深刻，其教训可谓沉重，其态度可谓诚恳。浩繁的历史长卷，将永远容纳这些可以启迪后人的笔墨。

其间，省报也多次载文，署名者多为本省的部门首长，检讨自己在刘、张一案中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共河北省委曾给全省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所有接受刘青山、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均应无例外无保留地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请书，听候党的审查处理。”

紧接“通知”之后，河北省委又专门作出关于接受刘、张贿赂与礼物的处理决定：

1. 接受刘、张现款者全部退还；
2. 接受贿赂与礼物者，原物一律退还；
3. 凡受贿受礼者，不论其多寡，均必须进行深刻检讨；
4. 凡党员干部对接受贿赂礼物隐匿不报或报而不

实者,定于严惩,绝不宽恕……

一切昭然。原来那些大小官僚们肥大的屁股上面,还有个不大不小的、煞是光采照人的徽章。据后来统计,因刘、张一案所涉大小官员人等,竟达数百名之多。

假若当年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少来点官僚主义,对刘、张的工作实绩详加考察,由不得他们报喜不报忧,那刘、张二人的种种作弊行为有没有可能及早发现?他们的贪污自肥数目有没有可能变小再变小?他们有没有可能因此而减轻罪孽,免吃那两颗致命的枪子儿?

假若与刘、张同处一个时期的这“长”那“长”,这“书记”那“书记”们严拒二犯的任何贿赂礼物,痛斥二犯的种种逆行,使二犯早就如过街老鼠,绝无藏身之地,那刘、张二人的贪污、挪用和苛剥行为会不会有所收敛?其犯罪金额会不会减低再减低?那两颗由共产党的枪口射出的子弹,会不会因此而朝向别处?

然而,历史没有这些个“假若”!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笔者在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有关领导的支持下,追溯和采写了这一段历史史实。其时,刘、张二犯早已成为粪土,当年主审他们的许多同志也先后寿终正寝。代表人民意愿力主严惩刘、张的毛泽东,亦成为历史故人。但旧话重提,意在今朝。借用毛泽东的话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可不是么?

或许还不止于“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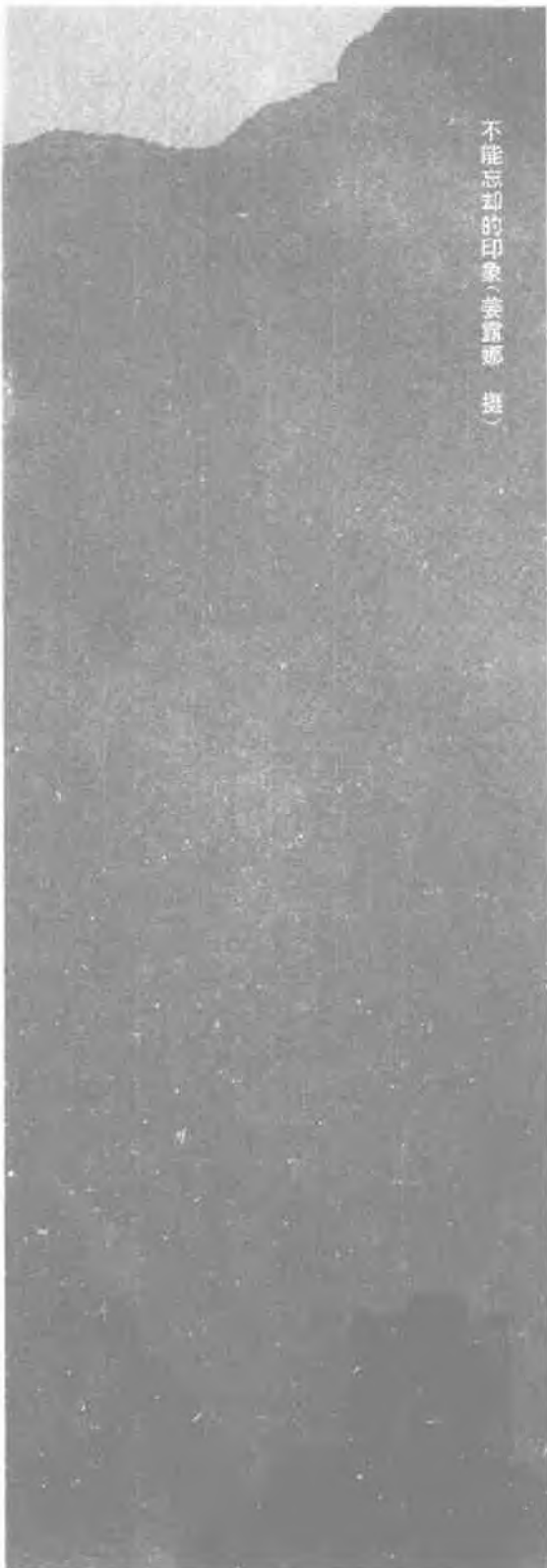
人类贪欲的幽灵一天不绝,反贪之战也必然一天不止。于此,“刘、张案件”也就永不失其参照意义。也许刘、张本人,永远是刘青山所言“在历史上说也有用”的“千古名人”。

谁愿意再做这种“历史名人”呢?

谁再来制裁这种“历史名人”呢?

且看今朝!

不能忘却的印象(姜露娜 撰)



1954年：《红楼梦》 研究如何激起 政治风波



○吴晓梅

两个小人物闯进红学界

1954年的春天,花红柳绿,晚风拂面的中山公园内,两个青年边走边谈,十分投机。其中一个李希凡,26岁,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的研究生,另一个是杨建中,即蓝翎,22岁,一所中学的教师。他们两人同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都有志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平时相处就十分要好。这会儿正值学校放春假,两人就相约出来散心。闲谈之中,话题不知怎么就谈到了《红楼梦》,谈到了刚刚看过的1954年3月号《新建设》杂志刊登的红学专家俞平伯先生的文章《红楼梦简论》,又谈到他的专著《红楼梦研究》,越谈两人的想法越接近,觉得俞平伯先生的不少观点和意见,都是他们难以接受的,越谈两人就越觉得应当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于是他们相约共同写一篇文章。

没过多少日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就写成了。经过精心修改、抄正,李希凡、蓝翎把文章寄给了当时在文艺界极有影响的《文艺报》。

好些天过去了,《文艺报》一直没有回音。于是他们一边把这篇文章再寄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办的刊物《文史哲》杂志,一边又利用暑假的时间,写了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道出他们前一篇文章未能言尽的一些想法。

时间如流水逝。转眼到了秋天。这一天,《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终于在《文史哲》杂志第九期上刊出了。欣喜之余,李希凡、蓝翎两人万万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由他们的文章竟引起了文化界、学术界的一场由党的主席毛泽东直接介入的轩然大波——由批判俞平伯的红学观点而至批判胡适唯心论的政治运动。这也成了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

在世界文学之林,不乏硕果累累的大作家,而唯有中国的曹雪芹,毕生只写一部《红楼梦》。其实,还只能算多半部,前八十回。但他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小说天才。

《红楼梦》诞生在清朝乾隆年间。可以说,它一诞生就以脂砚斋的研究为起点开始有了专门的“红学”。脂砚斋和曹雪芹关系密切,谈到过作者本人不断增删过程中的草稿并且预闻了《红楼梦》创作。这样“脂评”本身也成为“红学”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他以后至五四时期红学专家们的研究,被称之为“旧红学”,他们或考据,或演绎,或索隐,聚讼纷纭。以政治索隐派为例,有影响的就有三种说法:一说《红楼梦》反映的是康熙时宰相明珠的家事,贾宝玉就是明珠之子,清朝著名

词人纳兰性德;二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影射的是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恋爱故事,而董鄂妃就是嫁给冒辟疆的秦淮名妓董小宛;三说《红楼梦》描写的是康熙朝的政治,目的在于“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红”隐“朱”,朱即明朝皇帝之姓,“贾”谐“假”,“贾府”暗斥“伪朝”,书中的金陵十二钗,则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名士,都是男性。持此说的就有蔡元培,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

蔡元培之后由胡适、俞平伯开创了一代“新红学”。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对旧红学的穿凿附会,一一辩驳,认为《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应是“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胡适的主张深获俞平伯的赞同。以胡、俞两人通信讨论形式结集的《红楼梦辨》树起了“新红学”的旗帜。新红学家们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精神,搜集了有关曹雪芹的家世和他个人的材料,经研究考证,认定贾家即曹家,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红楼梦》是一部曹雪芹的自述传,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作品,表现的是曹雪芹的“色空”观点。并研究出《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后四十回是由高鹗补写的,并对高鹗持否定的态度。新红学家们还认为《红楼梦》的艺术风格就在于“怨而不怒”。继胡适、俞平伯之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则又把考证工作推前了一步。

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研究延续了30多年,直至李希凡、蓝翎文章的出现。

这的确是个转折点。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以二十年代的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的建立,是在扬弃旧红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红学史上的第一次飞跃,而五十年代以后以李希凡、蓝翎文章为开端的,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观点研究《红楼梦》则是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这次飞跃把红学研究推入了新阶段。

遗憾的是,这种理应归入学术讨论范畴的争论深深地打上了政治运动的烙印。

李希凡、蓝翎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由于亲戚当中有人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以李希凡比较早地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华北革命大学后,又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学习。后来他和蓝翎考上山东大学读中文系,逐渐由对古典小说的喜爱而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对胡适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观,就感到不满足,山大毕业后到北京,在中山公园那个明

媚的春天里他和蓝翎终于理出了自己的思绪,尝试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红楼梦》的研究提出些问题,并对小说本身作些分析和阐释。

李希凡和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开诚布公地说,《新建设》1954年3月号发表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较之他1923年初版的《红楼梦辨》、1952年9月改名再版的《红楼梦研究》在某些见解和方法上有了进步,但基本观点未脱原有的巢臼,其论点是唯心主义的,他把考证观点运用到艺术形象的分析上来,则是反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对此,他们有不同的意见。

李希凡、蓝翎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首先,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伟大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作品,而决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红楼梦》出现在清朝乾隆盛世,并非偶然现象,乾隆时代也是清王朝行将衰败的前奏曲,其中已注定了封建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生于这个时代的曹雪芹,从他家族的衰落崩溃,预感了本阶级必然死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走向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了《红楼梦》中,并表现了其必然崩溃的原因所在。《红楼梦》的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内容,并进而涉及到封建制度的全部问题,作者真实地描写了这一阶级生活的基本特点:残酷的剥削无情的统治,伪装的道学面孔,荒淫无耻的心灵。这些揭露和批判的本身有着充分的人民性”,“《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其次,他们不同意“色空”是《红楼梦》的基本观念这类唯心主义的观点,也不同意把《红楼梦》看作“自然主义”的作品,并由此引申下去,视之为曹雪芹的自传,以此事实真实的轨迹来解释其中艺术形象的真实。他们认为“要正确评价《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意义,不能单纯地从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世界观的落后因素,以及他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来作片面的论断,而应该从作者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的深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李、蓝两人还批判俞平伯关于《红楼梦》艺术风格“怨而不怒”的观点,认为他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减低了《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

在随后的《评〈红楼梦〉研究》中李、蓝两人则主要针对现实主义文学发表见解,认为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不但在创作上坚持了现实主义的

道路,而且在理论上阐明了现实主义的真谛。而俞平伯就在这里走向了歧途,他关于贾氏衰败的考证,仅止于把它和曹家的衰败连系起来看,而没有看到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实际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文中李、蓝还对俞平伯的“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的文学批评见解提出了批评,认为是主观主义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十分直率,有很强的针对性,但他们在文中也肯定了俞平伯先生30年来珍贵的劳动成果,对于《红楼梦》读者的很大帮助。

一场风波已在政界悄然兴起

两个年轻的作者一吐为快,俞平伯先生似乎也未及有所反映,一场风波却已在政界上层悄然兴起。

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深厚功底的党的领袖毛泽东极喜欢读《红楼梦》,而且读过许多遍。他对《红楼梦》的评价极高,认为这部传世之作是以卓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不逊色。他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就说:“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话虽说得幽默,却流露了老人家对《红楼梦》的确心仪已久。可以想见,毛泽东对如何评价《红楼梦》不会没有自己的见解,但他在1954年以前似乎从未有所表露过。直到1954年9月《文史哲》杂志第9期刊出了李希凡、蓝翎两人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李、蓝的文章深获毛泽东赞赏,认为是很成熟的文章。文章发表后,据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向爱揣摩毛泽东心思的江青获知后,找来了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文艺报》主编冯雪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开会,要求把李希凡、蓝翎发表在《文史哲》上的文章转载在《人民日报》上。但《人民日报》显然并不看重,态度也不积极,理由是《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而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几经商榷,定不下来,使江青十分恼火。最后经过协商终于达成一项妥协,即在《文艺报》上转载。原来就没有给这篇文章以一席之地的《文艺报》虽答应下来了,但态度也是很勉强的。

1954年第18期《文艺报》终于转载刊出了李、蓝的文章。随后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也刊出了李、蓝两人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而此时,毛泽东对这件事情的不满情绪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就发。

从毛泽东对《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时所加的编者按的批注和对《光明日报》刊载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的批注,就可以看出,毛泽东行文之处,许多地方对文艺界的不满,对红学研究现状的不满已远远超过了对李、蓝文章本身的关注。他的语气焦躁而执着,有些地方则一再用反问的句式和讥讽的口吻。与此相对比的是,《文艺报》、《光明日报》编者按的小心翼翼、有所保留的语气。

《文艺报》编者按中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毛泽东有情绪地批道:“不过是小人物。”

编者按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重重地在“试着”二字下划了两道线,又批道:“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说:转载这篇文章是“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对此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划了两道线,打了一个问号,接着十分肯定地说:“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对于《光明日报》所加的编者按毛泽东也不满意。显然,《光明日报》的人们也和《文艺报》一样以为这仅是学术之争,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光明日报》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由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毛泽东针对文中出现的“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和“供参考”三处不确切的词汇连续三个反问句:“不过是试作? 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 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对李希凡、蓝翎在《评〈红楼梦研究〉》中“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的观点,毛泽东表示“这个

问题值得研究。”

对李、蓝认为贾氏家族为维持豪华享受而大借高利贷,是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的原因的说法,毛泽东则认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对俞平伯以“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比喻表达的文学批评观,毛泽东视为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对李、蓝两人文中最后说到俞平伯先生如此评价《红楼梦》也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效果都是一致的一段,毛泽东认为他们“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疾风暴雨即将来临

毛泽东所为,显然令一直认为这次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争论是学术之争的文艺界秀才们始料不及。他们不知道,李希凡、蓝翎不知道,俞平伯更不知道,一场急风骤雨将要来临。

紧接批注之后,毛泽东于1954年10月16日发出了那封有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信是给中央政治局以及文艺界有关人士的,信封上,满满地写着一堆人名: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林淡秋、周扬、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

一个关于红学研究的问题由党的最高领导以通信的形式发起讨论,并有如此高的规格,其本身就意味着它的不寻常。

果然,毛泽东的信涉及的仍然是李、蓝两篇文章观点以外的大是大非问题,这封信较之他的那些批注,又上了一个台阶。

毛泽东开首就说:“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许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接下来,他简述了李、蓝的文章被《文艺报》置之不理,到有人要求在《人民日报》转载被阻拦,再到《文艺报》最终予以转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发表《评〈红楼梦研究〉》的经过。毛泽东的情绪显然很激动,他的字刚劲有力而坚定:“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

《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看来，毛泽东对《清宫秘史》与《武训传》事件未能忘怀。《武训传》创作于1947年，1950年由昆仑电影公司重新拍摄后，于1951年2月公映。映后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报刊在4个月内竟有40余篇称颂文章。一片叫好之中也有一些相反意见，毛泽东对此严重关注。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亲自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他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社论发表后，舆论立时转向，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批判文章，展开了一场文化思想方面的批判运动。电影编导、演员和发表过赞扬文章的许多著名人士作检查。这是建国后文化领域中第一次政治批判运动。

与对《武训传》批判相映衬的是对电影《清宫秘史》批判的不了了之。有鉴于此，毛泽东决心这次再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次彻底的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清算。

畅言至此，毛泽东似乎意犹未尽，他在署名之后，又加了一句：“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一锤定音，《红楼梦》研究的各方以及卷入其中的一些方面从此被定性。文化界于是波澜起伏。

自1954年10月下旬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载文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观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把学术之争与政治斗争扯在一起。突发的事情来势如此凶猛，在俞平伯先生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时，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已扣在了他的头上。那一年，他54岁，已过知天命之年，但他一定弄不明白，这场厄运是何以落到他身上的。

唯一可以感觉的是门庭的寥落，别人退避三舍的冷漠和报刊异乎寻常的围攻。

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除李希凡、蓝翎外还有古典文学专家及作家，文艺评论家和各报刊编辑60余人。俞平伯也被要求到会。会上，火药味浓者有之，轻描淡写者有之，也有人出来为俞平伯的考据作辩护。一时议论纷纷，但最后会议还是作出了统一的结论，即认为李希凡、蓝翎两人对俞平伯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清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会议的组织者宣布，这次讨论的目的是在《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划清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界线，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这次会议虽然提到要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然而在这之后，舆论仍然一边倒，并很快把批判声势发展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其他各个学术领域中。

还远不止于此。作为卷入事态之中的《文艺报》也受到批评。11月4日，主编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11月10日，《人民日报》刊载黎之的文章《〈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

百忙之中，毛泽东对这两篇文章都仔细阅读并批注了意见。针对黎之说的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文艺报》自身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一点，毛泽东并不满意，他批道：“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针对黎之批评的《文艺报》骄傲自满，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毛泽东批道：“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针对黎之批评的《文艺报》编者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钻在冰冷的公式主义的套子里，对新鲜事物和新鲜思想缺乏热情，毛泽东又批道：“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总之，毛泽东似乎对黎之这篇以批评《文艺报》骄傲自大，脱离群众为出发点的文章并不满意，他认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冯雪峰的检查并不轻松。但毛泽东不满情绪依旧很重。当冯雪峰检讨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他的严重性。”毛泽东反问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又讥讽地说：“应该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冯雪峰检讨中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和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毛泽东则说：“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

冯雪峰检讨说：“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底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对此毛泽东说：“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冯雪峰检讨中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有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对“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这样的字句打了问号，并批注道：“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几乎都用了否定的语句，但当冯雪峰检讨中说到：“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时，毛泽东则用了肯定句式：“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一个月过去了。1954年12月8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定改组《文艺报》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委会，实施集体领导原则；责成《文艺报》坚决克服错误，端正编辑方针；责成中国作协主席团改进对《文艺报》的领导工作，《文艺报》的工作应与文化部建立密切联系；责成《人民文学》同中国作协领导的其他刊物加强文艺批评工作，并提出文艺批评与自由讨论的具体计划；责成中国作协、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和所属地方协会的机关刊物以及各省市文联所属机关刊物的编辑机构，根据决议的方针进行工作检查，改进工作。至此，对《文艺报》的批判算是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对胡适的批判正在积极开展。1954年12月2日下午，由中国科学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召开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正过的批判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计划规定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涉及的问题有：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是其实用主义的批判），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计划草案还提

出了三个学术方面的问题供讨论：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计划还规定这些批判与讨论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便于领导这场讨论，还正式成立了由文艺界一批名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

这个计划草案是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向毛泽东报告的。在这个计划通过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就自己的修改意见同周扬谈过一次话。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周扬对这个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之后才拿到第二天的联席会议上。毛泽东的修改意见显然是重大而带原则性的，否则这个计划不会被作根本性的修改。那么毛泽东谈了哪些修改意见？目前，没有有关材料可以回答，然而，我们却看到通过的这个计划草案的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对胡适批判的全方位；其二，它还提出了供讨论的三个学术性的问题，特别是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和针对新旧红学的评价。这是否意味着学术讨论仍可以占其中的一席之地？

至1954年年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批判已近尾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全面展开。到1955年初，将要拉开的则是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序幕。早在1953年7月胡风的文艺思想就在中国宣部先后召集的四次座谈会上受到全面的批评，报刊还公开发表过一些批评文章，对此胡风不服，1954年7月他再次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30万言的意见书，主要针对1953年对他的批评提出反批评，后来在对俞平伯红学观、胡适思想的批判中，胡风又没忘了说话。1955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公开印发胡风1954年7月给中央的那个报告。尽管胡风不同意。从此，批判胡风的政治运动就旋风般刮起。这是后话，不提。

怎样评价这场风波

应该给1954年这场风波一个怎样的评价呢？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知识界作宣布“双百”方针的报告时，就提到过两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对他的批评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平伯先生的文章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

如果说陆定一当时的讲话还有些含糊，那么30年

之后即 198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 65 周年的会议上的讲话,则表达得准确无误。他说:“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 1954 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

32 年前的那场批判的是与非,至此有了历史的结论。

然而不能说只有流血才叫创伤。对俞平伯红学观的批判,前后虽然只持续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俞平伯没有官可丢,也确在继续做他的红学专家,但这场政治运动给这位一心做学问、平日沉默寡言的老人留下了心灵的伤痛。1967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给政治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在报上发表,俞平伯才明白过来,1954 年的那场冲击是怎么一回事。但当冲击袭来时,老人心中装的是多大的一个问号啊。但他似乎没有表露过。据他的家人回忆,那个时候,俞平伯更加沉默少言,也不对任何人提及此事,即使他的日记也无片言只语的记载。是老人不想这些吗?不。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再对人谈《红楼梦》了。

1963 年,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俞平伯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谁知几年之后,“文革”中他又遭批判,更令人痛惜的是半生心血积累的全部资料、笔记毁于一旦,学术研究的权利被剥夺。1969 年他被下放至农村,住在一间四壁漏风的茅草屋里。他又绝口不谈《红楼梦》,一直到 1986 年。这一年,在纪念他从事学术活动 65 周年的会议上,他发表题为《旧时月色》的演说,包括“1980 年 5 月 26 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和“评《好了歌》”两篇论著。这次,人们终于把公正还给了这位老人。

俞平伯病逝于 1990 年 10 月 15 日,终年 90 岁。他是穿着半新不旧的中式棉袄、夹裤和一双布底鞋在人生的终点站排队等候火化的。临终前,他对孙辈断断续续地表达了他对《红楼梦》的新看法:要重新评价后四十回。他改变了自己过去否定高鹗的观点,对孙辈讲:为《红楼梦》续成后四十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至少使《红楼梦》变得完整了,高鹗、程伟元做了一件曹雪芹

未能做到的事。他用几乎无法动弹的手写下了两行难以辨认的字迹: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

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他仍然没有提到 1954 年对他的那场冲击,尽管他决不会忘记,尽管他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

30 年过去了,对这场《红楼梦》风波,对当年所持的观点,作为李希凡、蓝翎又有新的认识吗?当年未见经传,被毛泽东称之为“小人物”的李希凡、蓝翎后来都走上了领导岗位。现在身任中央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李希凡,1988 年在《我与〈红楼梦〉》一文中讲到,自己仍然坚持当年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即其一,《红楼梦》决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反映的不是贾氏一个家族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必然命运的写照,《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末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二,不同意把《红楼梦》看作是“色空观”的“自然主义”的表现,评价《红楼梦》不能单纯看书表现的作者世界观的落后因素,而应从作者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的深度进行探讨。

同时,李希凡也认为他们的两篇文章,今天看来,是粗疏幼稚的,一些提法上有不够科学之处。他还说:“由于当时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修养的限制,我们在分析和评价曹雪芹与《红楼梦》中复杂思想现象时的确存在着矛盾和困惑。”比如:在看到它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阶级的腐朽生活以及伦理道德的暴露批判的同时,又无法否认其中渗透在艺术形象里的一定的虚无宿命的观念和情绪。”

李希凡在 1988 年还提及 1954 年红楼梦研究风波的一些积极因素,他说:“自 1954 年以来,34 年过去了,红学研究,虽也一样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值得总结,但是,它在广度和深度上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

李希凡的话不乏中肯。如果仅从红学研究的发展来看,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对《红楼梦》进行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分析的确从此有了长足的进展。

那么毛泽东呢?作为决策人的毛泽东,又到底是怎样去读去评价《红楼梦》的?在 1954 年的那一段时间,他将注意力放在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并没有流露出他本人对《红楼梦》本身的多少看法。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 1954 年以后他若干次的谈话、讲话中追寻他

的思路。

毛泽东从《红楼梦》里看到了什么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后的谈话中说: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竭,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

他又说:我家长制度的不断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尽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1961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

在同一次谈话中他又说:《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十七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样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谈话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说:《红楼梦》第二回中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多,远筹谋划者无一。”讲得不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一些哲学

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1964年8月,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都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

1965年毛泽东对他的表孙女王海容说:你要是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恩格斯眼中巴尔扎克的名著《人间喜剧》是一部描写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是上升的资产阶级对贵族阶级日甚一日冲击的编年史;列宁眼中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则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与这两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毛泽东从《红楼梦》里看到的也是历史,是那个时代之所以产生《红楼梦》的社会政治经济状态,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衰败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封建社会生活活生生的展现。以阶级斗争观对贾府人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独具慧眼之处。

然而有一点可以存疑,他认为蔡元培的红学观不对,而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那么,他是相对于蔡元培而肯定胡适呢?还是确实认为胡适的红学观有正确的一面?如果是后者,那么是否意味着他对俞平伯红学观的重新认识?

他爱读《红楼梦》,他劝人读《红楼梦》,他评价《红楼梦》,他也引用《红楼梦》的故事和语言,最令人耳熟的有两个,一个是他说王熙凤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另一个是他说过林黛玉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只不过这些语言早已在毛泽东那里有了崭新的特定的含义。

无论如何,毛泽东之于《红楼梦》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954年,他把这部巨作和对这部巨作的研究变成了

一片激流险滩。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首要决策人，毛泽东的确不应成为学术争鸣中的任何一方，因为他的砝码实在太重了。遗憾的是，事实却是相反。

毛泽东从《红楼梦》中的确看到了另一片天地，那么，除了他在谈话中陆续发表的一些见解，他是否批注过《红楼梦》？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在他的这一片天地更深更近地看到毛泽东。

据称，毛批《红楼梦》的确存在。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时，曾把一部随身携带而又刚读了一遍，

天头行间写满各种批语的《红楼梦》赠给了当时上海的一位负责人。此人又把它转交当时在上海当文教书记的石西民，嘱他好好研究。石西民受赠此书，一直视为至宝，妥为珍藏。无奈“文革”开始，他在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时被揪去到处游斗，毛批《红楼梦》也在抄家中不翼而飞。“文革”后在发还抄家的物品中仍不见它的踪影。直至今日，20多年过去了，还是毫无下落。

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不会不认识毛泽东的手迹，所以“文革”中被付之一炬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它到底失落何处呢？人们会有看见它的一天吗？

去年清明，桥山黄陵春雨初霁，一年一度的庄严肃穆的祭陵活动在进行中。一人长跪陵前，手展长卷，代表不远万里而归的海外游子，毕恭毕敬吟诵他亲手所撰的《祭炎黄》。读到激越肺腑之处，声泪俱下，众多同祭人，无不为之动情。

今年清明又至，陕西省修整黄帝陵基金会特将《祭炎黄》一文寄给本刊，予以发表。作者为美籍华人、美国洛克维克国际公司火箭动力部首席科学家张良洲博士。

美哉炎黄，文采流长。仁本义行，周续成汤。
儒尊孔孟，道源老庄。诸子思想，百家文章。
造纸印刷，环宇同享。农工技艺，盖世无双。
臣谋将勇，社稷承康。民勤物丰，山河飘香。
绵延丝路，万国通商。文景贞观，大国泱泱。
美也！炎黄子孙，龙凤轩昂。
登桥山，盼盛世，梦回汉唐。

壮哉炎黄，威德苍苍。西润欧陆，东化桃郎。
相国青天，直道金钢。千城武穆，正气天祥。
成吉思汗，虎跃龙骧。旌旗开展，欧亚双扬。
永乐大典，翰海浩荡。郑和西巡，百舰齐航。
延平驱荷，蓬莱重匡。康熙定北，威慑沙皇。
壮也！中华上邦，何等风光。

大哉炎黄，千古开荒。耒耨教耕，地利以张。
遍尝百草，医药有方。观法天地，历数乃详。
象形创字，书成意彰。桑蚕取纱，民衣丝裳。
车行指南，舟帆三江。哲学连山，易理归藏。
传之尧舜，禅让贤良。迨至大禹，九河通畅。
大也！华夏民族，智慧光芒。
望桥山，怀故国，神驰古疆。

炎

黄

祭

● 张良洲

上桥山，寻炎黄，气秉高阳。

痛哉炎黄，英灵何乡？百年中土，几多灾殃！
烟毒寇患，国破家亡。割土赔款，民穷地疮。
火德不王，受戮东桑。土德失瑞，蒙辱西洋。
比干挖心，惟留肚肠。灵均怀沙，徒奉酒浆。
子孙不肖，怪怨爷娘。箕豆相煎，祸起箫墙。
痛也！炎黄有知，岂安九泉？

哭黄陵，伤国耻，泪洒桥山。

幸哉炎黄，神兮重阳。今日神州，不再彷徨。
审时度势，革新图强。法治民本，则正纪纲。
言路广开，民气畅扬。国风雅颂，文盛武昌。
厚植青苗，培育栋梁。选贤与能，富国安邦。
敬业乐群，诚信礼常。两仪相成，九州同芳。
盼也！苍龙喜水，冲天腾翔。

祭黄陵，涛国运，情动肝膺。

张良洲恭撰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十年岁次癸酉·清明节
(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于陕西桥山黄帝陵

三十年代初,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陈治平,被叛徒出卖而叛变,投到蒋介石营垒,当了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要职。解放前夕,又因反蒋而饮命。临刑高呼“共产党万岁!”他是叛徒?是烈士?至今未敢定论。作者以他经年研究所得,客观地把陈的心理素质、深层动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剖析,让广大读者来评量这一人物的归宿。

编者

●童乃元

省委书记——叛徒——烈士——?

——记陈治平的
曲折人生



青年陈治平



中年陈治平

引子

1949年深秋,吴淞口江面雪浪排空。一艘小木船正搏风击浪逆水而行。船舱里停放着一口黑漆棺材,棺前放着嵌有死者遗像的镜框,那张神貌纤毫毕现的长方脸上,浓眉紧锁,目光冷峻,表情庄严,给人以不怒自威的感觉,看上去40来岁,确是精明有度;而那梳理如常的头式,简朴整洁的中山装上衣,又让人看不出他曾身居高位的蛛丝蚂迹。如果不是他自己用生命写下一段历史,谁也不会想到他是疆场上使过刀枪,会场上口若悬河,文坛上龙飞蛇走,吃淮安府玉米面,饮废黄河水长大的男子汉。他还曾是孙中山亲手创办的黄埔军校里的高材生,后来受到国共两党领袖人物的器重,他一枪打响了苏北平原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出席过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回国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农委书记、军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红十五军军长等要职,

革命业绩何等辉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是同一个他,在遭叛徒出卖后,也背叛了组织,出卖了同志,彻底投到蒋介石怀抱,倍受重用,和陈立夫、蒋经国、徐恩曾比肩而坐,也与李宗仁、冯玉祥来往甚笃。可是,当他认清了蒋家王朝的腐朽,随着历史洪流的呼啸奔涌,他又义无反顾,毅然承担起瓦解蒋政权的特殊使命,参加了蒋家王朝掘墓人的行列。终因事泄,功败垂成,饮弹黄浦江畔,以“红——黑——红”的彩色方程式给自己画出了一种奇特的人生轨迹。

这,就是他,陈治平奏出的人生之曲。

横沟暴动

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指派他的小同乡陈治平回到淮安家乡组织暴动。12月28日,淮安钦工镇逢大集,镇北圩门外,四乡农民悉聚而来,万头攒动,刀

权林立,红旗招展,一派威武热烈的场面。陈治平登上坟头,还未及开口,“打倒土豪劣绅”“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呼喊声排山倒海,如狂风巨浪席卷上空。

“农民弟兄们,农卫军战友们”,陈治平用威严的目光扫遍全场,“蒋介石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害得我们贫雇农上不能奉老,下不能养小,活得不如猪狗。你们说,该怎么办?”“抗捐!抗租!抗债!”台下山呼海啸。“对,只要天下穷人一条心,紧紧跟着共产党,参加农会拿起枪,就有希望和力量。”话说到此,只见陈治平嗖地从腋下抽出一面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来,略略展开,便猛地用力一扯,只听“吱——”地一声脆响,旗子成了两片,紧接着又是几下,便成了碎片,又展开一面红旗,套在一根竹竿上高高举起,左右摆动,大家望着斧头镰刀旗,会场上卷起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一场轰轰烈烈、色彩斑斓的农民武装暴动在淮海平原的原野上爆发了。横沟寺学校上空高高飘扬起中国共产党党旗,大门两侧贴出两幅纸牌——“淮安县苏维埃政府”“淮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部”。一千多名暴动队员臂戴红袖标,手持各式武器,冒着风雪分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破坏交通,到地主家中收枪枝、烧田契、分粮食……

暴动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国民党淮安县政府集中常备队的八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团倾巢而出,还邀来正规军营,前来镇压。双方在风雪中展开了一场恶战……

暴动失败了,陈治平在苏北导演的这出历史活剧,其时恰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遥相呼应。

地下岁月

1928年5月,陈治平回上海不久。党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来信,同意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与会者有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地代表共142人,有表决权的代表84人。共产国际邀请名单中虽有陈独秀,但陈拒绝出席;毛泽东、朱德又不在被邀名单之中,令不少党员诧异。陈治平则作为中共江苏省委代表,赴莫斯科出席会议。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六大”会上,陈治平曾于6月25日的“大会继续讨论政治报告”议程中发言。他对大会分析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判断,对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倾向

的判断,对当前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新的革命高潮将不可避免的观点感到由衷拥护。会后,他回到了充满白色恐怖的海,在何孟雄领导下继续从事苏北农运联络工作。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白区工作应特别注意隐蔽,党的领导者一定要有职业掩护。这一时期,陈治平先后当过码头运输工、纱厂打杂工,穿着破旧的对襟短衫,黑胶底布鞋,生活在最底层的工人群众之中。

一天,河南籍运沙工张荣达上班后不住唉声叹气,休息时,陈治平把他拉到一旁:“兄弟,莫不是家里有了难处? 缺钱? 还是啥的?”对方摇了摇头,不回答。

原来张荣达妻子半年前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夫妻俩搭了个草棚住在浦东江边。妻子虽说不识字,可长得俊丽,被包工头张大麻子奸污了。事发后,张妻要寻死跳江,张荣达窝了一肚子气。

陈治平知道实情后,找到张荣达安慰他说:“兄弟,这件事你不要声张,我自有妙计。天下你要多劝慰自己老婆,万事处处小心。”

一天晚上,张大麻子再次窜进了张荣达的小草棚。

“谁呀?”这是张荣达老婆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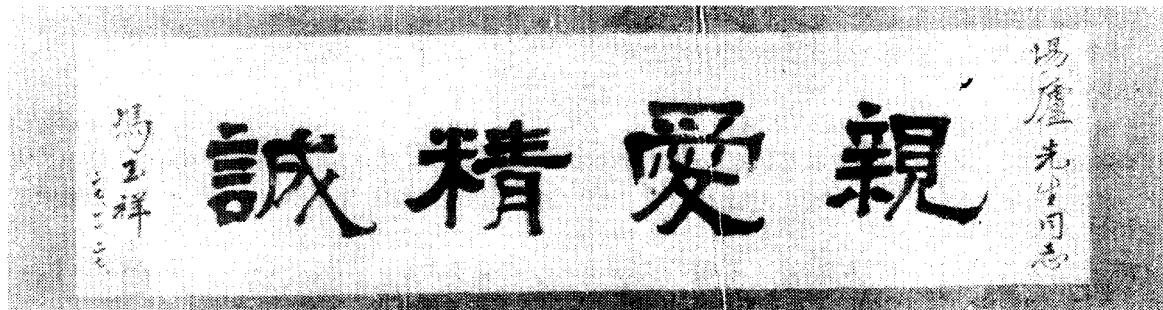
“妹子,不要声张,是我。”

“不许声张!”一道手电筒强光直照在张大麻子的脸上,他自知中了计,正要转身逃脱,雨点般的拳头已劈头盖脸打来,继而一条毛巾塞到了嘴里,几个大汉像捆猪一样将张大麻子装进麻袋中,趁着黑夜,抬上一条小木船,又绑上块大条石,扔进了滔滔黄浦江。

1929年春夏之交,陈治平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以省委巡视委员身份来到徐州,整顿中共徐海蚌特委。

这年10月,贾汪煤矿工人因资方拖欠矿工四个月工资,产业工会多次交涉无效,便派百多名纠察队将准备逃跑的矿场经理李剑池寓所团团围住,并通电全国,举行全矿大罢工。资方被迫答应工人要求,罢工取得胜利,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大闹铁道门”事件。此时,蒋桂军阀正为争夺中原磨刀霍霍,而江南红军在毛、朱率领下进军赣南、闽西,发展人民武装,扩大革命根据地。鉴于斗争形势的需要,这年11月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恢复中共徐海蚌特委,陈治平任书记,陈力真、孔子寿、孙叔平等为委员。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决定“凡有一兵一枪一弹”“皆要起来暴动”,而中共江苏省委则发出了“一个人也要暴动……,没有一杆枪也要派师长”的命令。



陈治平受命组建红十五军之后，便积极到萧县、永城、砀山、丰县、铜山、宿迁、泗阳、睢宁诸地活动。

陈治平为组建红十五军，利用敌人中原大战之间隙，发展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如第一师在萧县组建，成立了师独立营，在攻占黄口车站时，歼敌一个连，缴获长短枪 200 支。陈治平为扩编红十五军曾亲自去鲁南抱犊山争取鲁南土匪头子刘桂堂（外号刘黑七），结果，刘不同意我党派干部进去，陈治平只得悻悻而归。

在组军暴动之时，陈治平对上级的“左”的指示便有抵牾。他与陈力真等人的谈话时动情地说：“武装割据应在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区首先展开，而在敌人心脏要害地区、交通枢纽地带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接着，他以手指着脚下说：“老蒋几次三番坐镇徐州，又把他嫡系第一军安插在这里，我们稍有风吹草动，他便了如指掌，创建红十五军难哪。”

年底，陈治平奉调回上海，任江苏省委农运书记、军委书记。

1932 年秋，陈治平奉中共中央之命，接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此时开封市委书记已叛变，陈治平一到任就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并立即解往武汉行辕。

心灵塌方

陈治平被关押在武汉警备区一所楼房里。起初，他抱定必死决心，只求早日结束生命。可是，来到武汉以后，他惊奇地发现，无论吃、住，都很优厚。“哼，想以此软化我，办不到！”在陈治平自我鼓励革命斗志的同时，在他的心里还回荡着另一种声音：“淑媛到开封了吗？她知道我被捕么？”陈治平一想到妻子，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心急如焚、焦躁不安的神情。

如何处置陈治平，蒋介石召来戴笠，要让戴笠先拿个意见。

戴笠略作思考道：“校长，陈治平活动能力很强，搞暴动，搞工运，搞军事，搞党务，都是好手，对党国威胁甚大，从这个角度看，杀他以绝后患，恐不为过；不过，此人是黄埔生，在高级训练班受到训导，如他能自首，

为我所用是最好，实现校长以匪治匪方针的……”

“今天下午我就以师生之礼接见陈治平，到时你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蒋介石对戴笠吩咐道。

下午二时半，蒋介石身着长衫，双手背后，立在窗前，见陈治平进屋，笑着说：“你就是治平吧？”

陈治平不卑不亢地举起两目望了一眼蒋介石，没作任何回答。

“你是黄埔几期的呀？”主人机敏地改换了话题。

陈治平迟疑了一会回答道：“三期的。”

“哦，很好，很好。既然是黄埔出身，我们就是一家人嘛。”

“雨农，你们过去相识吗？”蒋介石转问戴笠。

“在校见过面，不算很熟。”其实戴笠是黄埔五期生，在校时根本不可能认识陈治平。

蒋介石显得欣赏的样子，接着发表一串“宏论”：他要象对待戴笠一样重用陈治平。他要陈治平看清当今大势，共产党是绝对成不了气候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你们搞起义，搞农民暴动，如今有何结果？至于你们共产党内部自相残杀，你比我更清楚。这两年你们在赣西南、闽西地方，乃至在红军里肃‘AB团’和‘社会民主党’，无辜杀了多少人？对这些你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就不该认真反思？

蒋介石的一席话，从几个方面向陈治平的思想薄弱处发起了猛攻，确也震动了听者的心旌。但陈治平最后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校长的训示自成道理，但治平乃共产党员，对此恕我不能领受。”

“希望你认真考虑我的话，有什么想法，可以多和雨农谈谈。”

陈治平几十天的日思夜虑，时而条清缕晰，时而乱麻一团，时而一片空白。他从未感受到在生死十字路口的举步是如此维艰；于此同时，陈治平的头脑里再度重复着一个问题：我不是少年立志，要以解放人类为己任么！而眼前境遇，当如何处置才符合信仰初衷呢？陈治平在思想斗争中，党内那些消极因素——无可讳言，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上半叶，中共中央的“不稳定”、“不成熟”的确招致一系列路线、方针上的严重失误。这

一切渐渐地促使陈治平从心底深处回味起蒋介石的谈话：共产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实际？共产党和国民党究竟谁更能救中国？

生与死和政治信仰像两条无形的皮鞭不时地在抽打着陈治平的灵魂，同时，他也在拼命操纵这两根“鞭子”，为自己的下一步开辟道路。既然国共两党都称自己为国为民，而从两党力量消长来看，前者比后者更有前景，我陈治平何不留下几尺身躯，继续施展抱负呢？就这样，陈治平找到了一种妥协、一种平衡、一种安慰、一种解脱。他，终于向右跨出沉重的一步，走到青天白日的旗帜下。

后来，在写不写公开发表的自首书一事上，又进行了一番周旋，直至12月初，还是陈治平作了屈服，他写的自首书公开见诸报端。

人生有时是个难解的不定方程式。昔日出生入死率领群众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不息的“英雄”，今朝一经叛变，心灵像着了魔似的爆发了雪崩和塌方，死心踏地地为宿敌效劳。陈治平从武汉蒋介石行辕出来，随戴笠等人来到上海。这时，上海的监狱、拘留所里正有一批被关押和审讯的共产党人，陈治平的出现起了敌人不能起的作用。由于陈治平的出卖和劝降，江苏尤其是徐海蚌的党组织遭致严重破坏。为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1933年元月一日作出了《开除余×、徐××、袁××、陈治平等党籍的决定》。陈治平感到自己臭了，黑了，见不得曾爱戴、敬重、信赖过自己的人了，就希望过去的同事、战友、部下都一齐变黑、变臭，这样似乎自己也就少臭、少黑、少见不得人了；他找的“垫身”越多，心里就越具坦然感、安全感，甚至还有一种“尽职感”——过去给大家领错了路，现在也该充当走回头路的带头羊。

他担任了国民党特工外勤组织——“南京市实验区”副区长，工作更是卖力，接连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抓捕并劝降一批地下党领导人，深得陈立夫、徐恩曾、季源博等人的赞赏。

“南京实验区”是1933年3月由陈治平参与创建的。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和“特务工作总部”在南京市及郊区进行情报、侦察、抓捕、审讯的直属特务机构，同时也是管制叛徒和训练各地中下级特务骨干的实验单位。当时在瞻园特工总部还下设一个“细胞委员会”，陈治平兼任委员会主任。其时，特务人员在各个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和城乡基层单位早已布下了情报网。特务们统称这些人为“细胞”。在首都南京，上到国民党中央各机关，下到大中学校、大工厂、大饭店、重要人物家中都或派或发展“细胞”，设眼线。

魂系战场

1935年初，中央红军三万余人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四渡赤水，兵逼昆明。蒋介石一面急调重兵围追堵截，在长江沿岸构筑封锁线，一面加强和重新部署国民党在贵州的党务，委派陈治平入黔主事。

陈治平在贵州任上，充分施展了他的组织才干，上上下下都说他给贵州开创了“黄金时代”。这“黄金时代”的体现分前后两段，前段以整顿和振兴党务为主，后段以发动和组织黔人大搞抗日救亡为主。他“大刀阔斧，广肆活动”地大办党务是从搞青年运动入手的。他组建了“贵州省青年阵地社”，深入各市县、党政机关、高校中学、民众团体；他还重视妇女运动，身兼贵阳女师教员。一年之间，把原来死气沉沉的各级党部搞得热热闹闹。至此，省府各厅处行政官员，乃至省主席，都不敢不“正视”党部，因为党部“有青年，有人民众庶，有各行各业社团，一句话，有力量。”后来陈立夫就承认过陈治平“是个会办党务的人才。”

一天中午，有人给陈公馆送来一封信函，省党部秘书长俞嘉庸便将那封署有“广东省政府函笺”的信交给陈治平。

陈治平边看信边对俞嘉庸惊呼：“唉呀，嘉庸兄，你知道是谁来的信吗？”

“对方没说什么，我也没有细问。”俞嘉庸答道。

“老俞呀，告诉你千万不可说出去。来信的不是别人，他是我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叶剑英。”

“哦，他怎么会突然来这么封信？他信里都说了些什么？”俞嘉庸惊诧不已。

“他和周恩来先生都是我敬重的老师。”陈治平说得很慢，“你知道，我和周恩来都是淮安人，当年在上海搞工运，我和他私交很深，在‘六大’会上，我们也相交甚笃，可我已改换门庭，成了变节之人。如今，叶先生率兵入黔，只可惜师生竟无缘重晤。”稍停片刻，又接下去说道：“叶先生这封信，主要是申明红军长征之目的是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于危亡，希望国共两党停止打内战，同心协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他以师生之情告诫我，不要做任何亲者痛仇者快之事。”

“那你眼下的态度呢？”俞嘉庸试探着问。

“这个，你不要多问。既然我是中国人，抗日也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入夜，陈治平独自一人伏几而读。他读的是《共产党宣言》，虽说已看了多遍，可要读懂则往往不易，而真正化入自己的言行，成为不可移异的信仰则又难上加难了。

“杨庐，还不睡呀？！”张淑媛见丈夫还在埋头读书，便催促道。

“淑媛，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就是奇怪。拿自己来说吧，做共产党员时天天搞斗争，拉队伍，可马列的书只懂个皮毛；如今，我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但内心崇拜着马克思和列宁啊。”

一个人当他在飞黄腾达、政绩斐然的情况下，能自感心灵空虚，那是一个探索者“追求新境，毫不停步”的良好心理素质；而面向马列求援，正是探索者在征途上拨准投向的标志。潜蕴着爱国良知的陈治平，被长驱直入的日军铁蹄所震惊，被民族危亡的现状所激奋，被中共抗日主张所呼唤，逐步地不能理解也不愿接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抗日战争为契机，陈治平进入了由投蒋忠蒋到疑蒋、离蒋、反蒋的艰苦转变过程。

西安事变发生后，陈治平对张学良、杨虎城捉蒋放蒋，以促其抗日的大义大勇，发出由衷的敬佩。张学良将军于南京被扣，陈治平心境转为压抑和灰暗，常常一人在家喝闷酒，或每每诵读岳飞《满江红》和曹植《赠白马王彪》以寄心志。

抗战爆发后，陈治平把擅长办党务的热情和才干，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一面创办“贵州省边远农村工作团”，将近百名高中毕业男女青年集训一月，分黔南黔北两队深入山区、乡村。这批被誉为“青年楷模”的团员们，着军装，穿草鞋，徒步跋涉，走村串寨，进行抗日宣传教育，以及征兵、禁烟等活动；一面又组织几批“贵州省战地服务团”，先后前往武汉、江西、河南等地抗日前沿，其中第三批陈治平担任团长，亲自率队，奔赴长沙大火后的湘赣前线，为九战区建议和开创了湖南荣军垦殖场。此后，陈治平又率领边远工作团和部分战地服务团成员去山东敌后打游击。这样，贵州儿女在陈治平的倡导下，把足迹遍布长江两岸和黄河南北，把血汗洒向抗日后方和前线。

由于他具有一定的军事理论修养，又直接组织过武装暴动，率领部队打过仗，近几年又比较系统而专注地阅读了马列著作，所以能够比较深入地分析中日双方优劣和战争态势，认识到中国军民的对日作战之主要手段应当是游击战。他在自己著作的首页上，用毛笔写了“雕捉”两个楷体字作为书名。

“什么叫‘雕捉’呢？”一次在掩体里，当陈治平绘声绘色地给士兵们讲述游击战术时，有人这样问他。

陈治平诙谐而风趣地说：“我讲的是‘雕捉’，而不是‘捉雕’。‘雕捉’，就是老鹰捕捉猎物。我们打日本鬼子，一定要学雕，像雕捉鸡那样去干，才能取胜。如果改成‘捉雕’，那不是人去逮老鹰了吗？意思全反了。”听者

豁然大笑。

陈治平继续发挥：“老雕在捉鸡时，它有三大特点：一是准。它在高空飞，在低空旋，发现目标，死死盯住，看牢，一捕一个准。打日本，不比打土匪，敌强我弱，我们要避其锋芒，找准其最好打的一股或数股，死死盯住围住，吃掉它。二是快。野鸡、兔子跑得都很快，老鹰如果迟疑，速度稍慢一点就会捕个空。这就是说，打日本，更要讲究兵贵神速，争取时间优势，不然，吃不了敌人反而会被敌人吃掉。三是活。兵不厌诈，声东击西，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敌人转圈钻洞，我们也可对付有方。这里头的奥妙，实在无穷，就靠我们自己不断学习和总结了。”

半年后，陈治平完成了军事著作《雕捉》的初稿，约十万余字。可惜此书未能面世，草稿也早佚失。

1941年底，沈鸿烈自山东奉调重庆任农林部部长。后来，在他的举荐下，陈治平出任农林部专员。于重庆期间，陈治平结识了一批国民党高级党政要员，这为其后来筹组“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和开展秘密反蒋活动，奠定了坚实的人事基础。

陈治平在重庆留下了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他曾三次乔扮至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门口，有时良久伫立，有时来回徘徊，也亲眼看见周恩来、邓颖超迎客送客、下车上车的情景；他几乎要闯进去，握住他们的手，畅述内心情语。然而，他又一次次把机会放过，快快踱步而归。回到家中，又扼腕懊悔叹气。张淑媛见状，不止一次地劝他：“我们和周先生是老乡，你们过去在一起又那么亲密，你当时的工作做得也很出色；如今你们居住同一城市，一同抗日，你去见他，难道周先生、邓大姐会把你撵出来么？”陈治平沉默了许久，缓缓说道：“撵我当然不会。要知道，我有历史上的那么一段，要是见了面，话又怎么说起呢？”是的，人虽有意，历史无情，自上海分手，陈、周两人终生未能相逢。

江南弄潮

1946年3月底，沈鸿烈赴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陈治平调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由于沈鸿烈对陈治平的信任和器重，在浙江时期，客观上沈成了陈组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和秘密从事反蒋活动的一把大“保护伞”。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人民反对，坚持独裁和内战方针，这种“与历史相拔河”的行为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一批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他们用不同的名称和方式，组织社团，联合中共，以期推翻蒋政权。“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也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一个产物。

同时,他还组建了一些孙盟外围组织,一手创建了“浙江省农村文化促进会”,积极参与组建“中国农工通讯社”“大众社”等团体。这些组织有全国的,有地方的;有公开的,有秘密的。那个时候,陈治平的住处像个免费饭店,总是保持三四桌人吃饭,均为四菜一汤。人员常变,但人数不减,天天如此,常年不断。陈治平对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食客”真正做到了礼贤下士,他们 also 心甘情愿地或出谋划策,或联络关系,或传递信息,有人据此称陈治平是“当代的信陵君”。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陈治平下班回家未走几步,突然迎面与一个手提旅行小皮箱的中年男子差点撞个满怀。双方一抬头,不禁都大笑起来。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孙盟常委之一,负责总务的贺耀祖。贺是陈治平在重庆时结识的国民党一个要员。1945年贺在重庆市长任上,就与毛泽东、周恩来打过交道。那时正值国共谈判,贺耀祖为尽地主之谊,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来到其府上吃饭,并约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作陪。席间,贺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道:“毛先生,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多有牺牲,今后万万不能再打内战,让百姓重新受苦。如果蒋委员长硬要打共产党,那我也要当共产党了。”毛泽东听罢,起身握住贺耀祖的手,继而端起酒杯,在大家面前巡了个半圈,笑着说:“来来来,为我们国共两党能够继续合作,防止内战,共同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干下此杯。”在座包括方治在内均举杯饮尽杯中酒。但事后,方治向蒋介石密报此事,蒋介石听罢,恶气陡生,“娘希匹,贺耀祖他想干什么!”没过多久,贺耀祖被撤职。

“目前,我们的活动经费很紧张。”贺耀祖找上门是来要钱的,“我考虑了多日,老兄不是与财政部俞部长很熟吗?你可否亲自出马,找一找他,弄点经费来吧。”

陈治平弄来多少钱,无从知晓,俞鸿钧给陈治平送来一身毛料礼服,可陈治平却婉言谢绝了。

杭州是陈治平向人生终点冲刺的地方。西湖波涛曾日夜激荡着他那上下求索的心潮。在这里,定下了他后半生旅程上的两个起跑点:一是1946年冬,蒋氏天下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陈治平借口有病拒绝蒋介石电召,明确表示不参加竞选;二是1948年6月下旬,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辞职,陈治平也随之于9月初辞掉自己在国民党政府中的一切职务。从政治上、组织上割断了同蒋政权的关系。前次是拒绝蒋介石的拉拢,后一次则为了保护自己,以便完全隐入地下活动,因那时他的名字早已上了特务的“黑名单”。

蒋介石、陈立夫深知陈治平的组织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对其拒绝竞选恨恼尤深,却又不便轻慢,于是

决定采取先扬后抑的办法。不久,蒋介石和陈立夫联名约见陈治平。

当陈治平刚刚在办公室门口出现时,蒋介石、陈立夫双双站起来,走上前去,和陈握手,然后挥手示意,请他就座。

蒋介石现出一副礼贤下士的面孔笑着说道:“你是党国有身份的老同志了,听说你到底没有参加竞选,多可惜呀。”陈治平作了一番解释话未说完,蒋介石摆摆手,笑说道:“这点倒无关紧要,我不过随便提提,也是替你惋惜。眼下正是党国用人之际,我想,如果你答应,我准备委任你去做一个南方大省的主席。你看怎样?”

“谢谢委员长的栽培,杨庐实在难当此重任,谨请委座鉴谅。”陈治平委婉而又干脆地作了拒绝。

“人心叵测啊,娘希匹!”陈治平刚告辞,蒋介石当着陈立夫的面,破口而骂。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宗旨是“联共反蒋”。在联共上它采取了两个渠道:选派韩梅岑、杨冲如前往香港,通过李济深向中共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潘汉年接洽联共事宜;同时,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与中共中央直接沟通。而中共华中工委对陈治平的策反,则是一个很切实很具体的指导和推动。孙盟有了这个背景,工作开展得更加活跃而实在,他们派遣张达生先后三次潜往江北,接受华中工委具体任务,递送有关军事情报及长江南岸水文、地形等资料。

沈鸿烈于1948年6月22日获准辞去浙江省主席之职,同日由陈仪接任此职。说来也是蒋介石失掉人心,难免四面逢敌,这边去了一个暗中庇护孙盟的省主席,那边来了一个直接介入孙盟活动的省主席。

本来,陈仪是不愿接受此任的,陈治平、许闻天、高宗禹三人专程去上海宴禄安路陈寓彻夜密谈。陈终于答应去浙江赴任,并支持孙盟在浙江的活动。陈仪能这样应允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当时就这样说过:“蒋介石不死,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他不可能同共产党妥协。但是,大势所趋,共产党总是要过来的。”

陈仪赴浙任职后,孙盟负责人又动员陈仪去策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陈仪竟说得很干脆:“恩伯他能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归国后又到南京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任参谋,都是我一手推荐的。他听我的话,可以叫他和我们一起反蒋。”

“现在的汤恩伯,不是过去的汤恩伯,要特别注意。”有人提醒道。

“不成问题。”陈仪信心十足。为配合这个大的行动,陈治平向陈仪介绍一个辅助方案:“汤恩伯的高参少将陈祖敏是我们镇江支盟负责人严一民的小舅子,他们的亲戚关系很好,可以增加这一渠道,从下面对汤

恩伯视情进行工作。我已对严一民作了布置。此安排可供陈主席参考。”

在这个密会上几个人异常兴奋,似乎他们成了历史转折点的重要推动力,似乎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壮举:京、沪、杭一带所有机场被封闭,吴淞口、宁波港被封锁,大批海军力量及物资被拦截,蒋介石被活捉……

南京大行宫十字路口东北隅的一座二层楼房,是中国农工通讯社和文风书店所在地。辞职后的陈治平突然出现在这里任通讯社会副社长,兼文风书店经理。这是对外挂名职务。实际上他在全身心地从事孙盟工作。解放前夕,孙盟需要他在南京这个重要活动据点主持工作。

浦江喋血

汤恩伯于密室里独自一人反复审阅陈仪的亲笔来信。这一两页薄薄的宣纸,对他来说却象一枚烈性定时炸弹。何去何从,必须执一而行;若是从计,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到时活捉蒋介石,不是办不到的,但对党国来说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汤恩伯理清了思绪,下定了决心,拍床而起,命令侍官备车,立即上路。

自1949年元月起,蒋介石辞去总统之职第三次“下野”,住在浙江奉化老家。这时,他虽深居山野,却仍一手操纵军政大权。汤恩伯毕恭毕敬地呈上陈仪的密信。2月21日,陈仪之浙江省主席职忽然被免,他赴沪希图汤恩伯保护,不料反遭汤拘捕,解于衢州软禁,旋即解台湾,次年6月,被枪杀于台北。

撤职和拘捕陈仪只是汤、蒋密谋于奉化的一着棋,另一着棋则更为狠毒了——通过陈仪顺藤摸瓜,派人混入孙盟,伺机一网打尽。

汤恩伯的高参陈祖敏因为严一民的社会关系,自然也就被其主子看中。孙盟和汤恩伯同时看中陈祖敏,给陈祖敏这个少将军涂上多重色彩。

在严一民的引荐下,汤恩伯的高参陈祖敏拜见陈治平。他不仅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以及国共两党的性质、力量、前途,来表示自己已深明大义,愿意举旗反正;还大骂汤恩伯不仁不义,卖师求荣。后来,他又保证:举事时他手下有一个师完全听从指挥,一个师持观望不介入的态度。

严一民、陈治平以及孙盟其他负责人没有去做反侦察工作,被陈祖敏的假象蒙蔽;后竟接受陈祖敏加入孙盟,参与一些重大活动。

一张无形而有力的网在孙盟组织中张开、收缩,但孙盟无一人发觉。

1949年3月28日上午,上海山西路口南京饭店六楼会议室,由陈治平召集和主持的会议正加紧举行。陈祖敏也照例出席了这次会议。

陈治平在会上报告了孙盟与中共华中工委联系以来,对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辖区内国民党军策反的进展情况,并传达了地下党转来的江北指示,然后着重提出并部署如何配合解放军渡江及解放上海等事宜。全体与会人员对地下党的指示及孙盟下一步工作任务进行认真讨论,逐个落实具体人员、期限、要求、措施、方案等。

会议一直进行到中午12点才告结束。与会者个个精神振奋,神情严肃,正准备各自离去。

这时,陈祖敏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诸位,请留步。现在是中饭时间,祖敏已安排好便餐,请各位赏光。”

众人一同步入楼下餐厅。

酒菜满桌,彩灯竞放。招待小姐正纤指轻举,给每位佳宾斟上美酒。

“来人!”陈祖敏一声威喝。霎时间,拥入十余个端卡宾枪的宪兵。陈治平等至此方知中计,正欲夺路而逃,只听陈祖敏命令道:“快给我统统拿下!”

沪宁线上的孙盟组织大多遭到破坏,许闻天、金绍先等也被捕。由于许、金系国民党立法委员,军警擅自逮捕立委成员是违法的。孙盟对此大造舆论,登报、讲演、上访,闹得南京上下沸沸扬扬;又时值国共谈判再开,为顾大局计,李宗仁、何应钦不得不出面过问,许、金等得以释放。

陈治平遭捕之后,其昔日旧部及亲友也频频奔波于沪宁之间,进行营救工作。经艰辛周旋,有关当局提出要救陈治平一命,必须交齐一百条“黄鱼”(黄金)。孙盟根本无法筹集如此巨款,营救未能奏效。

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审讯,陈治平身心俱遭摧残,然而,除陈祖敏所知的一些外,他守口如瓶,敌人得不到其它半点东西。

警车从看守所开进开出,所里各个牢房爆满。

一天,放风时陈治平经过一间公房,忽听一阵电话铃响,他有意无意地听到这方的回话:

“嗯,我是黄浦看守所。”

“什么?现在就送一批犯人来?不行!我们这里早已爆满,一个空位都没有。”

“明天?明天傍晚来可以。明天下午有五名犯人要‘上路’,1号牢房可以腾出。……好,好。”

陈治平立时意识到敌人对自己就要下毒手。他情态如常,只是抓紧放风的宝贵时间,在红日蓝天下深深地多呼吸几口清新的空气。

5月11日,一阵呼名唤姓的尖叫声把各个牢房全

都震惊了,犯人们扒在各自牢门口,凝神注视着眼前发生的情景。

陈治平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抬头挺胸,走在前面,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依次紧跟其后。各人都面带微笑,仿佛不是走向刑场,去和阎王相会,而是走向战场,作最后一次殊死的拼杀,又象是进行一次愉快的旅行,将尽情饱览中华大地无限美好的河山。

“难友们,多多保重,我们先走一步了。”

“黎明前的黑暗并不可怕,也不会长久,太阳就要升起。”

“坚持斗争,不怕牺牲,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亲爱的同志、难友,当你活到明天,请不要忘记我们,请一定代我们拥抱太阳,拥抱新中国。”

陈治平每说一句,另四位便紧随着重复一遍,声如洪钟,响震屋瓦。

陈治平等五人登上一辆军用大卡车,风驰电掣而去。

看守所里死一般宁静。

难友们扒住牢门铁栏,在默默背诵着陈治平留下的遗书:

……我的死是光荣的、愉快的,也可说是求仁得仁,你们不必过于悲伤,……我的狱中四十余日,终日和一些朋友们谈心说道,读了很多的书,哪一部中国通史,都叫我详细的读完了。……我生交了不少的忠肝义胆的朋友,你们的生活问题,他们一定会设法照顾的,……好好照顾孩子们,好好的求学,立志做人,继续吾之事业,如无法上学,可叫他们到工厂去做工,学一技之长,……希望你们还能保持我在世时之融融熙熙。

陈惕庐书于狱中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一日

从黄浦看守所通往闸北宋公园的马路上,行人驻足,车马停驶。陈治平昂然挺胸,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陈治平以空前的加速度跑完了人生旅程,这再度表明了他政治上的真诚回归,也给自己充满苦难而神秘的一生画上了闪光的句号。

就在陈治平5人被绑赴刑场的途中,有两个花絮很值得捡起珍藏:一个是,执行死刑命令的卫兵,竟是陈治平过去的警卫员。当这个卫兵在卡车上猛然发现他昔日敬重的首长时,顿时惊呆了,好久,才轻轻对陈治平说:“我事先一点不知道是你。我无以报答过去你对我恩德,在执刑时,我给你保全个整尸,并让你少受一些苦。”而这个卫兵在行刑完毕后,便突然疯了,从而成为上海滩的一段谜案。另一个是,陈治平的战友、

中共地下党员、孙盟常委成员侯桐正好从闸北路过,他亲眼所睹、亲耳所闻了那壮丽的场面,后来他特地向组织作了汇报。然而,陈治平自己,却永远不会知道此节了。

罪恶的子弹发出短促而沉闷的声响。5位壮士的身躯慢慢倒下,鲜血渗入宋教仁公园的草地上。

余波三叠

1949年9月新政协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在筹备工作报告中特地提及此事。不久,孙盟宣布自动解散,多数成员转入“民革”,许闻天、贺耀组等被选为“民革”中央委员,陈治平本为“民革”成员。1950年8月,根据“民革”中央秘书处的公函和“民革”南京市负责人邓昊明等人的建议,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民政局追认陈治平为革命烈士,发给张淑媛上海市人民政府第00253号烈属证。同年12月,陈治平次子陈幼庐在朝鲜战场牺牲,张淑媛成了双重烈属。鉴此,陈毅市长曾亲自到张淑媛家看望过,并指示有关部门帮助她安排子女读书或就业。

1963年3月,太湖畔发生一起涉外事件。一个老和尚披袈裟,当着海外游人浇油自焚,造成恶劣影响。事情报到华东局最高领导人柯庆施那里,他拍案断言,这“和尚”不是别人,是陈治平,当年杀掉的是“替身”。当公安部门确认和尚并非陈治平,并指出陈氏已为烈士时,柯顺用手红铅笔在报告上批道:“陈惕庐是大叛徒。……他的被枪毙,是他们内部争权夺利或其他原因的结果。”统战部的报告在首长批语“争权夺利”之后衍出“自相残杀”四字,之前加上“估计”二字。民政局则据此于同年6月26日将张淑媛的00253号烈属证吊销。

上海市统战部在向市委上呈吊销烈属证报告的同日,即1963年4月18日向广州市委发出公函,指出陈治平被杀是其内部“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所致,故吊销陈家之烈属证;随之提出陈治平次女陈康维夫妇应调离公安部门工作。据此,陈康维由公安局移民办调入农林水办,并于“文革”期间遭到严格审查;其爱人张荣也受到株连,提拔公安局长的事因此告吹。

1975年的4月16日至8月6日的110天内,广东省惠阳地区公安局、地委政法委、地区农办联合调查组,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地50多个单位,查找历史档案和资料,调查访问知情人。联合调查组得出两点结论:一是陈治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原因在于他接受并执行中共的策反任务;二是陈康维的家庭问题不影响对其本人的使用。

两年后的1981年2月13日,上海市统战部作出

了《关于陈惕庐历史问题复查结论》和《陈惕庐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复查结论是“对陈惕庐可不以叛徒特务论定,但亦不宜享受烈士的光荣称号。”

如今,上海市“民革”接受陈治平子女的请求,正为它的成员陈治平恢复烈士称号的事做自己的努力。

题外絮语

陈治平给自己一生画了两个螺旋式上升的圆圈。一是对共产党信仰——动摇——背叛——重新认识——更高层次的信仰;二是几乎与此同时,对蒋介石反对——屈从——忠诚——怀疑——重新认识——自觉而彻底的反对。这两个“圈”相扣相抵,相反相成,演出了“红”——“黑”——“红”的人间悲喜剧,涂下了色泽斑驳的人生轨迹,有人将此称为“陈治平现象”。

从陈治平现象独特的角度揭示出中国历史的走向,为世人和后代完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能够救中国的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党派或任何一个人,而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列宁曾指出:“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的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十分详细研究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当我们掌握并研究了陈治平一生的全部具体情形,就不难发现,陈治平的回归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转变来自辩证法的威力,来自陈治平的求索精神。陈治平现象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正在于此。

纵观陈治平的政治生涯,那是一条大跨度、多曲折,乃至波澜涌动的人生旅程;若再扫描陈治平的心绪,则会看到他锐意追求新境。这个多层面的充满矛盾而又始终统一着的历史人物,又象一具多棱镜,映照出社会的复杂和人生的艰辛。

然而如何给陈治平现象以历史的科学的公正的评价似乎至今没有解决,这里,试予简介并作一析:“叛徒论”者,选择甚至改变历史人物的某一环节,以此代替整个过程和全部历史;“政治投机”说,忽略了人物转变的历史背景和主观动机,也无视革命阵营对其争取拉拢的事实;“功过抵消论”则把组织处理上的“将功折过”和历史评价的“还人物本来面貌”混为一谈;若以发展趋势和最终归宿作为评价人物的重要依据,就将得出“烈士”的结论。当然,陈治平现象的特殊性就在于,陈治平的鲜血一半洒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上,一半被用来冲刷自己的历史污痕。还有,市统战部的“可不”和“不宜”也当算是一种吧,而且是来自一级组织的书面结论哩。

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并不怎么在乎身后的结论,而是他如何活著,活得怎样。看来,这两头陈治平都是沾

1950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致电陈治平家属。



不着的了。人,自从降到这个世上,究竟是为谁而生活,而奋斗?为自己,为别人?为小家,为社会?陈治平在情与理的冲突中,他艰难而苦寂地完成了“理”的追求,从迷惘中奋起,终于得以清醒和自慰;他淡漠了“情”的温馨,抛妻别子,惶惶奔波,弃高官而为黔首,舍毛裘而著布衣。假使陈治平对蒋介石从一而终,不计是非功罪之辨,那自有嘉褒,终身荣贵,后代得荫;假使陈治平随蒋迁徙台湾,面临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日益趋同的今天,那他又将是什么景况呢。当然,历史事实不能假设,然历史逻辑是可以推导的。

盖棺 45 年尚无定论,对这位死者来说,他生前已有“不管共产党对我如何评价”的思想准备,在遗书中也一再表明他的死是“求仁得仁”,“心中毫无遗憾”。他可聊以慰藉的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生命中的最高最强音,恰恰正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是的,陈治平以此为归宿。

然而,对于活着的人们,难道也认为盖棺不定论就是陈治平现象的结局,就是陈治平的归宿!?

(童乃元,现任江苏淮安市党史工作委员会主任。)

(责任编辑:刘家驹)

农村“四清”： 十年动乱的前奏曲

●杨克现

——一位老记者亲身经历的严酷现实

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简称为“四清”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摘自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64年秋，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了“大兵团作战”的高潮。我，几经争取，从一名新华社记者，变成了一名“四清”工作队员，到长安县社教工作总团报到。

那时，在一般难掌握自己命运的基层干部看来，我们“四清”工作队员何等威风？可是，有谁知道，只因我据实为中央写了一份“内参”，竟为自己造成了绵延多年的苦痛，方懂得作一名“举世非之而不为其摇”的求实的记者，是多么地不容易！这，非得有一种敢入地狱的精神不可，而我还很难说是迈出了第一步。

我本是怀着知识分子净化自己灵魂的心情来参加社教的。据我们的长辈们介绍，知识分子只有到基层去，到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经受锻炼，接受教育，才能得到脱骨换胎的改造。但报名那天，社教总团办公室负责人李屹阳同志见我来自新华社，便以革命需要为由，

强留我在总团机关筹办《长安社教报》。我申辩自己是来接受群众运动锻炼的，必须到基层去方能脱骨换胎。但她说：“锻炼，也包括工作团纪律的锻炼。”她是领导，我是被领导，我不好再讲什么，只好按她的指示，将行李搬进工作团为报社编辑指定的宿舍，那是县政府腾出来的一间大办公室。社教期间，县级干部大都要接受审查，不再在里面办公。我们《长安社教报》的同人，便长驱直入进驻进里面。

《长安社教报》是长安社教工作总团的机关报。每周出版两期到三期。因总团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挂帅，所以，人们将它看作是西北地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舆论旗帜。参与这张报纸文字工作的全是临时抽来的“四清”工作队员，有《陕西日报》、陕西省广播电台的副总编辑、台长和普通的编辑记者，也有渭南、三原、礼泉等县的办公室主任和通讯员，加上我，共十来个人。大家汇集到一起，惶惶然，都说缺少办好指导群众运动报纸的经验，心中无数，怕办不好；又说上有中央西北局作依靠，有西北局农村工作部长、长安社教总团团长李登瀛同志作主，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出报。同人中，还有人提议向当年的《晋绥日报》学习的。说：“当年的《晋绥日报》有非常高的权威，即便是对一条编者按语，也讲求语辞的锋利，不按则已，一按下面就要死人。不象现在的报纸，用钝刀子割肉，不痛不痒。”

进入社队阵地前，我们报社的编辑和“四清”工作队员们一起，全都去聆听了有关长安阶级斗争形势的报告，以提高斗志。作报告的是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长安社教工作总团张国声副团长，报告列举了种种事实说明长安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他强调说，整个西北地

区土地改革很不彻底，长安县更不彻底，漏划了大量地主与富农，贫下中农“尚未彻底翻身”；又说，长安曾经是胡宗南和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大本营，国民党残渣余孽不少，他们混入革命队伍，还在残害贫下中农；又说，长安县靠近西安大城市，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勾结一起，正在向社会主义农村猖狂进攻。听了他的报告，给队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安县满眼都是敌情，贫下中农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的队员说：“听了张书记的报告，好似大家要去未解放的西藏一样。”

敌情描述得如此严重，张书记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右”。他说，几个月来，他每次到长安农村调查，每次调查，都发现前次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到最近这次调查结束，自认为对长安县阶级斗争形势看得够严重的了。但是，与西北局的调查的基调对比，仍不得不承认自己“右”。

我虽有着十多年边疆内地农牧区采访的经历，但未亲自参加过土改队等合作化、公社化的群众运动，自思缺乏严格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锻炼，只怕自己“右倾”无疑，难以适应办好一张社教报的要求。便在《长安社教报》正式成立那天，向参加我们会议的张国声副团长提出要求，建议报社最好有记者能与中央领导蹲点的大队取得联系，一来有助于了解基层阶级斗争实际，二来便于争取中央同志直接领导。因为，有内部消息说，中央西北局、党中央书记处都有领导同志在长安农村蹲点。不料，张国声副团长听后将我严厉地训斥了一顿。他说：“上级领导蹲点的地方全部保密，不准随意去采访！”还说：“这种想法是国民党资产阶级报纸的一种思想作风。”我据理争辩，他都无动于衷。我们社教报的同志们全都默不作声。

这就苦了我们刚刚创立的《长安社教报》。大家从办报的第一天起，本想有点作为，却不得不处于一种关门办报的状态。

按照社教工作总团的部署，从工作队员进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四同”开始，到宣讲“双十条”；从扎根串连，到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从工作队重新组织起阶级队伍，到向着农村地富反坏以及“四不清”干部开始发动进攻，运动在不断地发展。整整两个月过去了，我们报纸每期刊登的稿件，全都是我们报社人不曾调查，也不大熟悉的材料。这些材料几乎全是工作总团团长李登瀛同志的批件，和工作总团办公室筛选来的报告，只有少数是工作队的投稿。这些稿件和材料，无一不在说明，长安县的阶级斗争形势比预料的更为严重。其中最令人吃惊的当推总团团长批来的、王曲分团团长、宝鸡地委书记张方海同志的文章。文章认为，工作队进村后，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结果，发现

整个王曲的基层干部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敌对阶级分子，或是漏划的地富，或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或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兼而有之。这些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勾结在一起，专了贫下中农的政，贫下中农怎么能够翻身！

既然长安农村敌情严重得无以复加。那么，按照“双十条”文件精神，运动向前发展，报纸要刊登的材料便是如何打退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问题。如何打退？大家正愁没有好办法的时候，总团办公室为报社转来了西北局领导同志蹲点的细柳分团一个工作队的报告。报告提供了一种新形势下的斗争经验。那是全国各大区社教工作团不曾有过的著名的“小战斗”。其时，我们编报的人都不懂什么叫“小战斗”，幸而来稿有着下面和解释：

“‘小战斗’，就是对‘四不清坏干部’先不开大的斗争会，不采取一脚踢开、撤职、马上夺权的办法。而是要他们按照我们的指挥行动，以他们为活靶子，创造条件使他们犯错误，并把他们当作反面教员，为训练积极分子、教育广大贫下中农服务。”

至于怎么创造条件使他们犯错误，办法也很别致。报告中说：

“对坏干部包庇坏人作了坏事的，通过贫下中农组织他们去处理。如能按原则去处理，就质问他们，为什么过去不处理？如不处理，又质问他们，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为何不处理坏人坏事？通过斗争，使坏干部左右为难，揭露他们的丑恶面貌。”报告说，这是一种将打倒“四不清坏干部”与帮助贫下中农翻身作主同步进行的新策略。即“由训而不倒、批而不倒、斗而不倒，待群众觉悟后，便会收到不打自倒的结果。”

我生平不曾参加过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对着如此复杂的斗争形势，我总觉得，要是一直坐在编辑部关门办报，不仅自己受不到群众运动的洗礼，难以脱骨换胎，而且因为极少了解下情，也很难办好报纸，于是我决定冲破关门办报的限制，下到基层去，那怕是一天两天也好。这当然首先得避开张副总团长的“监督”。是他，最反对我们到上级领导蹲点的地方去。但此刻他在总团附近的皇子坡大队补划地主，整天忙于内查外调十五年前的农村阶级情况，还要对调查来的情况作定性分析，无暇过问报纸，我趁此机会悄悄恳求我们报社编辑部的负责人武英同志，求他允许我下一次工作队。为我提供那怕是一次锻炼的机会，同时也为我们的报纸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以便把报纸办得更好。

武英同志是陕西省广播电台的台长，为人厚道。也许是我的苦苦恳求感动了他，更可能是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原本就认为应当开门办报。他很快地答应了我

的要求。不过，他叮咛说，西北局领导同志蹲点的地方自有来稿，因为还没有开放，谢绝采访，不能去；中央领导同志蹲点的地方，更不能去。我说，我要到阶级敌人最猖狂的地方去。按我们报纸所登，王曲不就是阶级敌人最猖狂的地区嘛！

王曲是著名作家柳青一直体验生活的地方。他在那里写了得力之作《创业史》。此地离县城不远。我稍稍整理一下自己的行装，蹬上了一辆半旧不新的脚踏车，便出发了。一路走村过镇，颇感冷清。因为社教总团不强调召开大的斗争会，也就看不到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场面。但只要碰到如我一样也穿有破旧的蓝色“运动服”（这是群众给我们工作队员服装起的名字）的工作队员，便打听情况，这才知道许多村镇的院落里都有着料想不到的“小战斗”。我一时无心留恋这种“小战斗”，只想先全面了解一下情况再开始重点访问。三里五里一打听，最后迤迤来到王曲公社被认为阶级斗争最严重的一个大队，在村庄尽头的一间农民房子里，找到了一名“四清”工作队队长，宝鸡地区的一位县委书记。他坐在炕桌前正在研究一叠叠材料。

进了门我首先通报自己是《长安社教报》的编辑，是看了他们王曲分团团长有关阶级斗争形势报告的文章才来学习的。我请他就这里的阶级斗争形势进一步发表一些看法。不料，这位县委书记抬头看了看我，脸色冷淡，毫无热情。他漫不经心地招呼我坐上了炕，笼统地说了一些中央文件上说过的阶级斗争如何严重的话，好似在应付我这个总团下来的干部。我有点不耐烦，便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

“你们分团长不是说，你们王曲分团所在这一带地方，农村百分之七八十的干部都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吗！？”

看我认真的态度，他先是一楞，稍一镇定，便下炕去关了房门，生怕被人偷听去似的压低了声音，象是审问我也审问他自己：

“百分之七八十的敌我矛盾！？”

然后，沉了片刻，好似泄了气的皮球，才慢慢地接下去说：

“说实话，够上敌我矛盾的，恐怕连百分之三四十也没有！”

我也楞了一下。忽然觉得这竟是我此行的重要发现：一个是总团极力推荐的宝鸡地委书记对形势的数量分析，另一个是该地委下属一个县委书记不敢告人的也是对形势的数量分析。上下级之间，相差一倍。工作队内部竟会有如此相左的看法！这无论如何是我们坐在编辑部办公室里无法知道的实际呀！况且，谁敢担保，这百分之三四十的数量分析合乎实际吗？

“那你为什么不向社教总团反映？”

我向他说明对形势的看法一旦出错，特别是登在社教报上，它将给实际工作带来严重后果。

“唉，这种时候，谁敢？”

他的声音变得更小了，甚至有点悲惨。不象那种吆五喝六的县委书记。显然，他对形势的估计与他的顶头上司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时下是他的上司的看法在社教总团占了压倒的优势。这对他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他愁锁眉尖。

我再三向他说明实事求是反映情况的重要性。他却说，他参加过多次运动，知道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路线斗争。一个人不能白白地作为路残斗争的牺牲品！我怎么说都无法改变他那固执的看法。

唉，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是作为新华社记者来采访，而是来学习来锻炼的。这样关门的谈话，这样连敌我阵线还分不清楚的矛盾，使我束手无策，我该怎样办报？我该怎么脱骨换胎改造自己！

回到总团的当天下午，我听说柳青给总团来了一封信，说到他的《创业史》中梁生宝的模特儿王家斌也挨了斗。那是一位献身于集体化事业的英雄人物。他挨斗后想不通，只说真正的贫下中农怎么斗他，他都愿意正确对待，但他不能容忍一个坏女人——胡宗南的干女儿向他脸上吐唾沫，侮辱他。我想，柳青肯定也是想不通，才写了这封信的。柳青，在我的印象里，一向是严肃对待生活的作家。联系我自己的王曲之行，我模模糊糊地觉得，“四清”中怕是出了点问题。然而，这只是我自己的猜度，又听说总团对柳青的来信有看法，要求王曲分团派人去复查。我心里在等待有新的结论。几天后，复查的材料报上来了，结论仍是工作队正确，只是柳青知识分子气太重，右倾！这种说法，不要说使王家斌这样的劳模陷入了厄运，对柳青个人，对我的思想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啊，柳青，那位天天与王家斌生活在一起、写出了中国集体化史诗的柳青也会右倾吗？他怎么可能将一个四不清坏干部当作英雄为之立传呢！？那么，向我透露真情的县委书记呢！？他也是右倾肯定无疑吗？！可是，他的真实思想，并不为他的上级知道。比起柳青来，他那“明哲保身”的态度，确也是人生痛苦经验的总结。右，右倾机会主义，要知道，多少年来这都是一个可怕的词儿，大家都象躲避瘟疫一般地躲避着它。自从批斗“四不清坏干部”的“小战斗”打响以后，总团转给我们报纸的“小战斗”的文章骤然多了起来。从版面上的文字看，一个个“小战斗”都打得“十分漂亮”，“战果辉煌”。奇怪的是，工作总团几乎每天都接到“四不清”干部自杀的报告。不到三个月，自杀人数竟超过了五百

人,有人背后说,这是土改、合作化以来自杀人数最高的记录。

自杀,是不能登我们的《长安社教报》的。自杀,按作家的说法,这是一个人丝毫看不到生的希望的悲剧。但我们总团的领导不是作家,他们一直在大抓阶级斗争,并且坚决认为,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来,自杀正是长安县“四不清”干部顽固对抗社教运动、阶级斗争严重尖锐的具体表现。因此要求每个工作队碰到这种问题,都必须就地批判消毒,以重振工作队的威力。此时此刻,纵使有怜惜自杀者的队员,若不是禁若寒蝉,也许都在加强学习后,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能那样雅致和温良恭俭让而“弄通了思想”,调整了心理上的不平衡。

然而,我的心情不能平静。我因有王曲之行的亲身体验,又有作家柳青合情合理的却遭到拒绝的信,再加上那些不便公开登报的一个个基层干部自杀的悲剧,我的社教热情骤然冷却下来,头脑里疑团丛生,又不敢告任何人。那情况就如同一支万人长途行军的队伍一直呼喊着同一口号齐步前进,中途,却有一名列兵,其思想无端地开了小差,想入非非。我在寻思:那些被斗的、自杀的都是阶级敌人吗?不是说这场运动是重新教育干部的伟大运动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不肯接受教育,而选择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道路呢?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是不是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具体到长安社教,是不是“左”了些?还有,基层干部的功过是非,由工作队来评定;那么,工作队要是有了错误,由谁来评定呢?!这些不敢告人的念头伴随着心灵的颤抖而越来越多,驱之不散,终于积成了一团团难以排解的苦闷,压在了我的心头。我只觉得,在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大县,在这近万名工作队员大兵压境的如火如荼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我,一名社教工作队员,一名新华社记者,全然不能快乐地从众前进,反倒陷入了空前的孤独之中。我还能锻炼下去吗?我还能脱骨换胎地改造么?这实在是一种离群的内心痛苦。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有责任了解实际斗争中的真实情况;然而,当前运动的反倾向斗争主要是惩治右倾,我又怕自己看问题太认真而滑向右倾,影响了新华社的声誉,影响了自己的前途,毁灭了自己的一生。

我的思想陷入了极端矛盾的痛苦之中。

然而,我有时又不安份地想:错误,莫非犯错误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我们的长安社教工作团?是工作团发生了打击面过宽,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想到这些,一种潜在的意识,一种忽大忽小,捉摸不定的新华社记者的使命感,在我的头脑里躁动起来。我提醒自己:何不就将这些事为新华社写成“内部参考”发到北

京去,以便使中央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并且通过中央来纠正这种谁也不敢公开站出来讲,却还在不断恶化的错误?可是,转念一想到后果,自己就先害怕起来,哪敢动笔!古人云:“无胆则笔墨畏缩”。正是这一心态,千百年来不知禁锢了多少有识之士的思想,使他们在真理面前却步。我那里算得上什么有识之士!我只能为自己卑怯的心理辩解。我想,长安县是西北地区“四清”的重点,在这里蹲点的国家部长、副部长、司局级的干部将近百名,县级以上的干部五六百人,也不见别人说话,万一是自己看错了怎么办?谁来救你?况且,新华社并没有布置写“内参”。几个月来,新华社“内参”大登特登的一直是各中央局、省委书记们亲自出马大抓阶级斗争的讲话和文章。还没有一个人对于刚刚兴起的“四清”运动有所非议。

我锻炼不下去,只想暂时离开这使我烦恼的长安,找一块方寸之地将自己闭锁起来。一个星期天,我象在阶级斗争中打败了仗的逃兵一样独自从长安县回到了西安市,回到了我们分社那个小院落。将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偷偷地向我们分社的领导作了汇报。不知为什么,我倒希望得到他的批评,那怕是极严厉的批评,批评我这知识分子经不起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洗礼,批评我这记者对于“四清”的动摇,以了却这无端而起的“内参”心愿。不料,分社领导听完我的汇报,竟同意我的看法,还鼓励我向上反映情况。这样,便又使我壮大了胆子,竟将脱骨换胎置之度外,一夜之间,突击出了一份一两千字“内参”稿。稿件写了长安社教的错误和我的见闻,写了长安社教工作团领导将解放已有十五年之久的长安农村看得漆黑一片,将农村干部看得好人少有,并且导致对敌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干部自杀人数直线上升,便是这种错误的严重后果之一。

稿件写成了,我忽然觉得全身轻松,方感到所谓某些重大问题的“内参”,其实并不难写。它无非是要有一种敢于非议“皇帝新衣”的天真无邪的孩子般的勇气。安徒生那篇著名的童话,其实说的是:天真无邪,可以抗拒一切怯懦。只是,我毕竟已不是那么纯真。一年前,我不过给前任领导提了一些正当的意见,便被无情地打成“反党叛国分子”,该提的级不能提,该增加的工资不能增加,还差点被赶出新华社,我的伤痛未愈,不无顾虑。我向这届分社领导同志说:“无论如何,这份‘内参’送阅范围要尽可能小,小到党中央常委几个人就可以了。”我怕这份“内参”转回西北局,无端地遭受批判,后果不堪设想。

这位领导同志表示理解我的心情,满口答应了我的要求。首先在分社保密。他和我都懂得,在重大事情面前,新华社记者有的是社会责任,并没有多少社会保

险。我们的记者队伍中,就很有一些人因为“内参”,被打成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都熟识的老记者冯森龄同志,不就是因为如实地写了拉萨街头见闻的内参,被西藏工委某些领导人斥之为反党,从北京押回拉萨批斗,又送到农村劳动改造么!

回到长安,我一直牵挂着那份内参,晚上做梦也梦到我好像被押送回西安去批斗。然而,1965年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若干问题》救了我。这个在今天看来仍有严重错误的文件,却使得长安已经陷入僵局的“四清”一下子活跃起来。虽然,我那时还不明白“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着严重的破坏意义。但,对于我来说,《二十三条》上的许多提法,仿佛都是针对我们长安社教发生的错误提出来的。例如,我们报上登的长安县农村中百分之一二十、三五十,甚至七八十的基层干部都是敌对分子,可《二十三条》重申的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又例如,我们对付“四不清”干部的办法是一步紧逼一步的“小战斗”,目的在于打倒。可《二十三条》上讲,对待干部要严肃、积极、热情,允许他们申辩。还有,我们常常把不同意见当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路线斗争的反映,可《二十三条》上讲,工作队要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等等。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了《二十三条》,长安县农村的“四清”的僵持局面打开了,从此,运动便“势如破竹”地进行了下去。

指挥万人大军的工作队员转这个弯子,需要的是镇定自若的魄力。我们总团团长被认为是驾驭群众运动的能手。我原来以为,他多少会讲到长安社教的错误的,然而没有。在他看来,气可鼓不可泄,他绝口不讲纠偏,反而要我们报社大讲长安社教的伟大成绩,以防止工作队员泄气。他要我们大讲运动初期对于干部“冷一冷”是必要的,说现在贫下中农真正发动起来了,应当是正确对待干部的时候了,正好,党中央的《二十三条》下来了。因此,必须坚决贯彻《二十三条》。这样一来,整个工作队与贫下中农又全力以赴做干部们的工作。那些犯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经过“洗手洗澡”,纷纷得到解放,“三结合”的基层领导班子也建立起来了。干部自杀风骤然停止了,许多有水分的经济案件,经过群众评议,也给以合情合理的减、缓、免的处理。“四清”之中的清经济也就“顺利”地进行下去了。

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正式获准到各工作队采访。一个礼拜的功夫,一篇在《二十三条》指引下,长安社教运动“势如破竹”的稿件,在我们《长安社教报》头版头条

位置上刊登了出来。这是我们报社记者编辑们自采的第一篇综合稿件。我们还有许多文章要写。然而此时,一年一度的春节也就逼近了,一切也都暂时作罢。按照工作总团的部署,此时,绝大多数工作队员被批准回去过春节,“四清”暂时告一段落,只是因为担心农村“四不清”干部趁机翻案,工作总团又确定每个生产大队都要有一两名队员留守,以继续拉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其实,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形势下,谁还敢翻案!?后来的事实证明,春节期间,并没有发现长安农村干部有谁翻案。反倒是工作队内部,春节后,一些北京回来的工作队员带来了责难长安社教搞得过左的言论。有确实消息说,周恩来总理对于长安贫下中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形势观就作了批评。这些言论在工作团内部暗暗流传起来,长安以外,陕西社会上也有了一片责难之声。这就引出了西北局领导同志在西北局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对长安社教的种种“责难”进行了坚决的回击。讲话中引用毛主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教导,以及农村基层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论断,还有,就是他自己那个讲过多遍的著名公式:“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有时有,无处不有,处处有”,以证明对于长安社教的种种责难是一种“右倾”的观点,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表现。他警告说:由于这些非难,社会上、农村里“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正在刮起了一股严重的翻案风。

我又变得糊涂起来。

我本来因为一篇“内参”常常怀有恐惧的情绪,因为《二十三条》的公布而全然冰释,算是化险为夷;现又因为西北局领导带有严重警告的一席讲话,恐惧感又重新滋长了起来。我不得再一次问自己:难道长安社教不是“左”了,而是我真的右了吗?左左,右右,究竟应当由谁来作结论?革命何以竟是这么艰难!?

此后,为了这一份“内参”的事,我心里总是不安。我仿佛已卷入了阶级斗争的漩涡中不能自拔,阶级斗争的弦紧时我便心情紧张,阶级斗争的弦松时我也便放松。一份“内参”好象联系着我的生死命运似的,虽然是已离开了长安社教,也使我无法解脱。不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我们陕西分社,无论是我们分社社长也好,我自己也好,都很快被当作修正主义黑帮被揪了出来。一份长安四清内参稿的底稿被很快查出来,造反派硬说,这是关键时刻站到反党立场上的铁证。我面临灭顶之灾,一切为自己的辩白不仅无效,反而一步步升级,竟成为顽固不化的敌人了,那里还谈得上脱骨换胎的改造!

1993年4月2日,北师大举行的黄药眠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言论叠出,气氛十分热烈。由于这些言论涉及了许多对我父亲的看法、评价,因而作为人子,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发表一点“难报三春晖”的看法。

会上楚辞专家文怀沙老先生作了精彩、生动、感人肺腑的发言,他认为我父亲不仅是个学者,而且更是一个捍卫真理的斗士。在解放前,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他出生入死,四处奔波,无所畏惧;但到解放后,却变得慎重起来了……。文老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并说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父亲身上,同时也出现在象聂绀弩等一批老知识分子身上。因而文老提出可把这种情况称之为“黄药眠现象”来加以研究。文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父亲之所以这样,是由于他对党——母亲的爱;是因为他怕伤害了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建立的共和国;怕伤害了那千千万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先烈。而正是这样一种感情,让一些极左人物钻了空子……。文老的话非常精彩、动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我想不论是从黄药眠本人来看,还是作为一种现象来看,他的说法都还缺少一个重要的方面。父亲在建国后是变得慎重了,因为人民政府正在实行的,也正是他前半生所梦寐以求的;因为他对党和国家充满了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并没有使他慎重到丧失理智和良知——社会责任感的地步。他本来可以入党,安安稳稳过日子,从四十年代末到反右前夕,曾多次有人希望介绍他重新入党,最后一次是反右前夕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亲自出面,但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了。因而被一些人看作“清高”而恨他。

●黄大地

《黄药眠现象》一解

有感于黄药眠九十诞辰纪念会

因为他对解放后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搞特权看不惯。(文革后父亲曾要求恢复党籍,是因为在当时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大好形势下,党的形象有所恢复,而且党员也同样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另一原因则是他一直认为1937年他从监狱出来后,即到延安与组织联系,结果当时的负责人却要他重新入党,他心里不服,总希望得到公正解决。此事耀邦同志曾亲自过问,但也没有下文,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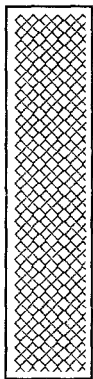
因而我想,如果存在所谓黄药眠现象的话,那么它不仅包括他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同时也应包括他面对新时期社会弊端的斗争精神,他时而可能考虑到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而变得慎重、沉默;时而又不能容忍时弊的肆虐,挺身而出,仗义直言。而正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情绪左右了父亲的后半生,并使他受到了长期的迫害。而且,父亲的这种矛盾和遭遇不只限于自身,同样也存在于当时一批的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干部、知识分子身上。我想这样讲才比较符合黄药眠现象的内涵。

其次,在这次会上,陶大镛先生在介绍父亲的文艺思想时提到“现在有的人认为他的文艺思想有点左,这个左我要先给它加个引号。但从我个人看来,他的文艺思想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他的话虽然仅仅是点了一下,但我想它确实代表了当前文艺界对父亲文艺思想的一些议论。“四人帮”倒台后,文革时期发生的许多缺乏人性和伦常的事情都暴露了出来,并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思考。于是,一些同志痛定思痛提出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命题,并

关于《黄药眠现象》

——复黄大地的一封信

●文怀沙



来信及大作《有感于黄药眠九十诞辰纪念会》均细读，甚为欣慰。

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写道：“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陷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真是慨乎言之。形势（请分“形”与“势”两端，仔细思考之）比人强，从事物整体看应如此。你父亲赞我是“一士沉吟敢直言”，“沉吟”二字下得很准确。我有耽于沉思的优点和缺点；“敢直言”三字不免溢美。应该说我这个人是既“敢”又“不敢”。几十年来，积习难改，我颇像蹲在地上的小孩子放鞭炮，右手去点导火线，另一左手却绕过脖子捂着右耳……继之而来的是自己引发的一声

力图用宣传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目的这样的人道主义的口号来消除阶级斗争论的恶劣影响。但在这场争论中，父亲却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坚持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否定抽象人性的存在。为此引起了许多人的困惑不解。有的人议论说，他在反右和文革中受了阶级斗争论的那么多苦头，怎么现在还坚持那一套呀？也有人说他在诗文中表现了那么多的人情、人性的东西，怎么在理论上却是反人性论的呢？等等、等等，众说纷纭。我想正是出于这一点，人们开始觉得他的文艺思想有点“左”了。但是，照我看来，他们是误解了。

我想父亲之所以持这种态度，除了理论的原因外，可能还有一些政治的原因，他可能觉得光用人性论还不足以肃清文革的流毒和影响，还不足以根除左的势力和避免文革事件的再次发生。记得有一次

黎澍叔叔来访，谈到这个问题，父亲说：“现在左的势力还很顽固，从中央到地方还有许多人为了保护其官僚特权打着捍卫马列主义纯洁性的旗号，抵制改革开放；也有一些人则利用改革开放以权谋私。对于这些情况，我们还是要用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思想意识的方法去加以认识，并从健全、完善民主、法制入手，与这些不正之风做不懈的斗争”。父亲的这种思想在其晚年的文论中有明确的表述。如他在《试评普列汉诺夫的审美理想之生物学的人性论及其他》一文中（《迎新集》75页）写道：“……就是在今天，剥削阶级消亡了，或正在消亡了，但‘四人帮’的影响还存在，商品经济的发达，加以外来的影响，也许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假如我们离开国内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和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或拿这个‘人性论’来否认阶级斗争……，那就只能是对事实的嘲

笑，从而使自己陷于无力的地位。”另外，在《科学技术发达对文艺的影响》一文中（《迎新集》35页）又写道：“……就是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可以预料还会有剧烈的或不剧烈的斗争。因为在国内还有‘四人帮’的种种影响和流毒远未肃清……。”

此外，父亲在其晚年的诗词中，也明确地表达了与左倾势力坚决斗争的不屈情操。如《书愤》：“善举皆成过，何妨尽罪行！劫余留铁笔，白首写苍生。”又如《赠怀沙兄》：“唯唯诺诺乱呼天，一士沉吟敢直言。十载縲继休未得，情深一往唱屈原。”等等、等等。

总之，从他的这些言行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一个斗士，一个彻底的民主斗士，一个阶级斗争论者。但他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也是处在人民地位上的斗士、阶级斗争论者，因而他并不是左。

巨响，这巨响既在意中，又在意外；既使自己喜悦，也使自己悻悻。真的，谁让我爱玩“鞭炮”呢？我这一生虽吃了不少苦头，并不与别人一样，多半乃咎由自取，不能怨天尤地。总之，你父亲的赠诗有他本人理想的投影在。他正是藉此进行自我激励、自我鞭策——期望自己成为“沉吟敢直言”的“一士。”

原谅我对你说大实话，你字里行间洋溢着太丰厚的亲子之情，从而不够冷峻。你只说他“慎重”，却未敢用直白的“胆小”二字；或选用较文诌诌的“悻悻”之类的语词。

四十多年来与我有所过从的文坛朋友中，堪称斗士者，在我忆念中较突出者，至少有阿英（钱杏村）、冯雪峰、聂绀弩加上胡风和你父亲。这五个人有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个性。阿英曾很伤心地悄悄告诉我，有个干政工的小丫头居然冷笑着大言不惭地拍案怒斥曰：“你老实交代你和国民党潘××不可告人的关系罢！你以为共产党是好欺侮的吗……”这是多么滑稽的世相。聂绀弩不止一次对我说：“最初别人说我是反革命我是不服气的。时间久了，指斥我的人多了，我就开始真的觉察到自己是反革命了……”你父亲戴上右派帽子后精神堤防确一度冲垮。那时，他多半是晚间来找我，很紧张，很像是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有一次在窗外发现刘芝明同志在我家客厅里坐，就十分紧张地悄然引退。你父亲难能可贵的是身上没有一星一点市侩、泼皮气（许多文人，包括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文人，三十年代在上海滩住久了，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染上流氓或瘪三气，我这里不想指名道姓了）。他有强烈的自尊心，那是属于真正的民主战士的自尊心，但一旦遭到自己营垒中人

的蹂躏，就会化为极度的自卑感。《黄药眠现象》的成因及内蕴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社会现象是相当复杂的。两三年前我有封长信寄给你妈妈，接触了这问题，你妈妈复信许为“看得深”。可惜那信至今尚未找出，不知被你妈妈塞到哪里去了。五七年以后的那些日子，你太小，恐尚在“未解忆长安”阶段。你论证《黄药眠现象》多取师大五七年所汇集的所谓《右派言论集》，容有所蔽。咱们有机会再聊罢。作为曾沦为十载囚徒的我，视如流水，志翻闲漠——但差喜不曾丧失闲漠覆盖下的激情。我羡慕你父亲，因为他所度过的个人黑夜，并非伸手不见五指。他有像你这样“慎终追远”的好儿子。他的夜空中还至少有颗闪耀的星星，那就是你妈妈——我们尊敬的蔡彻大姊。（由她又想起梅志和新凤霞，这些人才是中国妇女的光荣，她们这一辈子过得真不容易啊）。你知道著名作家××生前和死后的寂寞吗？那才叫寂寞呢！我替大作安了一个题目——“《黄药眠现象》一解”，并校读一过。这篇文章谈到的问题有待深入，但应该让它先发表，因为《黄药眠现象》既是时代的社会产物，也是社会的时代产物，这就值得有人去思考和研究了。拉拉杂杂，竟扯了这么多。希望你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祝愿你们比上一代人活得聪明一点、勇敢一点。



邮购启事

本刊1993年合订本（总第10期至第21期）即将出版，精装，每册42元，邮购加邮费2元。装订册数不多，欲购从速。

联系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办公室 郎渝。

地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有在邮局漏订，欲邮购本刊，或欲购本刊创刊号至第9期合订本者，亦请与郎渝联系。

耿飈

在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头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与世长辞。

神州大地、江河湖海都为了一颗巨星的陨落呜咽、哀号。1月10日至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1万余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在守灵的行列中，一位身着中山装，却有着军人风度，身材修长，头发银白的干部更是悲痛难忍，引人注目。他就是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参谋长、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赫赫有名的第十九兵团（即杨、罗、耿兵团）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飈。

新中国成立后，耿飈作为第一批外交官，刚脱下戎装就穿上西装，刚放下枪杆就要学会使用西餐刀叉。历任中国驻瑞典、丹麦、芬兰、巴基斯坦、缅甸、阿尔巴尼亚等6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此时望着周总理因过度劳累而消瘦的面

颊，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飈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周总理送给耿飈三句话

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以中央1974年1号文件为“王牌”（即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兴风作浪，上窜下跳。周总理不得不于1月25日亲自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俨然以中共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指手划脚，不可一世，将斗争的矛头对准周总理。

迟群、谢静宜按照事先商定的内容，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江青、姚文元兴高彩烈，不时插话。郭沫若在会上几次被点名批判、罚站。会议快结束时，中联部政工组宣传组李宪魁跳了出来，又递条子，又在会上造谣说部领导不

让印北大的材料，将矛头指向跟随周总理工作多年的耿飈同志。江青看准风头马上跳起来专横地指责中联部为什么不批林批孔。这个女人，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专横跋扈，颐使气指。

“1·25”大会后的一个傍晚，耿飈同志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他愤愤不平地向总理谈到，中联部早在大会召开之前的一个月就贴出了批林整风的大字报，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以此整人。他向总理表示辞职不干了。总理略作沉思后说道：“耿飈同志，我送你三句话：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三，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总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使耿飈顿时开朗，心中积压的郁闷解决了，坚定了同江青等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挨批反而解开了战友们的误解

1975年9月7日下午13时，

周总理在北京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这次会见的时间很短，医生只允许双方进行短暂交谈和合影留念。寒暄之后，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维尔德茨关切地询问周总理的病情。周总理说，马克思的请帖，他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回忆了1965年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参加罗共领导人格·乔治乌——德治葬礼的情景。在参加葬礼时，他随送殡行列走了4个多小时，但现在连4分钟他也不能走了。周总理说，布加勒斯特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为不能再次访问那个美丽的城市而感到遗憾。

周总理请客人向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转达，罗马尼亚同志不必为中国共产党担心，尽管它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经历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这时，中方陪同会见的一位领导同志插话说，总理所指的副总理就是邓小平。）周总理强调说，具有55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会见结束后，耿飚跟着周总理走进病房，纪登奎副总理迟疑了一下，也随他们走进了病房。周总理诚恳地说：“耿飚同志，我很抱歉，对不起你，‘1·25’大会我主持会，不应该让李宪魁发言，他是针对你的。当时，我在主席台上不知道。”耿飚恳切地说：“这没关系，这件事不但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周总理奇怪地问：“有什么好处？”原来十年动乱期间，康生作为中央文革顾问虽主管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各国共产党的联系，耿飚作为中联部部长需要经常陪同中共中央领导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人民日报和

新华社发布会见新闻时，经常配发合影照片。许多人看到照片后，误认为耿飚同志是极左派的走卒，“四人帮”的尾巴。尽管他在部队工作多年，战友中授大将、上将军衔的人不胜枚举。但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他在公开场合碰到老战友时，这些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仿佛根据一项约定俗成的规则，都回避着他，不同他讲话。而“1·25”大会之后，耿飚在台上挨江青的批，受江青一伙整的消息不径而走。许多老战友、老朋友方知误会了耿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们为了弥补内疚的心情，一反常态，无论在什么地方看见耿飚都主动热情地上前打招呼。以往那种戒备、冷淡的空气一扫而光。周总理听完他的一席话后，哈哈大笑。在监护室的医生、护士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跑了出来。她们说，总理自住院后一年多都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

围绕“既定方针”的生死较量

1976年8月9日凌晨，毛泽东与世长辞。伟人尸骨未寒，江青就向华国锋发难。这位演员出身的夫人经常半夜三更打来电话，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一次，江青在电话中向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提出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一个政治局委员俨然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发号施令：“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也不可能懂！”“叶帅病了，不要参加！……洪文、春桥当然要参加……，我和文元也要参加……还有远新也要参加……”等等，简直狂妄到了极点。

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

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9月29日午夜23时，中央政

治局通宵达旦、短兵相接地同“四人帮”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四人帮”妄图达到的目的遭到了挫败。

耿飚在这一年里一直忧心忡忡，一方面他为邓小平、华国锋的安危担心，另一方面，他也对“四人帮”夺权阴谋保持警惕。9月30日晚7时，他接到通知到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座谈会。他看见“四人帮”的几个走卒踌躇满志，得意洋洋地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座，一种愤愤不平的心情油然而生。他立即找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汪东兴接受了他的意见，将座位做了调整。耿飚看到“四人帮”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更加重了自己的担心。

10月3日晚21时，耿飚接到了通知到中南海国务院开会，他一走进办公室，看见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与外交部韩念龙和刘振华副部长谈话。华国锋对他说：“10月4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要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其中有一句话是‘按既定方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通知乔冠华不讲这句话？”从9月16日，姚文元控制舆论工具就抛出用黑体字印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9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全国的《内部参考》上就定了调，“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姚文元几乎每天打电话或口头指示新华社。9月19日，他打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1、“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于是两报一刊等各种报刊大吹大擂，象连珠炮似地发表文章鼓吹这条所谓遗嘱。

华国锋察觉了这一反常现象。10月2日，他在乔冠华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

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特意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4月30日,毛主席给华国锋亲笔写了三条指示,一是“慢慢来,不要着急”,二是“照过去的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向政治局传达后,并将这个亲笔指示给姚文元看过。“四人帮”出于政治目标,蓄意加以篡改。他们经过紧急筹划,由张春桥出面阻止传达华国锋的批示,他公然在文件上批:“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耿飚听完华国锋的提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乔冠华的发言稿肯定不会是一份稿,按报告程序,外交部报中央有关领导,中央办公厅会留存一份,外交部还会留一份存档。北京和纽约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可以打一个国际长途,只需一刻钟,明确告诉乔冠华第几页第几行删去,不用即可。”华国锋听罢同意他的意见,对韩念龙和刘振华说:“你们先去办这件事。”外交部两位副部长走后,华国锋又问耿飚:“你最近听到什么消息?”“消息多得很,我也想得很,我的一个直觉是他们先要整你。”“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整我。”华国锋说:“政治局晚上开会,他们白天睡觉,我白天工作。”江青有时晚上打电话找华国锋胡搅蛮缠,搅得他一夜心烦意乱,不得安睡。耿飚对华国锋讲:“你早就应该估计到这一手。”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梁效的署名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是一篇篡党夺权的宣言书,这是妄图推翻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信号。文中恶狠狠地宣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

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耿飚上午接到华国锋一个电话:“这两天晚上,你不要出去,我有事电话找你。”下午2点,华国锋又打电话告诉他:“我派车接你去。”到了中南海,华国锋对他说:“有一个情况告诉你,主席在世时,我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为了防止别人听,用笔写了‘照过去方针办’,这是指省一级干部安排。”说罢,华国锋用复印机复了两份给耿飚。华国锋接着说:“你这几天别出去,在家等我的电话。我有一个任务让你去办。”耿飚马上站起来:“我坚决完成任务。”华国锋笑起来:“我还没讲是什么任务。”耿飚当时虽然不清楚是什么任务,凭他的经验和直觉这个任务对“四人帮”肯定不利。万一完不成任务,他也做好了掉脑袋的准备。

没想到当上了最高新闻官

10月6日晚,耿飚在看新闻联播,突然红机子急促地响起来,请他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耿飚坐车赶到怀仁堂看见了华国锋和叶剑英元帅。华国锋对他说:“我们已经决定采取行动,并且已经取得了胜利。王、张、江、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带邱巍高(卫戍区副司令员),立即去接管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叶帅语重心长地讲了两条:“1、防止内部混乱。2、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华国锋又关心地问他:“你要不要带枪?”耿飚看看邱巍高说道:“枪就不必带,请给一个手谕。”华国锋提笔写道:“××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飚、邱巍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华国锋”。耿飚、邱巍高和一位副师长出

门坐车前往广播事业局。在此之前,一个营的部队已经调防该局广播大楼。那真是一场触目惊心的短兵较量。现已83岁高龄的耿飚同志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情绪振奋。他说:“我一到广播电台,带了几个哨兵,就把办公室围起来了。我就带着他们的团长到直播室看了一下,在直播室门口派了两个哨兵,交代哨兵交班要有团长在,谁直接冲进直播室,你们就拿机关枪扫,不管是谁。所有的广播要先录音,录好音听一遍再广播出去,所以我就派几个人审查录音。录音里面首先限制出现一个东西,出现了要抹掉,那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这几个字,这是第一。第二不能够出现发生政变,不能宣布已经占领了广播电台。”

人逢喜事神情爽,耿飚带着华国锋的手谕在广播电台办公室见到了当时的负责人邓岗,首先向邓岗宣读了手谕,接着问道:“你有什么问题吗?你要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邓岗脸色马上变白,有些发抖地说:“没有必要了。”“那好,请你通知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到这里来!”全体人员到齐后,耿飚再次宣读华国锋的手谕,并规定在办公室内一起办公不要出门。耿飚叫来警卫营营长增派4名哨兵在办公室值勤,以避免不测事件发生。随后他又向华国锋作了电话汇报。华国锋听后很高兴。以后的几天,耿飚晚上睡觉不脱衣服和袜子,随时准备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他忙于接管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社以及其它宣传口的工作。为了工作需要,他又调了中联部张香山等一批干部加强广播、电视的审查任务。他又指示公开批准上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故事片《洪湖赤卫队》、《甲午风云》和《海霞》等影片,这如同寒冬过后的春风,一扫十年动乱的沉闷空气。

大将许光达

和他的娃娃亲

“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崭新的道德风尚。

——许光达

“救命”的婚姻

许光达生在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父亲为了儿子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给他起名德华。

1921年，许德华考入长沙师范。邹希鲁先生特别喜爱德华好学上进，想要他做上门婿。1922年，他正式托媒人来到萝卜冲，为女儿邹靖华提亲，当时那女孩只有9岁。

邹希鲁是一位具有初期民主思想的开明之士，本知包办婚姻之苦为何急于为小女觅婆家呢？说来确有一段不愿表白的隐情。

邹家是一穷困不堪的大家族，4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家里种一些薄田。邹希鲁当教书匠赚的几个钱，除衣食之费，所剩尚不能奉养父母。邹希鲁的兄长愁得上吊自尽，叔父逼希鲁卖掉二女儿桃妹子（邹靖华）和正在吃奶的小女儿杏妹子。邹妻悲痛欲绝，不忍割舍两个幼小的生命，半夜含泪自尽。邹希鲁把小女儿托付给已出嫁的长女，还要把二女儿9岁的桃妹嫁出去求生。

德华的父亲许子贵十分同情邹家的不幸，为了救人一命，同意了这门亲事。父亲事后征求德华意见。德华说：“邹先生是我的恩师，不能见死不救，桃妹是您的女儿，也是我的亲妹子，长大了，只要她乐意，我愿意同她结婚；如果到时她不愿意，我也一定尊重她的愿意，绝不强求！”

1925年5月，许德华在长沙师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投考孙中山办的黄埔军官学校。

爱的规范

1927年9月，许德华随南昌暴动的起义军，南下潮汕一带，在三河坝受阻。他当时担任连长。许德华英勇拚杀、冲锋在前，不幸被炮弹击中，负了重伤。

他被安置在茂之前村一家农户秘密养伤。主人姓孙，是全村党龄最长的一位共产党员。他有个如花似玉

的好女儿，叫翠花，是赤卫队员。

孙家对许德华最疼爱，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他，找郎中治疗外伤，杀鸡煲汤补养德华的身体。孙翠花更是殷勤备至。她除了煎汤熬药，还常常让德华讲革命的道理、战斗故事。她问：“什么是农民运动？怎样搞革命暴动？共产主义是谁的主义？”

听了德华的解释，她觉得很满意，说他有知识、有学问。时间久了，她愈加喜欢他，感情也愈来愈热烈。孙大妈也喜欢许德华。

许德华早已窥知母女俩内心的秘密。翠花的媚态和会说话的眼睛，早已把内心的想头告诉了他。但桃妹的影子和她母亲自杀身死的往事，不断出现在脑海里，他不能做负心汉，他要对得起桃妹和她的父母，他自己不能见异思迁、制造苦难；七尺男儿如果被田园生活压倒了远大抱负，违背革命的初衷，还是有理想的青年吗？

当孙大妈开口要提亲的时候，许德华立刻说：“你老人家不知道，我家已经订亲了，是我老师的女儿。”

翠花后来难过地说：“恨我认识你太晚了！迟早你要离开这儿，我留不住你，希望走后常常想起我，想起这个小村一个叫翠花的姑娘惦着你的冷暖！”

“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您家对我的恩情。我生活在充满惊险、容易死亡的轨道上，为工农、为大众谋利益，我是不后悔的，因为这是出于自愿、情愿、意志驱使。在我还不懂“婚姻”两个字的时候，一个童养媳已经进入我的家门，我同意了，她规范着我们生活秩序，我不能制造一个悲剧，也不能去演一出闹剧……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爱得蹊跷，有的人爱得唐突；有的人爱得疯狂，有的人爱得邪乎；有的人爱得颠倒，有的人爱得糊涂；有的人爱得对路，有的人爱得知足。但愿我们爱得清醒，爱得正经，爱得不偏不倚，爱得都享幸福。”

一席话说得翠花忧怨全消，兄妹之情更加亲近自然。

许德华身体康复了，他要寻找关系，寻找组织。

一天早上，德华在梦中被人喊醒，是翠花惊慌地跑到床前把他推醒。

“不好了，村里出了叛徒，国民党抓人来了！”翠花说着帮他穿好衣服，拉起就走。在孙大妈的帮助下，德华转移到密林深处。赤卫队员作好战斗准备，随时开枪反击敌人的搜捕。

谁也不曾料到，叛徒竟是翠花的父亲。当敌人走近伏击圈时，翠花咬着牙，狠狠地说：“队长，我不认这个父亲，要亲手打死这个叛徒！”

队长信任地点了一下头。

翠花扣着扳机，把枪口瞄准爹爹，但手开始颤抖。她镇定一下，横下一条心，再次瞄准：“叭”地一声，叛徒被击中栽倒，翠花也瘫软地伏在地上。

德华更加敬佩大义灭亲的翠花。为了一个外姓人，她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母亲的埋怨、世俗的白眼，她的痛楚……都是因为自己才出现呵！在爱的天平上，她为喜爱的一个男人方面倾斜，倾倒……他怕她的热烈的爱，他仍决心去寻找起义部队，他告别了翠花，告别了这价值千金万金的爱！

爱浪中的沉浮

许德华只身一人徒步来到潮洲。又辗转赴上海，最后在安徽寿县找到了党组织。

经上级批准，许德华先回湖南老家探家。

久别重逢，桃妹子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眼睛水灵灵的，酒窝深深的，笑起来甜甜的，一招一式楚楚动人。两人都特别激动，各自掏尽肺腑把情话都说出来，把艰难的经历也都诉出来。

这时，邹希鲁已去清河县当县长，他给亲家许子贵捎来一封信，提到如果德华回来，马上为他俩完婚。

“你是县长的女儿啦！恭喜桃妹。”

“你是黄埔生、金字招牌带回来了。”

俩人说着笑着，桃妹问德华：“愿意马上结婚吗？”

“你呢？”德华反问。

“我愿意，人家不会说我是童养媳了！”

“我这样想，”德华说：“现在没有安定日子，我不能在你身边保护你，我得到很远的地方去做敌军的工作，是在虎狼窝里做事，如有不测，岂不害了你呢！”

“不，我什么都不怕，结了婚遇上风浪也是两个人遮风挡雨，心就铁了。”

许子贵不想让儿子离家远去，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要儿子马上结婚。德华同意。

结婚刚十天，由于叛徒告密，德华逃出湖南，投奔岳父。找到了当县长的邹希鲁。邹尚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推荐他当了县警察局长。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预料。长沙警备司令部的文书、通告很快传到了清河县，岳父不肯抓德华，劝他赶快逃走。

女婿说：“我走了，你不是要受株连吗？”

“株连不怕，总不会有杀身之祸。”岳父说，“你不走，抓住就没命了！”

“走是要走的，得走得轻巧，后遗症要少。”德华说，

“不如演一出坏人诈开监狱、我畏罪潜逃的戏，使你牵连小一些。”

说是“诈狱”，实际是放了一批被捕的农会干部和坚贞的共产党。“诈狱”后畏罪潜逃的公安局长许德华，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逃之夭夭，倒楣的是岳父邹希鲁，他以“渎职罪”被革职回乡，丢掉了饭碗。

许德华逃到北平，不但没找到党的关系，反倒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竟至卧床不起，天天发烧。

旅店老板姓隋，山东人，他有个女儿在北平女子师范读书，为人热情，思想进步。他们见德华病重，就延医买药，给他治病。隋小姐敬重德华，觉得他洒脱倜傥、有学问，她关心地问德华：

“啥事缠身，在北平住了这么久？”

“寻友不遇，事未办成。”

“有困难吧！”

“不瞒你，囊空如洗。”

“店费免了，治病的钱由我爹先垫上。要找的朋友，告诉我姓名、地点，替你去联系。你安心养病。”

在隋小姐的帮助下，德华不但养好病，还找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廖运周同志。

廖是地下党员，看到隋小姐常在许的身边料理各种事务，赞叹不已。他对德华说：“这姑娘长得好，跟你一样是师范生，对你特别好，说不定爱上你了，要不要我当大媒，两人结秦晋之好啊！”

虽是脱口而出的话语，却激起德华的心潮。隋小姐有较高的文化，妩媚多情，善书爱画，她那紧身衣衫，蓝士林长裙，给人以娴雅大方之感。她有次故意试探地露出那滑润的大腿，写四个楷书大字：风雨同舟。萌动了少女的春情。她是多么可爱的小舟啊，对于一个疲惫已极、多灾多难的人，提供一时休歇的锚地，太可贵了……然而，自己是一个已承担了丈夫义务的男人，虽是包办婚姻，但是自己乐意的；虽是出于同情和救急，但是，已经在对方身上扎下了爱根，她把忠诚而稚嫩的贞洁给了自己，以白头到老盟誓，她已经万分不幸，再加万分不幸给她，不会压垮她吗？如果生活只是为了“我好，那么共产党员的初衷，岂不化成泡影了！？”

德华把圆房的事向运周说了一遍，婉谢了他的美意。廖运周给他筹措了一笔钱，还清了店老板的债款和医疗费用。他对隋家父女以“恩人”相称，告别了避风港上的小舟。

1929年3月，遵照党的安排，许德华到无锡来做地下工作。他把名字改成许光达（必达光明彼岸之义），在国民党的独立旅开展兵运工作。他接上了党的关系，

和警卫营的两名共产党员编为一个小组。

1930年，在湖北公安县陡湖堤成立红五军团，许光达调至该部工作，贺龙宣布任命许光达为二军十七师师长。

一天晚上，贺龙与许光达在湖边散步，正遇一家渔民办喜事。贺龙笑吟吟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洪湖妹子吧，不能总打光棍呀！”

光达告诉他已有妻室时，贺老总关切地问：“她在哪儿，现在怎么样？”

“不清楚，结婚刚十天，敌人就发出了拘捕令，我逃离家乡，已两年多未见面了。生死未卜，心上悬念。”一丝淡淡的哀愁，掠过脑际。

“打听一下，有可能时替你接出来！”

爱的可怕代价

自许光达走后，他家遭了特大劫难，长沙警备司令部隔三差五到许家坐堂要人。交不出人，就把子贵一家人等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受尽百般凌辱。有时官府上门勒索，吵闹不休。桃妹子连做恶梦，梦见丈夫被人抓去砍了头，鲜血淋淋。泪水多次滴湿了枕头。

为了谋生，桃妹到一袜厂去做工。她白天织袜，晚上伺候老板娘。长沙国民党特务机关查到她的落脚点，便和老板沆瀣一气逼桃妹和丈夫离婚。说只要在报上登一个离婚启事，便不再找她的麻烦。桃妹说：“我写不来！”老板说：“找人替你写，你抄一下就行。”桃妹说：“我没钱登报！”老板说：“我们替你出！”桃妹子质问：“你不怕通‘匪属’犯罪吗！？半夜小鬼会来叫你房门的！”

老板劝说无效，给桃妹挂上“共产婆”的牌子，罚她站门。上下班时人来人往，老板指着她的鼻子叫嚣：“通共匪的，就是她这样的下场！”

由于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她得了肺结核，经常咳嗽、吐血。一次眩晕，她跌倒在织机旁。为了不让老人难过，她没敢告诉父亲，默默地忍受着肺病的折磨。

一天，报上登了一批共产党员被杀害的名单，许德华的名字，赫然列在中间。她一阵晕天黑地，手足无措。噩耗摧垮了她的精神支柱。她拖着瘦弱不堪的病体，把裤带挂在树上，做环上吊。幸好邹希鲁发现及时，把她从死亡的边缘上抢救下来。

1932年4月，许子贵接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怪信。信中这样写道：

德华兄：

安徽寿县一别，无恙？你说回家成亲，婚后即归，至

今两年有余,不见音讯,是爱妻扯你后腿?还是自己激流勇退?望来信告之

顺致

敬安

廖运周

许子贵看信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廖运周”这个名字,他从未听说过。还是桃妹细心,她从字体上看出像德华的笔迹。她认为:八成是丈夫怕人检查,以暗示的方法,让家里给他按地点通信。

原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许光达在一次恶战中在心脏附近中了一颗子弹,弹伤发炎,危及心包,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三次手术都没有取出弹丸。贺龙请示中央分局,把他送入上海的一家医院。

家里全然不知他的境况,面对着这封投石问路的短信,惊喜异常。桃妹代表全家立刻写了回信:

运周:

来信收悉。感谢你的挂念。其实,德华自1928年秋天离家,一直未归。他如今生在何方,死在何处,望来信告知。

又及:他的妻子桃妹现在工厂做工,苦得很,一心在等他,全家人一如往常,恕不赘述。

盼望回音

许子贵

许光达接到这封信,使伤病之躯凭添许多欣慰的力量,多年悬在心头的忐忑石落了地,他立刻修书一封,把在医院节省的下来的200元银洋寄回家乡。

当丈夫的第二封信寄到桃妹手中时,她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哇哇大哭一场。他的确活着,她得到他身边去照顾他。她又写了要去上海的内容的信,等待着对方的同意。

几个月没有消息。正当桃妹焦虑、失望的时候,从苏联寄来了许光达的信。

他怎么到苏联去了?原来又是一场惊险。上海的大夫正准备给他作手术的时候,突然,叛徒告密,供出这家医院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组织上得知消息,将许光达迅速转移。十分钟后,一位正在接受手术治疗的红军指挥员,因无法撤离,被敌人杀害在手术台上。许光达装扮成商人模样,被送往苏联。

许光达知道妻子不懂俄文,为了寄信便当,他寄来十多张俄文写就的收信地址,只要往信封上一贴,再贴足邮票,对方就可以收到。

十多张字条很快用光了,由于国民党和苏联关系恶化,两国边境封锁,以后的六年当中,双方都不能通

信。牛郎织女失去了银河上的鹊雀,再难得到只言片纸。

毛泽东迎师妹

1938年,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徐特立回到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邹希鲁与徐特立是同窗好友,两人常在一起下象棋。桃妹常随父亲到办事处听徐老讲革命故事。她越听越喜欢延安,经徐老介绍,她带着许光达的小妹——许启亮,一同投奔延安。

至西安,桃妹子遇上要好的同学——林明伟,她是林伯渠的孙女,也准备去抗大受教,她们一起找到八路军办事处。

几天后,她们来到延安。

当晚,十分疲劳的桃妹正欲解乏睡觉的时候,突然闯进一个小战士,大声喊嚷:

“这儿住着邹靖华吗?”说话的像个警卫员。

“有!谁找我?”

“我们教育长。”

“教育长?姓什么?”

“许光达!”

一位高大魁梧的军人悄悄走进来,借着微弱的麻油灯光,寻找着发出乡音的女子。

邹靖华一眼看出这是自己多年来朝思暮想的亲人。她擦一擦眼睛,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

一瞬间,两个人泪眼模糊,……万缕情丝,牵心挂肺……恍如梦境一般。

许光达的窑洞里,挤满了许多平日不来的男宾女客,不少人是来看教育长的夫人的。因为许光达风华正茂,又是吃过洋面包,会转洋文的高干,在抗大正是心许抗日的姑娘们瞩目的高级对象,其中也不乏勇敢者,向他求爱,留下托附终身的诗词艳句;但,都被许光达婉言谢绝了。严肃拒绝之后,招来的是一些人的非议:“是块不懂感情的木头!”

一天傍晚,邹靖华和许光达应邀到毛泽东家去作客。

卫士长一报告,毛泽东马上到窑洞门边迎接,他握住邹靖华的手,称她是“家乡来的稀客”,祝贺她“千里寻夫,如今团圆”。毛泽东是邹希鲁的学生,按辈份跟她是师哥、师妹之谊,所以靖华并不拘束。她多次听父亲和徐特立谈起他们的得意门生。毛泽东问:“邹老师一向可好?”

靖华叙述了他的近况,说:“许光达搞‘诈狱潜逃’后,家父邹希鲁罢官归里,如今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生活。”

“归隐得好，正直的人为蒋介石之流所不容，在职更容易丢掉脑壳的。”他又问：“徐特立——徐老到长沙办事处后，身体可好？”

靖华说：“老人家很好，年事已高，一顿还能吃一碗多大米饭。”

“他多年没吃到大米了，我这个学生对他不起，只能供应小米、红薯。家乡的米好吃哟！哎，过几天你们夫妇两口到我这儿吃顿饭，我尽量找点大米、腊肉、红辣子，招待我的师妹子、妹夫。”说着哈哈大笑起来。靖华是抿着嘴笑，许光达是仰着头笑，大家都笑得十分快活。

毛泽东对长沙的各种情况，包括街上贴什么标语都问得一清二楚，看得出，他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

毛泽东向邹靖华简要介绍了当前的政治形势，鼓励她学文化、学马列、学语言。他拿出几本小册子送给靖华，其中有马列主义，也有他自己的著作油印本《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风趣地说：“光达信了马列主义，你也学马列。信仰一致，语言、思想才能接近一致，不然你信佛祖，他信马列，将来说不到一块，要吵架的；可别因为认识、水平不一致，到延安来打离婚哟！”他听靖华说自己曾跟爹爹吃斋信佛，故有意作了这些嘱咐。

许光达和邹靖华的婚姻是幸福的、美满的。直到“文革”期间，许光达大将被迫害致死，他们之间一直过着恩恩爱爱的夫妻生活。

（责任编辑：刘家驹）

我国农村的多数民房都是背面向北，且多靠山岭和高地，那里栽有树木、竹子等，起着固水土、挡风沙、保护房屋的作用。房屋的前面朝南，门前地势平坦开阔，是居住的人出入和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这种住房布局还有什么好处？这就要从我国的气候特点说起。我国位于北半球，在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是一个“背陆面海”的国家，北回归线穿过我国南部，我国绝大部分领土在北温带。在这一广大地区内，太阳多从偏南方东升西落。冬季，太阳高而角度小，住宅的门窗朝南，可使更多的阳光斜射进入室内，保持室内温暖。而在夏季，太阳高度角增大，太阳射入门、窗的光线就少，能保持室内凉爽。因此，这样的住房建筑，有利于居室保持冬暖夏凉。再者，我国大部分地区位于“东亚季风区”，季风气候显著。在我国东部广大地区，冬季多偏北风。寒冷干燥，夏季多偏南风，温暖湿润。我国除沿海和水域地区受水气影响，最高气温出现在中午外，其他地区多是下午二至三时。它舍朝南，在盛夏时期，可避开下午最热烈的直射阳光，起到遮阳避暑的作用。在隆冬季节避开西北寒风，起到防寒保暖的作用。总之，“座北朝南”的住宅，能减少室内冬、夏季的温差，对居住人的健康有利。

坐北朝南





叶剑英同志半个多世纪以来,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具有时代特点的革命诗篇。他的诗词篇,深受文人学者、社会名流,尤其是老一辈革命、政治家,也不乏青年的推崇。

叶剑英与古典诗词

博览我国历代诗词曲赋

叶剑英同志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中,孜孜不倦地博览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

从叶帅读过的、现在还收藏的书中了解到,他最喜欢读的是《诗经》、楚辞(《屈原与楚辞》)、《庚子山集》(《庚信诗赋选》)、《南社诗文词选》(《南社第八集》)、《岭南三大家诗选卷》、唐诗(《唐诗三百首》)、宋词(《宋词三百首》)等书。

他们的诗词篇,有的叶帅不只读过一遍、两遍,甚至三遍以上。例如:

1958年4月,叶帅去湖北汉口视察工作时,没有带上《屈原与楚辞》这部书,他为了能够再次读它,一天上午,自己跑到街上书店去购买,在买回来的当天上午,不顾疲劳,坐下来,一口气从头至尾地把这部书又

仔细地读了一遍,连“后记”也一字不漏地读了。

这部书共有屈原不朽的诗篇22篇,其中“离骚”是屈原在被放逐期间,用血和泪写成的浪漫主义的史诗,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长篇抒情诗,全诗长373句,共2490字。这篇伟大的抒情诗表明了诗人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他高尚的品格。他对于自己所怀抱的政治思想坚持不渝,甚至用他的生命来维护这一理想,这正和他诗篇中所表达的对祖国的真挚热爱和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能在诗篇中勇敢、大胆地揭露和控诉领主贵族们的黑暗势力。正是这些,吸引着叶帅,从购买来这部书那天起,就经常反复地读它。

叶帅对屈原的《离骚》,一直不忘,到了1970年,事隔十二年还有很多诗句背得很熟。

这一年,叶帅已是73岁的老人了。他先是被去湖南

长沙,后又辗转于岳阳、湘潭、广州、武汉等地。

在过端午节这一天早晨,家家都吃粽子,以悼念屈原的亡灵。叶帅也不例外,在吃粽子的时候,他很怀念屈原,一面给在坐的工作人员讲吃粽子的来历,一面脑子里在构思。当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妙笔一挥写下了“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行谦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这首七言绝句。诗中热烈地赞颂了屈原的爱国精神和刚正不阿的品格,抒发了自己处逆境而不屈的坦荡胸怀。这尾句“一读骚经一肃然”,充分地表达了对屈原及其诗作深为敬爱的心情。

1977年5月中旬,有一天,叶帅去玉泉山九号楼,为了开会,临时住几天。去了第二天中午,又要刚读过不久的《南社第八集》这部书。可是,到收藏柜里去拿,不知又为什么不见了。这天中午叶帅没有读上,感到遗憾。

到了6月12日,叶帅又去玉泉山开会,这天吃过午饭后,在九号楼外走廊散步时,迎面走过来一位女服务员,她双手捧着一本书要递给叶帅,叶帅急忙接过来一看,正是他要找的那部书,顿时高兴起来。于是,他就在外走廊坐下来,翻开书的第二面,在空白处挥笔写了“廊间正是无寥赖,燕子衔泥慰故人。”1977年6月12日重得此书留念,于玉泉山九号楼外走廊。”可见,叶帅是多么渴望重获这部书。以后,他又反复地读了几遍。还在书皮上用墨笔题写了两句诗:“说部我输李煮梦,小戎离黍出诙谐。”这两句诗是从书中李煮梦《秋夜》一诗“后记”中借用来的,用它来赞颂李煮梦的爱国诗篇。

精于旧体诗词写作规律

五四运动以来,随着白话文的兴起,新诗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而讲究格律词牌的诗词,则被称为旧体诗词,退居二线。尽管如此,时至今日,旧体诗词仍然受到许多人的喜爱。毛主席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读报上发表的旧体诗词,既仔细、又认真。1965年10月16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叶剑英同志的七绝《望远》。毛主席在这一年72岁诞辰的时候,默诵手书了这首诗,并把原诗题改为《远望》,还在诗末写上“10月16日光明日报”。这就不难看出毛主席对这篇诗作的评价了。

叶剑英同志所以精于旧体诗词的写作规律,一是

因为他经常反复地钻研《诗韵集成》、《汉语诗律学》、《唐宋词定格》等这类书藉。他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作了许多不同的符号批注。例如,在钻研《唐宋词定格》这部书时,他把每一个词牌用红铅笔杠起来;把每一定格用蓝铅笔杠起来;把每一例一、例二用红蓝铅笔一长一短地杠起来。这样,既便于眼看,又便于脑记。二是因为他经常向历代大诗人大词人请教,对于讲究平仄、对仗和诗句的字数等名篇佳作,他经常背诵和默书。直到晚年,还能将许多名作,一字不漏不错地默书下来。如:1983年,这年他已是87岁的老人了。有一天,他刚吃过午饭,还没有动地方就在饭桌上,笔一挥默书了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五言绝句《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书后,一核对原作,果真一字不漏不错,叶帅的这种超人的记忆力,使我们深受教育。

叶剑英同志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写出的革命诗篇,按种类区分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律诗,特别是七律,一种排律,一种是绝句。另外,还写了不少词篇。他的诗词篇,反映了大革命风暴、苏区斗争、红军长征、抗日持久战、三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以及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音响。他的诗词篇,表现了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诗词篇,表达了人民的心声,给人以鼓舞、激励和启迪。他的诗词篇,讲究平仄、对仗、字数、句数、韵语、韵脚等等。可以说,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格律谨严,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不可磨灭的美感,为人所喜爱。

从古典诗词中吸取营养

叶剑英同志在革命诗词的创作过程中,从中国历代的大诗人大词人的名篇佳作中吸取了营养。有的是引用,有的是点化,有的是借鉴,还有的是批判地继承传统的用法。

引用:1940年,叶帅作为我党代表团的成员,跟随周总理驻守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时,一天见到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之后,写下了《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一诗。

诗的首句:“血染东南半壁红。”这“半壁”一词,就

是叶帅从唐代大诗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中引用而来的。“半壁”，即半边。“半壁红”的“红”字，正像毛主席光辉词章《蝶恋花

从汀洲向长沙》中“赣水那边红一角”的“红”字一样，它象征着革命的火炬，指引着人民前进的道路；它象征着光辉的灯塔，迎接着全中国的黎明。祖国的半壁河山变成红色的革命根据地，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包括方志敏同志在内的无数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从事艰苦卓绝的斗争而换取的。这句诗生动地概括了方志敏同志在领导农民起义进行武装斗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方面所立下的不朽勋业。

点化：1947年叶帅在祸国殃民的蒋家王朝行将覆灭的前夕，在解放区广泛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大好形势下，来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会议结束归来时，畅游了五台山。

五台山是我国名山之一，是风景极佳的胜地。但是，自汉以来，经北魏隋唐，宋元明清，直到解放前夕，两千余年这里一直是封建宗教的大本营之一。山中修建的寺院庙宇，多时竟有三百六十余座，少时也不下七、八十座。寺庙内供奉着金光披身的神仙菩萨，活动着成千上万的和尚喇嘛。许多的寺庙建筑的用款，神像泥胎的供奉，和尚喇嘛的消耗，很显然都是老百姓的血汗。

这里已经过土地改革，叶帅特写下《过五台山》这组大气磅礴的诗歌。

组诗的第一首尾句：“未妨仇恨是清狂”这里叶帅点化了唐代诗人李商隐《无题》诗：“直到相思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的诗意，将“惆怅”改为“仇恨”，这就使本诗有了全新的革命含义。这句诗的意思是：广大农民怀着深仇大恨向统治阶级讨还千年血债、万姓食粮是好得很的革命行动，绝对不是什么“过分”和“清狂”。这句诗最能见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持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借鉴：1958年5月28日，叶帅陪同毛主席来到了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时写下了《十三陵水库》（二首）这组诗。

“十三陵水库”五个大字，是毛主席亲笔书写的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镶嵌在紫色的大坝南坡上。显得十

三陵水库的景色更加雄伟壮观。这个水库建成后，蓄水八千多万立方米，相当于二十个昆明湖的蓄水量。长达六百一十八公尺、高达三十公尺的拦洪大坝、象一把巨锁，横锁着蟒山和汉包山，拦住了经常为患的洪水，在重峦叠嶂的怀抱中，出现了碧波熠熠、平明如镜的人工湖。

组诗的第一首后两句：“朝阳赤帜平沙幕，一幅诗图一战场。”这“赤帜”和“平沙幕”两个词，是从唐代大诗人杜甫《后出塞》（其二）“平沙到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得到借鉴，以“平沙幕”（在平沙上搭成的帐篷，作劳动大军居住之用）连同“赤帜”这些景物一起入诗。这就形象而有力地表现了这个具有强烈战斗气息的“战场”。这两句诗为我们描绘了充满无限生机的壮美“诗图”，描绘了“十万愚公”向大自然开战的宏伟画面。

批判地继承传统的用法：1956年8月下旬，叶帅来旅大视察，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于9月2日在大连棒棰岛写下了重读《论持久战》这首七律。

全诗结尾的两句：“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这是诗人由衷之情的表露。“吴钩”是我国春秋时代吴国的一种锋利弯刀。在古典诗词中，“看吴钩”、“看剑”，都常常用来表现作者急于为国立功、期待理想抱负能够早日实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有“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之句（《后出塞》其一），李贺也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诗句（《南国》其五），宋代爱国词人辛弃疾也曾写过“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等诗句。叶帅批判的继承了这个传统的用法，赋予了新意。诗中的“吴钩”显然不是指个人佩带的刀剑之类，而是借喻为革命斗争的武器、人民的武装。“看不休”是看了又看，看个没完。这里表示十分珍爱，永志不忘的意思。这结尾的两句诗，是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学说和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的热情歌颂。

叶剑英同志能够成为一代杰出的诗人，是同他青年时代就开始广泛阅览古典诗词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博古通今分不开的。我们要学习他这种无论什么年代、什么环境，都能刻苦、认真学习的革命精神。上面说的几点，只不过反映了叶帅读古典诗词的一个小小侧面，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挖掘和整理。

林语堂与马

●杜文彬

提起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的小说来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像《京华烟云》等作品,都是世人皆知、脍炙人口的。然而要说“林语堂与马”,可能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林语堂先生非常喜欢马。30年代,他在写《生活的艺术》一书时,曾以捏泥马来消除写作的疲劳;70年代,他又以画马来排遣老年的寂寞。他曾说:“我也试着画些花鸟、山水,但是我发现,我只爱马。”

说起林先生捏的那匹泥马,还有一段有趣的经历呢。

有一天,林语堂从外面提回了一桶泥,他对家人说这泥是专门买来做一个泥马的。他拿出一块泥想先捏马头,但是左捏右捏怎么也捏不像。他捏出的马,鼻子不



直,身体不正,腿也不能站立,为此十分懊恼,专程去看波落佛的肖像,从那里获得一些启发,回家后反复修改,让孩子们评判,然后再改,直到自己看着差不多了才停下来,他又精心地把这匹马涂成绿色。看着这匹既雄伟又显得有些专横的马,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匹马是林语堂心血的结晶,因此非常非常的珍惜它,把它摆放在书柜里。1936年,林语堂先生移居美国,这匹马也随同他横渡大西洋,但到达目的地,他打开箱子取出泥马时,马蹄都碎了,林语堂先生很伤心,立刻将碎块拼到一起重新粘好,小心翼翼地将它摆放在壁炉架上。可后来不知是谁不小心把它碰倒,又跌断了腿。对于这匹伴随他远渡重洋,历经磨难的马,林语堂先生倍加爱惜。直到1947年,林先生家要迁往巴黎时,林夫人才背着他将这匹受了伤的泥马扔掉。但这匹马一直深深地印在林语堂先生的脑海里。

70年代,林语堂又改为画马,他曾画过一张马图,画面上有7匹水墨马,或立、或卧,疏疏落落,潇潇洒洒。林先生画马是把他用年轻的手捏起的泥马,又用颤抖的手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罗列在画纸上,他不是在画眼中的形象,而是在写心中的意志。

林语堂先生晚年时,将自己珍藏的一匹唐三彩陶马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他居住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徐悲鸿画的马。

林语堂爱马,在他的一生中,一直有马陪伴着他。

深入虎穴的

特殊将军

○石 湾



建国初期的刘宗宽

“解放西南第一功！”——这就是刘伯承元帅代表党和人民对刘宗宽深入虎穴，完成特殊使命的褒奖。他也就此而引以为一生的光荣与欣慰。

五月端阳的特殊礼物

1942年端阳节前夕，蒋介石收到了冯玉祥送来的一个大红纸包，上面写着七个汉隶端楷：“五月端阳的礼物”。

纸包很轻，决非金银细软、珍味美食。蒋介石不免有些纳闷：这位谱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他当即将纸包打开，一看，原来是冯玉祥手书的四扇屏。每扇均是一则历史故事：

第一扇写的是汉文帝出城过一座大桥，桥下出来一人，把汉文帝的马惊了。卫士们把那人抓住，送交最高法官张释之，汉文帝要张处此人以死刑。张对汉文帝说：“法律上不能将他处以死刑，只能是徒刑。”汉文帝说：“他若把我的马弄惊，摔死我怎么办？非宰他不可！”张说：“若皇帝要杀他，你就在他从桥下出来时，叫卫士把他杀掉，那还可以。若是交给法官手里，就不能不按国法来办。一个国家不能一喜欢就叫人活，一恼怒就叫人死；若那样还成什么国家呢？”汉文帝听后，说：“很好，我听你的话。”

第二扇写的是有人偷了汉高帝庙门上的铜环，被捉拿之后，汉文帝叫张释之去灭他的三族。张说：“不可，国家的法律，对于这一类的罪只是斩决，不能灭族。”汉文帝大怒：“我为子孙的，连祖宗的庙都不能保存；今天把贼拿住了，交给你来治罪，你反倒这样处置，那我还能做皇帝吗？”张说：“若偷了一个铜环就该灭族，在长陵上挖一杯土，又该当如何呢？”汉文帝半天无语，等了一会说：“你等我见了白太后再定。”后来见了太后，说明此意，白太后说：“张释之是也。”汉文帝方对张释之说：“准你依法办理。”

第三扇写的是李世民办选举，后来知道有些人是贿选的，不禁大怒，就将这些人交给最高法官戴胄，令其一律斩决。戴胄说：“只可处徒刑，不能处斩刑。”李世民一听戴胄驳回他的话，恼了，说：“我亲笔下的手谕都不算数，哪还有什么脸面做皇帝？”戴胄却说：“这样办不但有脸面，而且还更光荣。”李世民问：“什么理由？”戴胄答：“当你得知手谕和法律不一致，能马上取消手谕，尊重法律，这样的皇帝不但不丢脸，反而会更觉得光荣。”李世民随即站起身来，握住戴胄的手说：“我有你这样的法官，我一生也不会做错事了。”

第四扇写的是明朝的一则故事。意思与上述三则

相仿。蒋介石看完之后，不胜感慨，对身边的人说：“除了冯先生敢给我写这些之外，是再没有人敢给我说这些的。”

当晚，蒋介石就把冯玉祥请了去。他俩曾在1928年换帖结盟，拜为兄弟。虽因政见不合而多次发生冲突，但他俩过从之密，交往之久，仍非一般人所能及。

一见面，冯玉祥就说：“过了端阳节，我就不在重庆住了。”

蒋介石颇为不解，问：“大哥，你在重庆住得好好的嘛，何必搬走呢？”

冯玉祥回答：“你高兴了就让人活，不高兴了就让人死。凭你的喜怒哀乐来办事，我看不惯，看了生气。我不在重庆住，你就随便吧，免得我看了生气！”

“大哥，什么事惹你生这么大气？还特意给我送来了‘礼物’！”

“那么好的一个师长，你不听司法机关的意见，大笔一挥，就批了‘枪决’，谁听了能不生气？”

“你说的是那个姓刘的？”

“就是那个刘师长。他还是你黄埔的学生，陆大的武状元哩！”

……

其实，冯玉祥并不认识这位刘师长。那时，他身为国民党军委会副委员长，住在重庆特园康庄。一天，有个叫韩炼成的军长来见他。北伐时，他俩曾在一起共过患难。韩炼成一见冯玉祥，尚未开口说话，就痛哭起来。冯玉祥忙问：“有什么事？你对我说一说。”韩炼成这才抽泣着说：“我有个同学，叫刘宗宽，字志弘，陕西人，黄埔三期毕业。后来上陆军大学，毕业时，在特别班二期考了第一名。陆大毕业后，任暂编第15师师长，驻在潼关附近，被特务告了密，说他贪污，还说他是杨虎城的外甥，把他扣押起来，押送到了重庆，组织了军事裁判委员会，秦德纯是审判长，勉强定了罪，判刘师长六年监禁。后来，又改判无罪开释。没想到公文一到蒋介石手里，蒋马上划了一道黑线，将全案六人‘一律枪决’。这样好的军官，就要随随便便遭枪决了，国家还有法律没有？……”说着说着，他哭得更沉痛了。冯玉祥听后，对韩炼成说：“我听明白了，让我找蒋介石去说，你要杀刘师长他们六人，就请先把我冯某杀掉，不然他就不能这样办。”韩炼成一听他的话，就不再哭了。韩炼成走后，冯玉祥便拿起笔来，写下了四扇屏借古讽今，差人给蒋介石送了去。

冯玉祥给蒋介石送的，自然是非同寻常的礼物。蒋介石早就感到了它的特殊份量。这时，一经冯玉祥点

明,也就只好认错:“大哥息怒。这件事,算是我的不对。案子改判一下,也不难嘛!”……

就这样,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刀下救了刘宗宽一命。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蒋介石要杀刘宗宽,并非是刘宗宽真有什么罪名,而主要是据胡宗南说,刘宗宽是杨虎城将军的外甥。

说刘宗宽是杨虎城的外甥,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但他俩是同乡,均出身于陕西蒲城县的农民家庭,这倒是真的。从刘宗宽家的东北乡刘家庄,到杨虎城家的孙镇甘北村,只有二十里的路程。孩提时,刘宗宽就知道本乡有个劫富济贫的“中秋会”,首领是杨虎城。当时,蒲城东南乡有一个名叫李桢的恶霸秀才,和县城里一些绅士以至县衙门的书吏非亲即友,经常出入官府,包揽词讼;在乡里则独霸一方,强占民女田产,以至设赌抽头,无恶不作。当地农民对李桢恨之入骨而又无可奈何。最使农民仇恨的,是李桢代替当地一家地主富户包讨债务,包括杨虎城在内的许多农民,都直接受到他的欺压,痛苦不堪。1914年夏收之后,李桢带领流氓打手到杨虎城姑母居住的村庄讨债,那天杨虎城恰好在姑母家住。李桢进村后,全村百姓惶恐不安。见此情景,杨虎城觉得,除了为民除害,别无选择。于是,便指挥“中秋会”的贫苦农民,一鼓作气,打死了一方恶霸李桢。此一举轰动了整个东南乡。当杨虎城率领“中秋会”的刀客们浩浩荡荡从刘家庄通过时,刘宗宽看见,李桢血淋淋的头颅在竹竿上挑着哩。从那时候起,在刘宗宽幼小的心灵里,就觉得杨虎城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长大了,要学他的样,为民除害。

十年后,当刘宗宽在同州府大荔县师范学校毕业了,就因不满地方北洋系军阀的统治,投笔从戎,直接投奔了驻扎在耀县的杨虎城的部队。那时,杨虎城已是陕北国民军的前敌总指挥,刘宗宽虽不认识杨虎城,但在杨虎城的部队里,有他的好多乡亲。事有凑巧,刘宗宽刚在杨虎城部队当上文书,就赶上了杨虎城向黄埔军校选送学生的好际遇。听到此消息后,刘宗宽就和读师范学校时的同学王俊一起,径直找到杨虎城,提出了去黄埔深造的请求。杨虎城告诉他们:“到黄埔可不是一般的读书,那也是当兵,是在革命中打头阵,要吃很多很多的苦。”他俩回答说:“我们知道上黄埔也是当兵,我们不怕吃苦,打头阵。”杨虎城准备给黄埔选送的十余名学员,全都是现任军官,看到这两名刚入伍的学生热情很高,上进心切,就破例答应了他俩的请求。

由于军阀混战,土匪横行,这批选送去黄埔的学员不能公开结队而行,而只能化整为零,分散南下。当时,

刘宗宽和王俊一路。杨虎城以个人名义给他们所开具的介绍信,是绸子的。为防不测,他俩将这方绸子缝在了衣服里。他俩回母校办了“护照”,装扮成到上海公开升学的学生,闯过重重关卡,终于抵达了广州。也许正因为他俩有公开升学的“护照”,才得以躲过了灾祸。在杨虎城给黄埔军校选送的十三名学生中,竟然只有他俩历尽艰难曲折,到达了目的地。原先,他们是作为黄埔二期学员选送的,由于路途耽误的时间过长,当他俩赶到时,二期早已开学,于是,他俩就只好改上了第三期。

读完黄埔三期,刘宗宽回到杨虎城的部队,当上了杨虎城的侍从副官。

刘宗宽回到杨虎城部队之日,正值著名的坚守西安的战争开始之时。

杨虎城的先头部队是1926年4月16日进城的。5月15日,敌军(即陕西人民深恶痛绝的刘镇华的镇嵩军)就占领了西安与咸阳之间的三桥镇,使西安陷入四面包围之中。从此时起直至11月28日,西安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当时,敌方用以包围攻击西安的兵力约七万人,而城内守军却不足一万。敌军在吴佩孚的补给之下,加上阎锡山供给大量重火器及炸弹,装备远比守军优良。这期间,为了对外打通一条交通线,借以了解外边情况,杨虎城虽曾组织过几次突围,但终以受到敌军的强大阻击而未获成功。作为侍从副官,刘宗宽在这坚守西安的八个月中,一直是鞍前马后、不离杨虎城左右的。这期间,食粮供应极度困难,最后,一切可以食用的动、植物,皮革制品,药材乃至油渣,均搜罗殆尽。就是在这吃树皮、草根的患难日子里,刘宗宽与杨虎城结下了生死与共的亲密关系。可以说,他俩之间已是无话不谈。因此,到1929年杨虎城担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时,刘宗宽就成了他麾下最年轻的团长。没过多久,又被提升为少将副旅长。刘宗宽深得杨虎城的器重,这是明摆着的。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时,刘宗宽正在南京陆军大学再度深造。

12月13日晚,刘宗宽已经就寝,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时,因他夫人崔东亚正就读于金陵女大,他们就住在女大附近阴阳营的一幢小洋房里。他连忙起床,披上衣服,连袜子都没顾得上穿,就去开门。临开门前,他问来人是谁?回答说是“送电报的”。可打开门一看,他顿时就明白了,原来是一伙便衣警察。白天,他从报上看到蒋介石在临潼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逮捕的消息,心里就嘀咕,事变或许会波及自己。因此,他

面对来者不善的便衣警察，颇为镇静，说：“我是军人，有什么事情，应该由宪兵来办。”

领头的便衣警察说：“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厅长请你去说几句话，说完你就可以回来。”

刘宗宽想，光棍不吃眼前亏，便说：“那好吧。”他进屋对夫人交待了几句，就随便衣警察出了家门，上了守候在门前的小汽车。

就这样，作为人质，刘宗宽被南京警察厅关押起来。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才获得释放。

1937年8月，也就是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刘宗宽由陆军大学毕业。他在特别班第二期的毕业考试中得了第一名，人称“武状元”。蒋介石任命他为高级参谋，并派令担任汤恩伯部联络参谋。但由于蒋介石长期以来对非嫡系部队的排挤、打击和吞并，特别是西安事变后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迫使杨虎城离职出国，并将其部队加以分割，刘宗宽对此极为不满，便拒绝了蒋介石的任命，迳回旧部，担任了陕西军管区参谋长。当时是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兼任陕西省主席，在孙蔚如率部开往抗日前线时，蒋鼎文接任陕西省主席，孙蔚如令刘宗宽暂留军管区。不久，孙蔚如电调他去任师长，但因蒋鼎文、胡宗南从中作梗，而未能成行。

1939年下半年，蒋鼎文、胡宗南在事先未征求刘宗宽意见的情况下，即令他去军校七分校任总队长。随后，又派他任暂编第十五师师长。这支部队原系西安绥署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指挥，仍属十七路系统，在开赴抗日前线时，被胡宗南中途拦阻，强行改编，并企图利用刘宗宽来改造这支部队，以使将其吞并。刘宗宽不甘受其利用，对胡宗南的人事派遣有所抵制，并且不许胡宗南的特务“动员”干部在他防区胡作非为，做走私生意，因此而触怒了胡宗南。胡宗南对他恣意构陷，罗织罪名，并编造说他是杨虎城的外甥，把他扣押起来，连同受他牵连的五名部下，解送重庆。

当时，刘宗宽对蒋介石还存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下面不讲道理，到了中央，蒋介石身为一国之首，总会讲法依理，把事情搞清楚。不料蒋介石存心要诛锄异己，大笔一挥，在军法总监部军事仲裁委员会上报的拟将他“无罪开释”的公文上批了“一律枪决”四个字。

军法总监部作出“无罪开释”的判决，这是于右任为之奔走呼号的结果。未曾想蒋介石竟如此心毒手辣，必欲置刘宗宽于死地而后快。这时，刘宗宽的夫人崔东亚赶到了重庆，又四处托人情，设法将他营救。

崔东亚找到了刘宗宽在陆军大学时的同窗好友韩炼成。此时，韩正在重庆复兴关的国防研究院接受高级

培训，因他在广西当军长，深得白崇禧青睐，便住在白崇禧的公馆里。他请白崇禧出面，帮忙营救刘宗宽。但白崇禧对此事也深表为难。在此紧急关头，他想，此刻的重庆，除了冯玉祥就没有第二个人物能在蒋介石的枪口之下将刘宗宽救出来了。于是，便立即奔赴特园康庄，向他北伐时的这位患难之交，哭诉了刘宗宽所蒙受的奇冤大屈……

投身于民主运动

幸免于死的刘宗宽，仍被判处了十三年徒刑。韩炼成又为他奔走，托兵役部长（原军法总监）鹿钟麟、重庆卫戍副总司令郭寄嶠作保，以保外养病为由让刘宗宽出狱。嗣后，经朋友帮忙，又以调服劳役的名义，让他到已由南京迁至重庆的陆军大学担任教学工作。因他曾是陆大的“武状元”，陆大对他是很器重的。他在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之后，陆大就以他在校表现好为名，报请免除余刑，使他恢复了自由身份。

在刘宗宽蒙难期间，千方百计营救他的，除韩炼成外，还有韩兆鹗（解放后曾任陕西省副省长）和郭则沉。身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韩兆鹗，是他的老师，当时是孙蔚如第四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刘宗宽的妻子由陕抵渝之后，全仗他关照。他经常到狱中去看望刘宗宽，送衣送物。刘宗宽出狱后，就在他的办事处落脚。韩兆鹗是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和民盟的老成员，因此，他的办事处实际上成了重庆的一个民主运动的阵地。每天在这里（重庆和平路200号）来来往往的，大都是搞民主运动的进步人士。连中共办事处的王炳南、徐冰也常在这里出现。就是在这里，1943年12月刘宗宽由韩兆鹗、郭则沉介绍，加入了第三党，投身于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浪潮。

刘宗宽之所以能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民主运动的浪潮，完全是由于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他，使他逐渐认清了蒋介石的狰狞面目和反动本质。他明白，蒋介石、胡宗南想要杀他的原因，实质上是国民党中央嫡系与杨虎城地方势力之间矛盾的演化。加上在狱中，他从一些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为参加抗日争取进步而在奔赴延安途中被捕的爱国青年口中，听到了不少关于国民党政府贪赃枉法、荒淫腐败、诬良为盗，以及特务迫害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的种种罪恶行径。再联想到抗战以来，国民党军尽管枪多人多，装备精良，却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使半壁河山沦于敌手，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尽管装备很差，却能依靠群众，深入敌后，发展壮大，屡挫日寇……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不能不引起对国家、民族和个人前途的思考。早在狱中时，

郭则沉和韩兆鹗去探望他，就动员他加入第三党。郭则沉当时是第三党的负责人之一，与他不仅是同乡好友，而且还曾是杨虎城的部下。出狱之后，又与有十七路军及同乡关系的王炳南接触频仍，得益匪浅。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对蒋介石怀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刘宗宽，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中来了。

1945年初，周恩来同志在曾家岩50号宴请章伯钧、郭则沉、韩兆鹗等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刘宗宽也荣幸地应邀前往。

那天傍晚，下着蒙蒙细雨，街上分外冷清。他是和韩兆鹗一同出门，经中四路去曾家岩赴宴的。为了躲开特务的目光，他俩身着便装，前后拉开几十步的距离，各自走路。因为必须从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门前通过，所以他们都十分警惕地注意街道两边的动静，发现没有“尾巴”，才沉着地加快步伐。直到进了周公馆，才松了一口气。

对周恩来，刘宗宽一向是很敬仰的。因为当年他在黄埔就读时，周恩来就是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但那时只是见过周恩来，并没有直接的接触。这一次到曾家岩赴宴，周恩来留给他的印象，就非同寻常了。

在宴会进行过程中，周恩来侃侃而谈。尤其令刘宗宽感动的是，周恩来对他们，完全以朋友相待，十分真诚。在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形势之后，周恩来非常坦率地说，中国共产党过去在统一战线工作上犯过关门主义的错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党中央时，错误地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而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当作是所谓“最危险的敌人”，认为由国民党分化出来的第三党比国民党更坏，采取关门主义，拒绝与之联合。这样，就把一切愿意革命和可以争取的朋友，一概拒之于大门之外。这不仅孤立了自己，而且也帮助了敌人。这是惨痛的教训。他还十分亲切地说：“邓泽生（演达）先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今后我们希望同第三党的朋友加强联系，紧密合作，有事多商量……”

听到这里，刘宗宽不禁暗暗叹服：“了不起，了不起！”这是他有生以来破天荒地听见一个政党的重要领导人作这样坦诚的自我批评。记得1939年，他受杨虎城将军之托，曾单独去见蒋介石。虽说他是蒋介石的学生，要见蒋介石，也是件难事。幸好他和康泽是黄埔同期的同学，情谊甚笃。经康泽帮忙疏通关系，侍从室才给他作了安排。他深知蒋介石此人疑心很大。所以，见蒋介石时必须把“校长”二字叫得响响亮亮，表现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相比之下，周恩来则完全不同，和

他虽也是师生关系，但一如朋友相聚，和蔼可亲，如浴春风。

周恩来这一席使刘宗宽深受感动也深受教育的谈话，成了他后来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原动力。

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叶剑英将军来到重庆。刘宗宽和杨子恒、李如苍三人联名，特意代表农工民主党的军界人物，设宴表示欢迎。李如苍是叶剑英在旧陆大时的同学，为了避免特务滋扰，他商借了虎标万金油永安堂重庆分号经理胡万里小老婆在市中区凉亭子的住宅，作为宴请地点。此处幽静闲适，席间从容交谈，又使刘宗宽了解到了蒋介石勾结日伪进攻解放区、企图消灭共产党和抗日武装力量的种种罪恶事实，更使他增强了从事民主运动的信心。

重庆谈判之后，刘宗宽清楚地看到，毛主席高瞻远瞩，为了团结建国，不计个人安危，身入虎穴，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和平的希望。而蒋介石却贼心不改，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什么“剿匪命令”、“剿匪手本”即大批出笼，并接连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蓄意挑起全面内战。尽管他当时还是一个被国民党判了刑的人，如果被特务发现他参加民主运动，与共产党、八路军的高层人士有接触，是会立即“请”回监狱，加重治罪，而立即枪决的。可是，眼看内战的日益扩大，他不能不分外关切。深知这样下去，国民党必无好下场。于是，他就作出了一俟免除余刑获得批准，解脱了朋友对他作保的责任后，即奔赴解放区大干一场的决定和安排。

在整个中国的命运处在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刘宗宽怀着对蒋介石的强烈仇恨，决心投向充满光明的解放区，这一抉择，无疑将成为他个人命运的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

“摇身一变”

然而，就在这时，刘宗宽却忽然间“摇身一变”，成了“重庆行营”的少将参谋处长。当他的故亲旧友得此消息时，无不为之惊讶，认为他太有失身价了。

重庆行营是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于1946年5月间成立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重庆行营”。重庆行营总揽西南军政大权，机关设在林森路的“军委会”原址，其人员是由原军委会成都行辕和陆军总部部分人员合并组成。主任是何应钦，因何应钦未到任，由张群代主任。后“重庆行营”改名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为长官，钱大钧为副长官，仍为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的派出机关。

重庆行营成立之时,张群委托陆大教育长徐培根物色一位专管军事的幕僚(参谋处长)。徐培根挑来选去,最后,这一人选竟然落到了刘宗宽的头上。没想到刘宗宽一口谢绝了他这番美意,说:“我不干这个事情。”徐培根好言好语劝了他一番:“你先不要说这样的话,不妨再考虑考虑,过些天给我回话不迟。”于是,刘宗宽便将此情况向农工民主党在渝负责人郭则沉作了汇报。

郭则沉对他说:“本来,我也要离开重庆的。章伯钧先生走之后,这里农工民主党的工作就交给我负责了。因此,吴玉章同志不让我走。至于你的去向,也还是让我先征求一下中共方面的意见,然后再确定为好。”

刘宗宽说:“我痛恨蒋介石,拥护共产党,这你是清楚的。现在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让我去重庆行营充当张群的军事幕僚,帮他打共产党,岂非笑话?”

郭则沉当然理解他的心情,但觉得事关重大,还是劝他稍安毋躁,先不要回绝徐培根的热心推荐。

在听取了中共方面的意见之后,郭则沉当即转告刘宗宽说:“你还是接受徐培根的推荐为好。蒋介石打内战已是肯定的了,不会因为你不干就不打了,人家还是要请人作计划、下命令的。而你重庆行营之后,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打入他们的内部,替革命作些事情。这比你去解放区的作用和意义要大得多。”

“这是中共方面的意见?”刘宗宽心里仍不踏实。

郭则沉郑重回答:“是的,我完全赞同。因此可以说,这也是咱们农工民主党的意见。”

当时,重庆行营的参谋长萧毅肃,系刘宗宽的陆大同学。此人性情乖张,为人孤傲,刘宗宽一向瞧不起他。如今岂能甘当他的下手呢?但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刘宗宽终于认识到了这一使命的特殊份量,用庄严的语调向郭则沉表示:“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放弃个人的一切打算,到重庆行营去!”

于是,1946年6月26日,刘宗宽便由徐培根陪同,面见张群后就任。

“和事佬”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确实,假如没有一点胆略,刘宗宽是决不敢打进重庆行营这样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去的。

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引起仇敌对自己的怀疑和不满,争取上司对自己的信任,并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刘宗宽不得不在对人对事上,时时处处讲究起策略来。

首先,他坚守岗位,尽力做好本身的参谋业务工

作。除一般官场应酬外,他极力避免个人社会交往,对人事与经济问题,则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尽可能给人以一种埋头苦干的形象。

当然,整天同国民党的高中级军官厮混在一起,在私下谈话中,对时局的动荡和周围的事态,总不流露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处长一级每天的中饭,是由公家专备一桌供应的,除情报处长徐远举外,其余的各处处长,都在一起用餐。在这样的场合,大家难免会借着酒兴纵议天下大事。每当此时,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上,持强硬反动意见的通常是民事处副处长周开庆和政治部主任张元良。而大多数处长,则对国民党政府持一种温和的批判态度,还偶而会发几句牢骚。因此,饭桌上常常争辩得面红耳赤。刘宗宽想,如果自己不顾客观环境,天真地同周开庆、张元良大唱反调,必定会招来横祸。所以,他只是常常在争辩得不可开交时,出来扮演一种“和事佬”的角色。

为了不使周开庆下不了台并对他产生反感,他就主动帮助处于孤立地位的周开庆圆场,和颜悦色地说:“诸位不必争了。我们谈的都是个人的看法嘛!饭桌上聊天,不拘形式,各抒己见,既不是定论,又不代表官方意见。我觉得,这个餐厅是个‘民主厅’,完全可以畅所欲言嘛!不过,无论谈论什么,只限于这个‘民主厅’的范围之内。出了这个厅,拍拍屁股,就概不负责了。对吧?”

听他这么一劝,大家哈哈一乐,就算了事。因为他总把握得住‘火候’,做到既不违反众意,又不使顽固的反共分子对他产生怀疑,所以,他很快就在重庆行营的上下左右赢得了好感,站稳了脚跟。

共产党埋下的一颗“棋子”

1947年2月28日凌晨两点,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杨敬章和稽查处长罗国熙,带领百余名军警宪特人员,对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采取了突然行动。

特务们事先切断了电线、电话,强行闯入大门之后,便把吴玉章、张友渔及十余名工作人员集中看管起来。特务们对每个房间逐一搜查,翻箱倒柜,折腾到天亮,除抢劫了一些公私财物之外,竟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文字材料。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突然袭击,吴玉章和张友渔在事先是早有准备的。1月11日晚,在《新华日报》举行九周年纪念会时,中共代表团就从南京打来电话,告诉四川省委:“形势有变,应作准备。”四川省委在吴玉章和张友渔的主持下,精简机构,疏散人员,布置

大家除必须要暂时保留的密码和一时急需的文件不能处理外,其余统统作了清理。省委机关的来客登记本全部销毁,并对地下党工作和正在深入发展的学生反蒋爱国运动也都重新作了安排和布置,以防不测。就在2月27日晚,他们得到了敌人将对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采取突然行动的情报之后,便立即将原先暂时保留的密码和急需文件销毁。当特务冲进分管机要的寇晴波同志的住房时,焚烧这些文件、密码的盆火尚未熄灭,可当一个特务从床上抱起被子盖到火盆上,将火扑灭时,文件和密码已全部化作灰烬……

国民党特务们一无所获,十分丧气。他们哪会知道,这次突然行动的情报,会赶在他们下手之前,由西南长官公署的刘宗宽设法递到了曾家岩50号呢?

当时,西南长官公署有个专门商议地方重要事务的乙种会议。除长官公署的长官、参谋处长及各处处长参加外,地方上的军政警特要员也都出席。在接到蒋介石发来的关于查封中共四川省委的密令之后,西南长官公署(行轅)立即召开了乙种会议,会议决定,这一密令由警务司令部在第二天负责执行。

刘宗宽到长官公署担任参谋处长之后,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真实使命,一般无关大局的事情,他总是泰然处之,不动声色。而这一次,他觉得关系重大,必须立即将此情况向中共方面报告。会议一结束,他就驱车前往半山新村,向住在章伯钧公馆的郭则沉作了汇报。他在进西南长官公署之前,郭则沉就曾嘱咐他:“为了隐蔽身份,你不要和中共方面在重庆的负责人直接发生关系,有重要的紧急情况发生,你告诉我就行了。”郭则沉在得此情报后,当晚即通过秘密渠道,送达曾家岩50号,转告了吴玉章同志。吴老当时有点半信半疑,但还是作了一切应变准备,这才使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避免了一场损失。

3月上旬,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之后,重庆便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有一次,刘宗宽偶尔听到萧毅肃和徐远举在谈话中提到了郭则沉的名字。他立即警觉这是不祥之兆,便急忙通知了郭则沉。

仓猝间,郭则沉决定:改换姓名,离渝赴沪,然后转去香港。改用谁的姓名呢?刘宗宽手里恰好有军政部卫生敷料厂发给他内弟崔锡昌的退职证件,为郭则沉救了急。

临别时,郭则沉郑重地对刘宗宽说:“最近,我也感到有特务在注意我。我只能走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动摇,一定要守着这个地方。你是共产党埋伏下的一颗棋

子。目前,暂时不要你发挥作用,可今后一定要使你这颗棋子发挥作用。我走之后,到必要的时候,会有人来同你取得联系的。”

第二天,特务果然就找到郭则沉住地去了。当他们扑空之后,直后悔下手晚了一步。连特务头子徐远举从刘宗宽办公室门口经过时,都忍不住自言自语地发泄:“他妈的,郭则沉怎么会不见了昵?”

刘宗宽一听,不禁为之窃喜:特务们找不到郭则沉,就说明他一路顺利,已经逃出了虎口。

就等着这一天

刘宗宽虽为郭则沉逃出虎口而高兴,但郭则沉的离渝,带给他的却是从未有过的一种心灵的孤寂。这是因为,自郭走后,就一直没有消息。临别时,郭则沉分明说“到必要的时候,会有人来同你取得联系的”,可几个月过去了,左等右盼,也不见有人来联系,他的心情愈加沉重起来。

刘宗宽想,难道我就这样死守下去了吗?与农工民主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消息极为闭塞,即便获取了重要情报,也无法送达中共方面,那么,长此下去,我这颗“棋子”又将如何发挥作用呢?……

正是在他最感孤寂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几个在国民党军中的朋友,都投奔了解放区。一天,他收到了好友陈学浩的信。陈学浩告诉他:“炼成兄离开部队了,把部队交给了我。”他立即明白,韩炼成也到解放区去了。既然好几位朋友都已离开了国民党部队,那剩下我一个,单枪匹马,在此死守还有何用?倒不如趁早离开重庆,也到解放区去,轰轰烈烈干一场!他拿定主意之后,便去半山新村向老朋友庄明远辞行。

庄明远曾给邓演达当过副官,是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后任军政部储备司司长。因内战爆发,庄明远不愿替蒋介石卖命,辞去了司长职务,正留在重庆办理移交手续。他对刘宗宽在重庆行营的特殊使命是清楚的。因此,一听说刘宗宽想要离开重庆去解放区,便立即劝阻说:“你要早走可以,现在不行。现在的局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人民解放军正势如破竹,解放西南的日子不是很遥远了。你是中共布下的一颗‘棋子’,现在不要你发挥作用,但是,你这颗‘棋子’今后是一定会发挥作用的。我劝你稍安毋躁。事关全局,你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耐心坚守下去……”

庄明远的一席话,使刘宗宽的心安定了下来。他当即放弃了去解放区的打算,决心坚守到中共方面派人来与他联系的那一天。

为了便于进行工作,刘宗宽在暑假期中把家眷接

到了重庆。

刘宗宽的妻子崔东亚,在他从监狱保外后,就回西安教书去了。因为他当时计划要去解放区,她便决定暂回西安教书待机。好在西安去延安比较近便。崔东亚回西安后,一面教书,一面同盟盟的杜斌丞、李馥清等先生一起进行民主革命运动。他们在西安创办了一个《妇女杂志》,国民党省党部却不准予登记。崔东亚找到社会处长陈固亭,因陈是刘宗宽的师范同班同学,关系较好,又与崔东亚是同乡,情面难却,就批准予以登记。由于《妇女杂志》发表了一些反对蒋介石和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受到了教育厅长王友直的警告。王友直托人转告崔东亚:“你说话写文章要小心点。我和宗宽都是好朋友,不要使我们有失朋友和气,弄得大家都不好看。”正好,就在此时,她接到了刘宗宽要她携儿女赴渝的信,她就带着四个孩子来到重庆安下了家。

妻儿们到了重庆,刘宗宽就再不感到孤单了。因崔东亚在国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又使他在教育界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这期间,不只是崔东亚成了刘宗宽的一个好帮手,就是新认识的这些教育界的朋友,也为他避开敌人、隐藏下来迎接解放准备了条件。

1949年初,解放军渡江前夕,刘宗宽感到形势已十分紧张,他又一次找到庄明远,说:“蒋介石下野在即,国共两党已是划江而治,形势很紧迫了。你快到上海去找章伯钧、郭则沉,请中共方面派人来同我联系。你要走,就得赶紧走。如果不赶紧走,解放军马上就会渡江,解放军一渡江,路就断了。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希望你赶紧去,一方面是办这个事情,另一面是为了你的人身安全,要不然,就都不好办了……”

这一次,庄明远听了刘宗宽的劝,迅即离渝,去了上海。临行前,他俩商定好了,一旦中共方面派人来时,该怎样接头,用什么样的联络暗号……可是,庄明远一去,又是好几个月没有消息,身在虎穴的刘宗宽,正可谓度日如年,望眼欲穿!

5月间,刘宗宽忽然收到好友房显志的信,说他到重庆来了,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希望刘宗宽到那里去一聚。

解放军已在4月渡江。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好友有机会相聚,这当然是件幸事。房显志与刘宗宽不仅是好朋友,而且还是干亲家,关系密切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一收到他的信,刘宗宽就喜出望外地去那家小旅馆看望了他。

房显志也是陕西人,他与刘宗宽是在西安被围八个月期间结识的。当时,他的一个名叫周成的好友是杨

虎城的随从小副官,而刘宗宽是杨虎城的随从参谋,都是杨虎城左右的人,加上周成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朝夕相处,早已不分彼此。房显志通过周成与刘宗宽结识之后,很快就让自己的大儿子认刘宗宽作了干爹。后来杨虎城当了陕西省主席,刘宗宽和周成就介绍房显志在杨虎城手下当了几任县长和专署科长。房显志长得精瘦,办事也很精干。在当蓝田县长时,适逢汪锋同志回故乡,国民党下令房显志抓汪锋,因受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他没有抓汪锋,引起了胡宗南的不满,以包庇共产党的罪名,把他撤了职。自离开西安之后,刘宗宽和他一直没有通信,有关他撤职后的情况,一概不知。忽然间他也来到了重庆,刘宗宽怎能不好好款待他一番呢?

也许是一路风尘,房显志更显得清瘦了。刘宗宽以为他是逃难出来的,未及细谈,就说:“这小旅馆哪是你落脚之地?还是搬到我家去住吧!我家早早就来了,也想见你呢!”

房显志没有推辞,当天就住到刘宗宽家去了。亲家见面,自有一番热闹,何况是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呢!

第二天,刘宗宽下班回到家,崔东亚就把他拽进内室,悄声问:“你知道房显志到重庆来是干什么的吗?”

刘宗宽不以为然地答:“陕西解放了,他当过几任县长,避难来了呗。”

“避什么难呀!他就是解放军派来同你联系的。他说,组织上给他的任务是,同你联系上了,马上报告;倘若联系不上,过几个月一定要回去。”

“好呀,我就等着这一天呢!”刘宗宽高兴得跳了起来。

原来,房显志被胡宗南撤掉县长职务后,就投奔了孔从洲。解放战争中,孔从洲率部起义,房显志也就成为解放军的一员。组织上挑他来和刘宗宽接头,无疑是最佳人选。

一听崔东亚讲明房显志的来意,刘宗宽立即下楼,抱住房显志说:“你来了,好得很!咱俩是朋友,又是亲家,别的什么都不说了,你就说,我该怎么办?给我什么任务,对我有什么要求?……”

房显志告诉他,一同来与他接头的还有一位同志,叫黄克孝,负责交通。为了便于工作,仍住在外面。目前需要他提供的,首先是军事情报:西南的国民党军队是如何部署的?

刘宗宽笑了:“这情报我早就准备好了,正着急没办法往外送呢!没想到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留出一个空隙

大西南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方案正是刘宗宽亲手拟订的。当时，他已晋升为中将，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参谋长，因参谋长缺任，他代行参谋长之职。

1949年四五月间，南京、武汉、西安相继解放，胡宗南退守秦岭、汉中、安康一带，宋希濂部与白崇禧的“华中剿总”联络隔断，解放军声威所至，四川已感到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报准伪国防部，重新调整了部署，“以期加强防御，准备作战，应付形势的骤变。”其部署调整方案大体是这样的：

一、将宋希濂的绥靖司令部改组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划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建制，以宋希濂为主任，驻恩施；

二、将孙震的川东绥靖司令部改组为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以孙震为主任，驻万县；

三、增设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以胡宗南兼主任，驻绵阳；

四、增设贵州绥靖公署，以谷正伦兼主任，驻贵阳；

五、增设云南绥靖公署，以卢汉兼主任，驻昆明；

六、成立叙泸警备司令部，以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兼司令，驻泸州，另设自贡指挥所，以其副军长卿云灿兼主任；

七、成立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以四川第八区专员庾贡庭兼指挥官，以欧百川为副指挥官。

刘宗宽亲自拟订这个方案，一方面是为了向张群、钱大钧表示自己的军事才能，使他们在大局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把惊恐不安的心绪稳定下来，以进一步取得他们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是要借调整部署，留出空隙，为解放军进军西南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在拟定计划时，对四川的第八专区长江以南的西秀黔彭，只字未提，既无任何设防，也未明文划入宋希濂防区，根本是个空白点。

这是刘宗宽有意所为；以便使一带空防，留个空隙，敞开大门，好让解放军进军西南时从这个空隙进入四川。因为这个地区是与湘鄂黔三省相接的三角地带，在宋希濂防区之后，人们最容易理解为属于宋希濂的防区，而宋希濂的绥靖公署名称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顾名思义，从地理上、名义上，想当然是属于川黔湘鄂边区绥署无疑，但计划上并未明文划入，亦无专款设防措施。明眼细心之人是能看出这个漏洞的。刘宗宽是抱着能蒙混就蒙混的主意，但也作了万一被识破天机的应付方案。调整方案在计划过程中没有任何人看出这个漏洞，但实施后，却被王陵基看出来了。

王陵基是当时的四川省主席，曾担任过兵团司令，在军事上是有点学问的。一次，他来重庆，刘宗宽去枇杷山王公馆看他，他一见面就夸奖说：“你拟订的军事部署调整方案很好，只是西秀黔彭方面没有设防，是个空隙，不知你是如何考虑的？”

刘宗宽成竹在胸，连忙回答：“关于西秀黔彭，请王主席放心，我们已在计划补救之中。”

“计划补救，这就好。如此说来，你这个军事部署调整方案就非常之完美了。”

王陵基的口被封住了。但刘宗宽徒然警惕起来。心想，万一王陵基再向张群、钱大钧提及此事，势必会引起张群、钱大钧的怀疑。于是，他从枇杷山的王公馆出来，就径直回到长官公署，当即命令第三处拟了一个成立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的方案。

这个方案，是以四川第八区长江以南之西、秀、黔、彭等县和贵州的松桃、沿河两县地方团队为骨干组成该指挥部，以第八区专员庾贡庭兼任指挥官、欧百川为副指挥官，以龚滩为后方根据地，组织防御作战。并将该地区划入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作战地域，兼受其指挥。此方案呈张群、钱大钧批准施行，并报国防部备案，还在报上发了消息。

在拟订这个补救方案的过程中，刘宗宽是颇费了一番心计的。他特意把庾贡庭找来，征求了他的意见，用以迷惑人们的视听。但实际上，这是一纸空文。因为根本没有向那里派一兵一卒，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不起任何作用，门户依然洞开。

刘宗宽将军事部署调整方案，亲自写成情报，交给了房显志。房显志随即通过交通员，送达解放区。后来，解放军入川，正是先从他特意留下的这个空隙进来的。在情况紧急时，他命令徐正纲师迅速开往酉阳秀山布防，还未到达，就在酉阳附近的行军途中，被从秀山入川的解放军缴械消灭了。解放军从这个空隙突入，直插到宋希濂部的侧后，打乱了宋希濂的阵脚，并对重庆直接造成严重威胁，加速了重庆解放的进程。无疑，这个门户的敞开，对解放四川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刘宗宽听到解放军从秀山先进入四川时，内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中共布下的这颗“棋子”，到了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

调虎离山

俗话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然而，1949年8月24日晚，刘宗宽似乎忘记了胡宗南是将他往死里整的仇人，与胡宗南并排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勾肩搭背地

称兄道弟起来了——

“宗宽兄，你们陕西人，十人九不通，一通便成龙。你是陆大的高才生、武状元，陕西的人中之龙啊！我对你极为钦佩。”

“胡先生过奖了，实在不敢当。胡先生才是了不起的人中之龙呢！”……

对此，在场的国防部长秦德纯事后对刘宗宽说：“那天，你们俩演了一场戏，彼此言不由衷地互相恭维，我听着感到好笑。你们两个，在内心里都恨不得把对方吃掉哩！”

秦德纯原是承办胡宗南整刘宗宽那个案子的审判长，对他俩各自的心思自然是一目了然的。

是的，那天刘宗宽对胡宗南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亲热，正是为了利用国民党军队的各种矛盾因素，破坏他们的作战部署，以利于解放军尽早将他们歼灭。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49年六七月间，解放军陕南军区为了迷惑敌人，对陕西敌军发动了进攻，先后攻占了安康、平利、石泉等县城，8月间进逼西乡县城，围攻甚急。守军军长盛文向胡宗南告急救救，而胡宗南手中却无兵可派，感到形势危急，特发急电向张群求援。当时，国民党内普遍认为，假若西乡一旦失守，汉中亦将不保，大巴山便整个暴露于解放军之前，四川就形成唇亡齿寒之势。而这时西南长官公署的防御重点在川东，由罗广文部控制于重庆、璧山和汉渝公路地区。罗广文是西南长官公署的主力部队，装备精良，如抽走罗部，则川东就呈空虚之势，一旦解放军进军，便失去了增援抵抗力量。因此，刘宗宽极力主张派罗广文率两个军开往汉中，以解西乡之围，屏障四川。此方案得到了张群、钱大钧的首肯，但罗广文对胡宗南怀有戒心，不愿前去。罗广文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关于给养、弹药的补给补充，要由重庆第四补给区直接负责，不接受汉中第五补给区的补给；第二，要明确他是暂时对胡宗南的支援，不脱离西南长官公署的建制，一旦完成西乡解围任务，立即回川，不再请示。如果同意这两条，他便接受命令，否则他拒不受命。

罗广文给张群、钱大钧出了个难题。说实话，那时要采纳这两个条件是有很大困难的。第一，关于补给问题，与联勤总部规定不合，若舍近求远，由第四补给区负责，乃“千里馈粮，兵之大忌”；第二，不改变建制，作为临时指挥，虽属可行，但行动仍应视当时情况，经请示许可后行动，不能把问题绝对化，形成自由行动。何况胡宗南一向骄横自大，要接受这两个条件，对他的面

子也是下不去的。

要胡宗南接受罗广文提出的这两个条件，就必须对胡宗南进行说服工作。在此情况下，刘宗宽想，只有自己亲自出马才行。他自知与胡宗南怨仇很深，多年来从不见面，断绝来往，但为了破坏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有利于解放军进军西南，他便自告奋勇，于8月24日率领罗广文第七编练司令部参谋长赵秀昆、第四补给区司令邱渊、长官公署第四处处长袁进机等八人乘专机飞往汉中，对胡宗南做说服工作。

在抵达汉中的当天下午，刘宗宽一行先同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副参谋长冯龙等会商，经过整整一个下午的争论和劝说，对方好不容易才接受了罗广文提出的两个条件，可是到了晚上开会前，一向胡宗南汇报，却被他一举推翻，形成了僵局。为了打开局面，刘宗宽思考再三，建议暂时休会。休会时，刘宗宽利用胡宗南平时喜欢玩弄权术的搞法，拉他到院子里散步。

刘宗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忱，挽起胡宗南的胳膊，并肩而行。他说：“胡先生，我这次来汉中，是给你办事情的。你晓得的，罗广文是很能打仗的，你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不会来。他的军队，装备是最好的。他又是个讲义气之人，只要你对他好，他就能与你肝胆相照，同舟共济。下午，我们已经和你的参谋长、副参谋长谈妥了，结果，被你一下子就推翻了。这样，罗广文就不可能来了。罗广文不来，你这个西乡，谁来救援？”……说到此，胡宗南忽然反问：“你们下午都商量好了吗？”刘宗宽说：“是啊，一切都商量好了。”没想到胡宗南说：“好吧，那就照你们下午商量定的办！”

复会之后，问题顺利解决。胡宗南还当场对着赵秀昆把罗广文恭维了一番：“我很钦佩广文兄，希望赵参谋长回去，替我问候广文兄！”

至此，刘宗宽此行便大告成功。这一天，恰好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徐永昌、次长秦德纯也乘另一架专机由重庆飞到汉中，前往绥远，去做安抚董其武的工作，在汉中过夜。当晚，胡宗南宴请刘宗宽一行和徐、秦二人，还有陕西省主席董剑出席作陪。于是，宴会前便有了胡宗南与刘宗宽这两位仇人握手言欢的一幕。在场的人哪里知道，刘宗宽与胡宗南的这番亲热，其目的都是围绕着调动罗广文的部队做文章，施的是调虎离山计呢！

巧妙的“情况判断”

8月25日一早，刘宗宽一行就从汉中回到了重庆。也就是这一天，蒋介石从广州飞来重庆。这时，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兰州宣告解放，佯攻西乡的解放军

也陆续撤走，汉中暂趋稳定，但大局却紧张起来。国民党内部都注视着解放军下一步是继续西进，解放新疆，还是先解放大西南？如果先解放西南，当然是先解放四川。而解放军主力是从北面行动，还是从东南行动？这是首先必须判明的。在这紧急关头，西南长官公署召开了一次由蒋介石亲自参加的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因有蒋介石亲自出席，被称作“御前会议”。显然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军事会议，不可等闲视之。

这次会议由张群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蒋经国、黄少谷（蒋介石的秘书）、钱大钧、刘宗宽、徐远举、刘文辉（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罗广文、宋希濂、胡宗南、沈策、杨森（重庆市市长兼二十军军长）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共20余人。开会时，先由徐远举作了“敌情报告”，然后由沈策作了“情况判断”。

这次会议是由西南长官公署召开的，当时刘宗宽是副参谋长代行参谋长职权，按照常情，照例应当由他作“情况判断”，或由第三处（即参谋处）处长来作，为什么一反常规，由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来作呢？

原来，这是刘宗宽在经过一番考虑后有意作出的安排。

事先，刘宗宽和房显志一起研究判断，认为解放四川主力一定是从东面进军。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是这样分析，所以一直在大巴山一带构筑碉堡防御工事，部队主力配备在川东。为了便于解放军入川，必须把国民党的防御重点由川东北转移到川西北，为此，刘宗宽酝酿了一个足以迷惑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判断”构思，提出：兰州解放后，解放军很可能停止西进，除就近以一部分兵力解放西宁外，其主力必将先解放西南，统一关内，然后再进军新疆。这样，四川就首当其冲。而自衡宝战役后，没有解放军大部队活动的迹象，何况这方面地形险阻复杂，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鄂西北虽有一部分游击队活动，但兵力不大，没有增加兵力，不像有向四川进军的准备。因此，不会由川东方面来。川北方面，有川陕公路相通，背后又有陇海铁路，交通便利，从这些方面容易运送大部队。当前，东面的西湖方面没有发现有大部队活动，只有兰州有大兵团活动。共产党决不会舍近求远，去取新疆。兰州解放后，必然利用这支部队挥戈南下，采取三国时代邓艾伐蜀，经武都、出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两路会成一把尖刀，直插川西平原。这样，国民党整个在四川的部队，便成瓮中之鳖，四川唾手可得。刘宗宽从中还特别强调邓艾伐蜀这一历史典故，迫使国民党当局相信他的“情况判断”。

刘宗宽和房显志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这个“情况判断”的构思可以成立，刘宗宽便先征得第三处处长孙伯先的同意，令他根据这一构想，制成“情况判断”图，并写出“情况判断”文件。然后，把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约来，由刘宗宽同孙伯先向沈策作了详细说明，进一步取得了他的同意，并请他开会时出面作“情况判断”报告。

能在“御前会议”上作“情况判断”报告，这无疑是一个在蒋介石、胡宗南面前表现自己的极好机会，说不定因此而获得蒋介石的赏识，沈策可谓求之不得，便欣然接受了下来。

这是刘宗宽所用的又一个计谋。这个“情况判断”，是把胡宗南摆在主要防御方向上，由沈策出面报告，就不但容易取得胡宗南的赞同，同时，因为是把胡宗南摆在重要地位上，蒋介石也必然会赞同。这样，也就避免了蒋介石、胡宗南对刘宗宽的注意。即使蒋介石不同意，也不会把刘宗宽暴露出来。果如所料，沈策报告后，大家一致同意，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看法。

会议匆匆结束之后，西南长官公署便根据这个“情况判断”报告，即改令罗广文率其主力108军、110军（欠110师），是夜开赴川西北青川、平武一带，沿川陕甘边界紧急布防，构筑防御工事，并相机向甘肃境内白龙江方向派出前进部队，阻止解放军南下。罗广文即于9月初率部由川东迅速向西北开动，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刚到目的地，部署尚未定，气还未喘过来，川东形势却紧张起来，又奉令赶紧开回重庆。就这样，把这个部队在长期连续紧急行军中拖垮了，及开到重庆附近，在南川以东白马山一带紧急布防，部队还未全部展开，就被解放军击溃，歼灭了大半。罗广文这支国民党的精锐之师，有好几万人，无形中丧失了战斗力，这是刘宗宽所作“情况判断”获得成功的最核心所在。消息传来，他竟兴奋得一夜笑醒了好几回。他日夜盼望的大西南解放的那一天就要到来了！

紧急情报

蒋介石自然是不甘心于他的失败。为了确保重庆，撑持危局，他下令撤销了重庆警备司令部，成立了以杨森为总司令的重庆卫戍司令部，以二十军为骨干，加强重庆防御力量。西南长官公署为了防止解放军突然逼进长江，危及市区安全，下令卫戍总司令部以三个师的兵力在重庆南岸由大兴场经黄桷埡至九龙坡一带地区占领防御阵地，构筑工事，进一步做好保卫重庆的战斗准备。之后蒋介石又亲自下令紧急抽调800辆汽车，将在川北布防的胡宗南的所谓王牌军——第一军，星夜

车运重庆,决心在重庆来一个大决战。

这是一个极为机密的紧急命令。这时,西南长官公署刚刚停止担负作战指挥之责,抽调800辆汽车运兵的这个密令是刘宗宽听补给区司令向他叫苦时偶然得悉的。

这是不可多得重要军事情报。刘宗宽立即同房显志商量,设法把这一紧急情报尽快送出去。同时,他还建议解放军前线部队,迅速向重庆挺进,以粉碎蒋介石这一紧急部署的企图。可是,这时已无交通可派!

怎么办?最后,房显志终于想到由二野派来做余正保工作的一位同志尚在重庆,就请他专程将此情报送出。当时正值兵荒马乱,到处是防线,为了保证这位同志安全通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防线,刘宗宽设法从总务处处长手里搞来一张空白护照,亲自为他填写了假姓名和军职,把他化装成了一个国民党上尉军官,穿戴着国民党的军衣符号,拿着西南长官公署的护照,大摇大摆地出了重庆城。临行时,刘宗宽向他交待说:“这是最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只要能见到解放军前线部队,就一定会有电台,即可直接报告二野司令部。”

后来,这位同志果然顺利地越过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防线,完成了传递情报的任务。由于解放军飞速向重庆挺进,胡宗南一部刚刚运到南川附近,就被击溃。蒋介石保卫重庆的幻想破灭了,国民党军仓卒向成都撤退,使重庆的解放整整提前了三个月!

原先,刘宗宽和房显志所得的情报,都是由交通员递送,既费力又费时。后来,组织上决定派人来重庆建立电台,但由于情况发展太快,解放军日夜赶进,结果来重庆建立电台的邹逢春同志,同解放军同时进入重庆。当邹逢春见到刘宗宽和房显志时,忍不住激动地说:“按照原先的进军计划,希望春节能抵达重庆,结果,11月30日就解放了重庆。这多亏你们的情报送得及时啊!”

解放西南第一功

在国民党守军土崩瓦解、重庆即将解放的时刻,刘宗宽深入虎穴的特殊使命也就即将完成。全面胜利快要到来了,在这样的关头,他当然不愿再同国民党军一起撤退逃跑了。

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派,隐藏下来,迎接解放,刘宗宽早就作了多种设想,并利用亲朋好友的关系,分别作了一些安排。11月28日早,他接到了钱大钧的手令:“刘代参谋长率领长官公署官兵及警卫团向成都前进”。有了这个手令,他就获得了自由活动的机会,一切掌握了主动。他家住在临江门外的华一村,接到钱大钧手令后,他即故作撤退的布署,命令总务处长刘璣璜率领队伍先行出发,自己则托词把其它事情安排一下,然

后马上赶去。随后,他将家中衣物用具送到李子坝半山新村事前租好的房子里存放。当晚,他仍住在华一村。29日清晨,他先给卫戍总部参谋长范延生打电话,了解情况,接着又给钱大钧打电话。钱大钧一听是他,脱口便问:“参谋长你怎么还没有走呀?”显得十分惊讶。他从容地回答:“昨天我还有一些事情必须安排,安排定了,天就黑了,没有走成。队伍已令刘璣璜率领出发,现在我打电话就是向你报告,我马上就出发了。”

打完电话,刘宗宽一面命令通讯兵撤收电话,一面命令警卫团卫兵撤卫归队。他随即离开华一村住宅,去半山新村,把夫人、小孩安排之后,就带上警卫员坐上吉普车,载着行李、箱子,装做出发的样子,开到沙坪坝崔东亚妹夫李煌家,寄放了行李武器,换上便衣,由李煌父亲李善陪伴,从李煌家后门出去,穿过旷野,来到重庆大学教授杨清家暂住。在他去重庆大学后,由他夫人崔东亚把房显志同志送到李子坝武汉疗养院“疗养”,度过真空。

11月30日晚,重庆解放。解放军进城后,房显志同志很快就同上级派来的邹逢春同志接上了关系。12月2日晚,房显志和邹逢春就坐着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吉普车到沙坪坝把刘宗宽接回市区。大地重光,家人团聚,他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二野司令部进驻重庆后,先是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来看望刘宗宽,随后是情报处处长柴军武(即柴成文)来拜访。几天之后,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宴请了他。

当时,刘宗宽的朋友赵寿山、杨明轩来信,邀他到西北去工作。杨明轩又是崔东亚的老师,刘宗宽觉得不好推辞。再则,西北是他的家乡,他当然是乐意回家乡工作的。可西南军区首长不肯放他,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签发聘书,聘他就任西南军区高级参议,并希望他为进军西藏献计献策。

1950年底,刘宗宽应院长刘伯承之邀,调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先任军事学术研究室副主任,负责全院教材的编审;后任战役战术教授会副主任及战术教授会副主任,负责教学的领导工作。刘伯承对这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将军一向是很尊重的,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会议上,曾多次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介绍说:“刘宗宽同志是我们自己人。解放西南第一功。进军西藏,我采纳了他很多宝贵意见。你们可不能歧视他!”

解放西南第一功,这就是刘伯承元帅代表党和人民对刘宗宽深入虎穴、完成特殊使命的褒奖,他也就此而引以为一生的光荣与欣慰。

提起罗广斌,人们都知道是小说《红岩》作者之一。而罗广斌有个哥哥叫罗广文,曾是国民党中将司令。解放前夕,罗广文将军率部在四川起义,这段历史至今却鲜为人知。

西蜀沉戈

——罗广文将军起义纪实



●谢谷 祁人

—

一九四九年秋,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的配合下,为全中国的解放发动了进军西南歼灭胡宗南集团及其国民党部队的作战。人民大军压境,国民党军队人心惶惶,上下如惊弓之鸟……

远离市中心的山洞陵园。四周拉着密如蛛丝的铁丝网,蒋介石的侍卫队人人头戴钢盔,手执美制汤姆逊冲锋枪、荷枪实弹、剑拔弩张,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神情紧张地注视着四周。

蒋介石的临时公馆,灯火通明的大厅里正开着军事会议。为固守西南,蒋介石亲自从台湾飞来重庆部署战事,妄图凭借四川天险地势作为复兴的根据地。面对顾祝同、钱大均、胡宗南、杨森、宋希濂、王陵基、邓锡候

等一批高级将领,蒋介石吹嘘了一番国际形势及美国的援助后,说道:“诸位,现时,这个,是非常时期,希望大家同心协力的,确保大西南防线。”

蒋介石指着壁上的军事地图对将领们一一命令,最后他缓步走过来,停在长方桌的一端,“啪”的一声,一位身材魁伟的一米八的大个子中将霍的站了起来,长筒靴上的马刺碰得铮铮作响。蒋介石微微一笑,拍了拍中将那厚实的肩头:“坐吧,坐吧。”

那中将腰胸挺直,一动不动地望着蒋介石,蒋介石脸上仍挂着微笑,语音却变得硬涩,一字一顿地说:“现在胡主任已率部退居汉中,主要兵力防守秦岭,但甘南武都地区成了缺口,这个、这个共军如从该处入川,不但截断了胡部的后路,而且也危及到四川的安全,令你

率十五兵团火速开往甘南。”

“大车扬尘，亭午暗阡陌。”从贵阳通往重庆的公路上，真如诗人李白在《古风》里描绘的那样：隆隆着响的辘重炮车，鸣叫不停的美制“吉普”，十五兵团的人马在公路上卷起了一条望不见首尾的黄色巨龙。

部队由大竹开拔，刚进绵阳，昭化却接蒋介石电令：“共军从阆入川，速回，开往娄山关。”头倒回来，急行军，后续部队刚出川又接蒋电令：“火速回师南川布防，违者处以军法。”来回折腾，数千里连续行军，官兵十分疲惫，逃亡者甚多。

“嘟嘟，嘟嘟……”一辆草绿色的美式吉普在弹坑间艰难地爬行。车里坐着的正是国民党十五兵团司令官，大西南防区赫赫有名的罗广文将军。

罗广文将军生于一九〇四年，祖籍四川忠县，太来乡罗家岭，父亲罗宇涵乃前清秀才，川大教授。罗将军自幼从父习文，后深感国弱民贫，尽受外夷欺辱，便弃文尚武，远涉重洋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九二九年从日本毕业回国后任黄埔军校少校教官及军官队长，时背以古训教育学员：“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九·一八”、“七·七”事变后，日寇铁蹄踏我国东北三省及华北地区，罗广文将军极力支持抗日主张。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日本官兵两人驾军用汽车无故猛冲上海虹桥机场，被忍无可忍的中国守军当场击毙。日本帝国主义即以此为借口，八月十三日在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罗将军率十八军四十二旅在上海宝山、昆山一线与日寇浴血奋战，至弹尽粮绝时奉命南撤。一九四〇年夏，在指挥鄂西石牌战役中，罗将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使部队士气大振，大获全胜，重创敌寇并缴获大批枪械，捷报传回，后方军民无不欢欣鼓舞，很快，将军身着戎装的照片见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因他对日作战功勋卓著，特擢升他为中将军长……

此时，罗广文将军紧锁眉头，闭着眼靠在扶椅上。他太累了，连日来，通宵达旦地行军、研究地形布防、拆防，众多的电令、电训搞得他头晕眼花、无所适从。

这仗往后怎么打？他感到从没有过的茫然。

杜聿明、傅作义、卫立煌，几百万部队只是一瞬间就被打垮了，难道该轮到自已了吗？他不禁睁开布满血丝的眼，只见公路上被遗弃的炮车、卡车、枪支弹药比比皆是。溃退下来的宋希濂部队的官兵蓬头垢面、哀苦连天，见此情景，罗广文将军不由长长地叹了口气。

二

距前线尚有几百里的山洞镇一〇八军指挥部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电信兵们正忙于收发，一切都显得乱哄哄的，墙边一幅巨大的军事地图前，军参谋长贾应

华正望图凝思。

“报告。”卫兵跨了进来：“参谋长，外面有人要见你。”

谁？贾应华走进会客室一下愣住了，原来是陈济生。

陈济生，北京人，黄埔十四期毕业，从军来一直在罗广文和自己的手下，因有智有谋颇能作战而为自己和罗司令官所赏识和信任。由于战功卓著，1947年秋被调往傅作义部任副师长了。后听说被共军抓住给毙了，闻讯，自己和罗司令官还为他感叹呢！

今天见到陈济生，贾应华上前紧紧抓住陈济生的手，带到自己的卧室才迫不及待地问道：“你不是给共军毙了吗？怎么……？”

“贾兄，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陈济生开门见山地直说：“我此行正是为了使旧友等不要误信共产共妻及傅作义将军起义被扣等骗人的宣传……”

贾应华插断了他的话问道：“济生，你已两方面都见了庐山真面目，以你所见，为什么国军打不过共军？”

陈济生仅用了一句话回答：“是新制度打倒旧制度。”并告诉贾应华：“黄埔军校以廉洁驰名的李明灏主任，他让我致意罗先生，不要再愚忠于腐败透顶的蒋政权了。”

望着沉思的贾应华，陈济生又进一步陈述道：“你和罗先生兵虽多、将虽广，但与傅作义将军相比：以军事力量言暂无三军之强；以经济力量言傅拥有河套之富；以政治力量言傅有一整套办法；而我则于北京香山门头村一役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已甘认是败军之将……”

这下击中了贾应华的要害，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他和罗广文对时局也失去了信心，也常相商在凉山一带搞上块根据地，以壮大力量。但贾应华此时被陈济生一席话说动了心，对陈的见解已信而不疑了。

陈济生继续讲道：“这次来渝，正是奉二野刘伯承司令、邓小平政委的指示，争取罗先生和平起义，减少战争带来的破坏，避免人民生命财产遭受过多的损失。”

经过三思，贾应华决定先去试探一下罗广文的态度，并让陈济生亲笔力陈利害，相机再让其面见罗广文。

翌日，贾应华来到罗广文寓所，恰逢蒋介石的侍从参谋来电话告训，说他“布防缓慢，如出差错要承受军法。”罗广文非常气愤，摔掉话筒后大声责骂老蒋指挥无能，把部队拖得散沙一盘，一打准败。贾应华抓住机会向罗广文谈了陈济生来渝目的和刘伯承、邓小平对他的致意与期望，以及李明灏主任的忠告。

罗广文对此未明确表态。贾应华回去同陈济生商量,决定一同找罗广文面谈,但罗却奉命去了南川前线。

事过几天后,罗广文把兵团副参谋长(原蒋介石的侍从参谋)调开,升任贾应华为十五兵团副参谋长,并电令贾于二十四日前往南川前线。

看来形势所迫,罗广文心“活”了。二十三日,陈济生和重庆地下党联系后,决定由地下党负责人当晚七点在重庆市凯路棉纱仓库直接和贾应华详谈,并面交与解放军联系的密电本。

午饭后,贾应华备好车正准备去接陈济生,这时,兵团情报处长来了。此人叫林茂,是蒋介石钦点,由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重庆行辕二处(即小说《红岩》里大特务徐鹏飞(徐远举)的队伍)调来的。前线的官兵对“御史”既惧怕又无可奈何,唯恐他一纸报告递上去,届时上至将军、下至士兵都有人头落地的危险。尽管林茂平日对人处处显得谦虚随和,但贾应华对他还是敬而远之。这人平时整日埋头公文,搜集情报,很少离开他那几间烟雾沉沉的房间,怎么这关头他来了?

“林处长,今天好天气啊!出来透透气?”贾应华心头一紧,脸上却露出笑容上前搭讪道。

“是呀,今天天气好,贾副参谋长。”林茂微笑着踱了过来,背靠着吉普车,右手指轻轻地叩着那光洁照影的绿色铜壳,“老兄,兵团就你和罗司令最熟。”

林茂调转头,一双眼睛长久地直视着贾应华,“听说罗司令官有个胞弟叫罗广斌,是吗?”

一听林茂问这,贾应华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他怎么会不知道呢,罗司令的胞弟是中共地下党员,几年前,他在罗公馆听过这年轻人对时局的分析:“不出三、四年新制度必然代替腐朽的旧制度。”年初,罗广斌被重庆行辕二处逮捕了。罗司令官也常为此事焦虑,他父亲数次要他想法把弟弟放出来,使他十分为难,不去是不孝,去又不忠。

林茂问这是什么意思?贾应华还未开口,林茂又道:“贾副参谋长,别误会。有人告诉我罗长官的弟弟被二处抓了,请我向二处说情将其释放。贾副参谋长,请私下转告罗长官,林某已将此事拜托徐、杨二处长了。”

“好的,我一定转告。”贾应华口里应着,心里却在想,林茂真是要借此机会博得罗广文的信任吗?还是另有所图?不过,贾应华知道林茂在重庆行辕二处时不但和大特务徐远举关系密切,和副处长杨元森还是喝过血酒的盟兄弟呢。而杨元森则是徐远举在黄埔军校时的区队长,俩人既是师徒又是同乡、同僚,关系甚为密切。不过,此刻陈济生就在咫尺之间的半坡茶馆,如若被林茂发现又将惹出许多的麻烦,得赶快离开,贾应华

对司机一挥手,又对林茂招呼道:“林处长失陪了,改日再登门……”

“别急嘛。”林茂一面拍拍刚启动的车头,一面指着远处姗姗来迟的兵团参谋长慢悠悠地说:“刚才国防部来电,叫我们三人马上赶去。”

贾应华没料到事情来得这么突然,连通知陈济生都来不及了。

当晚,贾应华未能与地下党联系上。

开完会,蒋介石派其侍从参谋胡伟达携带他给罗广文的亲笔信,并同日寇侵华时华南派遣军参谋长斋藤,和贾应华一道连夜赶往南川前线。

次日一早,罗广文、贾应华等陪同斋藤、胡伟达勘察了白马山一带的地形后,斋藤拟出了一个攻势防御方案:

乘共军二野三兵团远来疲惫和部队分散状态时,国军主力兵团利用战机对沿川湘公路而来的共军部队进行逐次打击。

斋藤、胡伟达一行刚离去,罗广文恨蔑视地把蒋介石授权让日本人拟的作战方案抛入了废纸堆。他认为:如果面对的是十多年前从江西万里辗转远道而来的红军,趁其兵员疲惫迎头不断出击是完全必要的。而此时,面对的是刚打垮蒋介石嫡系宋希濂部队乘胜追击而来的共军主力兵团,对方士气高涨,而国军呢?虽然蒋介石正运来大批无后座力炮、先进的通讯设备器材,但未等他下发到正向南川靠拢的各军、师、团,共军的强大攻势必已全面展开了。因此,对于蒋介石的命令他有自己的打算和看法,他让少数部队在白马山布防应付一下蒋介石,眼下罗广文焦虑的是部队往何方撤。

作战室只剩下了贾、罗两人,贾应华才把陈济生写的信交给了罗广文,罗阅信后先斥责贾应华,不该在这剑拔弩张的前线带来这东西,应好好想法保存部队。罗广文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踱步,片刻停了下来,又详细地询问陈济生的安全,并告诫贾应华此事要绝对保密。

三

二十五日,在白马山一线布防掩护兵团主力集中的二四一师,其七二三团在团长崔百川的率领下突然临阵起义,阵地出现了缺口,解放军乘机冲了过来,十五兵团还未集中的各部仓促应战一触即溃,于是兵团以营为单位各自渡江后撤。

再往后,部队朝什么地方去?

在南温泉仙女洞兵团司令部里,将领们为部队的去向争吵不休。贾应华想在重庆通过陈济生和地下党联系,争取在重庆拉部队起义,便提出部队往重庆撤。几位军、师长却极力反对,重庆明显是共军主力兵团的大目标,去那里不是自投罗网吗?他们主张向川东或川

西南的根据地撤退。罗广文听后沉思半晌,然后起身一字一顿地命令道:“各部队按贾参谋长的方案办。”

部队后撤的第三天,罗广文带着贾应华先赶回了重庆,中午与国防部联系,得悉部队在迎龙桥、栢青场、南温泉诸地点同时遭共军袭击,各军、师团均失去了联系。

怎么办?贾应华与罗广文商议后,决定自己去找陈济生,罗亲自去联系部队。

在沙坪坝,贾应华又与林茂相遇了。

这人象阴影似的老跟着自己,贾应华不禁深感不安,时间紧迫不能再与他慢慢周旋了。贾应华大踏步迎了上去,以兵团参谋长的名义告之林茂:军情紧急速利用附近重庆行轅二处的先进通讯设备赶快寻找失散部队和罗长官。

赶到二处,林茂大吃一惊,原来戒备森严的二处,此时竟只有一个班的警卫守着。院坝中燃起熊熊烈火,几个小特务神情紧张地把一捆捆文卷扔入火堆。上楼后只见副处长杨元森一人守在机房,林茂与盟兄寒暄中始知二处的特务已全部逃走了。杨元森叫来警卫去买酒菜要与林茂饮酒话别,林茂却急着收发电话。

午夜时,二处处长徐远举匆匆上楼来,一见林茂即惊异地问:“老兄,你们的仗是怎打的?”

“胜败乃兵家之常,哪有常胜将军。”林茂回答。

“罗司令官在哪里?”

“我们也正在找他呢。”

接着徐远举转问杨元森:“乡下(指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等监狱)的事怎么样了?”

杨元森说:“正在催办。”

“乡下事一定要在明晨七点前完成,事后你即可离开重庆。”

随后,徐远举又对林茂说:“林兄,你托的事今晚我就给你办。我把他(指罗广斌)交给你,请你一定把他转交给罗司令官。”

林茂当时的处境无法办到,只好向徐说明,现忙于联系部队和寻找罗长官,无法把罗广斌交给罗长官。

徐远举经林茂一再说明现时的困难后才说:“那我就自办好了。”说完和杨匆匆离去。

(二十七年后,林茂从战犯营中出来,才听说罗广斌在“文革”中难忍“叛徒”罪名而跳楼自杀了,“罗君枉矣!”作为知情者的他总不免常为之怅怅然!)

贾应华当天找到陈济生后,陈即向他传达了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罗广文、贾应华留在重庆就地起义。

贾应华考虑再三,说道:“济生,马上要罗先生起义看来不太成熟,加之罗先生眼下成了光杆司令,这时起义意义不大,待部队收拢再起义岂不更好吗?”并希望

陈一同后撤。

陈济生觉得有理,决定再找地下党负责人联系。临分手时,贾应华再三告诫:“济生,军情紧急,望你今晚务必赶到兵团司令部回话。”随即派车把陈济生送走。

通过联系,陈济生才找到解放军二野政工部和地下党的同志。经研究,同意陈去罗部策划起义。

深夜,陈济生风驰电掣地赶到海棠溪渡口,只见江岸数百辆榴重炮车纠集在一起,如兵山一座把个渡口阻得严严实实的。探照灯在江面上来回扫射,汹涌浑浊的江水由西向东滚滚流去。江对岸不远山崖上就是十五兵团司令部,隔江遥望,山崖上那巨大的塔型天线在夜色下影影绰绰。熬到天亮,陈济生跳上了第一班过江的渡轮,匆匆赶到十五兵团司令部,晚了!人去楼空,罗部已不知撤往何方了。

原来,那天罗、贾二人回到重庆时,蒋介石尚在陵园,立召罗面谈,蒋询问罗部队的情况后即令其部归杨森指挥,并马上出发。罗广文快快不乐回到海棠溪兵团临时司令部时贾应华也回来了,俩人一商量,决定司令部当晚出发,可往哪去呀?听杨森的,不行!自己的部队在什么地方呢?正为难之际,林茂赶回来了,经过一天一夜,他终于和各部队联系上了。得知一〇八军主力正向蓬溪三台地区移进,罗广文当即决定:“兵团部即刻转移铜梁,令各部向铜梁集中待命。”

四

潼南、遂宁、三台,罗广文部队沿着昔日巴蜀古栈道缓慢而进。

一路西行,荒野茫茫,山风刺骨,细雨绵绵,罗广文心中孤独和苦闷之情悄然而升。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回家。”风雨飘摇中,罗广文心头强烈地思念起他那个充满温馨恬静的小家庭来,渴念着他的妻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对于战事,罗广文此时已是彻底心灰意冷了。如果不为几万弟兄的归宿着想,他真要脱下军装立即奔归故里,享受一下家庭之乐了。

黄昏时分,部队刚住下,罗广文尚未摆掉那缠绵的情思,三台小城那独有的青石板路上远远地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蒙蒙烟雨中的一匹乌黑战马风驰电掣而来。

“大哥!委员长要嫂嫂及家人即日飞往台湾。”罗广文的堂弟由成都昼夜兼程赶来:“昨日,蒋介石的老侍卫长俞济时亲自来电话通知‘委座命罗眷属乘机飞台,已派专机在机场等候’。”

“什么?即日内……”罗广文话音不禁有些颤抖,他双眼怔怔,眼前马上浮现出妻子那俊秀的影子。他预感到,妻子一登机恐怕今生今世就再难相逢了。想到“物

价事情”与“南川兵败”，他更加着急起来。

年初，物价暴涨，大众民不聊生，而大官僚和投机商们却趁机大饱私囊。为百姓，也为稳定沸沸扬扬的军心，罗广文先后在新闻发布会和群众集会上大声疾呼：“如果投机家们不听劝阻，继续操纵物价上涨使军民交困，那十七万饿老虎就要出来吃人！”十七万饿老虎即罗广文手下的十七万中央军。事后，重庆的大小报刊争相发表这极富爆炸性的演说，这却触动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引得老蒋大为不满，骂他多管闲事。这次“南川兵败”蒋介石本来就要对他查办，只因军情紧急极需用人吧。

罗广文跟随老蒋几十年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蒋介石一贯独裁专制，心狠手毒：张学良、杨虎城、韩复榘……想到这些，一个冷噤掠过全身，“尧华，尧华……”他心里默默地念着妻子的名字，可山高路遥鞭长莫及啊！瞬间，百战沙场的将军也觉两眼湿潮了。

这时，贾应华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

怎么？屋里气氛不对。当得知是为罗夫人及家人担忧时，贾应华忙把罗广文拉到一旁悄悄告之，罗夫人等已由自己妻舅保送到灌县了。

罗广文一颗悬着的心顿时安定下来，随即惊喜地问道：“应华，你怎么不早说呢？”

贾应华忙解释：“我也是刚才在电信局和妻子通话时才得知的。”

罗广文了解到贾应华妻舅的九十五军情况，而后当即决定：一、任命贾应华为十五兵团参谋长；二、部队立即向新都开拔。

现时新都附近的彭、灌、邑都属邓锡侯的管区。而罗、贾两家与邓部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罗广文的父亲与邓锡侯交谊甚笃，罗广文又与邓的秘书长杨永浚是连襟，而贾应华却是邓部主力九十五军军长黄隐的妹夫。两部军官沾亲带故者盛多，所以部队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抗战结束后邓锡侯回川被委以四川省政府主席的空衔，那时四川众多的地方军阀划地为王，相互间你争我夺。邓锡侯与几个大军阀相比，显得势孤力薄极需外援，罗广文以十七万全部美式装备的中央军坐镇四川，无形中成了邓的后援。

部队到达新都，各自走散的军、师、团也陆续到齐了。整编后，罗广文在新都广场召集官兵训话。他腰胸挺直，步履生风，跨上台随即脱下军帽露出个光光的头。罗广文自日本士官学校归来后就长期留着光头，他说：“这样才是真正的军人。”今天他露着光头，再次现身鼓动官兵士气：

“弟兄们，现在形势对我不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触即发了，必要时我们可以进

军西藏上喜马拉雅山打游击去……”

当晚，罗广文带着贾应华以探亲为名，秘密地由成都去灌县。

灌县归邓部九十五军管辖。几天前，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部已在彭县宣布起义了。两人到灌县，贾应华即与九十五军黄隐、民革代表曹惠文、解放军二野情报处章浩然等人连夜商谈，了解起义的有关政策。

罗广文惦记着妻子，下车后就往灌县的新家走去。此时，天已黑尽，空中飘着蒙蒙细雨，不定向的风夹着雨丝直往人脖子里乱窜，冰冷的水点使人不寒而栗。小城东边的罗公馆里正灯火通明，楼下大厅里几桌麻将搓得哗啦啦响，邓锡侯、刘文辉及将领们的太太、夫人们玩得正起劲。罗广文的妻子叶尧华在大厅侧的小屋陪着黄军长的太太闲聊。叶尧华正诉说着自己丈夫心粗，天寒担心他在鄂西战役时所受的伤又发炎，话音未落，忽听得大厅里的人骚动起来，哗啦哗啦的麻将声、叽叽喳喳的噪音全没了。

叶尧华忙拉着黄太太走出小屋，迎面见院坝中一个剽悍的军人大步走了进来，是广文！

“你……”望着从天而降的丈夫，叶尧华一时不知所措，站在大厅中愣住了。

“尧华！”罗广文见妻子那傻样儿却先忍不住笑出声来：“没想到吧？”

“叶太太都快想死了，刚才正说曹操，曹操就到了。”黄太太大声地招呼道：“罗司令，叶太太，我们就不打扰了，你们谈吧。”黄太太的一句话，使那些夫人、太太们都乒乒乓乓放下手中麻将牌纷纷告辞。

瞬间，若大个客厅变得空荡荡的，静悄悄的。叶尧华眼巴巴的望着丈夫，眼眶里滚动着泪花，未曾开口却一下伏在丈夫那结实的怀里哇地哭了起来：“广文，别打了，我怕，我怕……”

妻子叶尧华是四川大学的高材生，长得婀娜秀气，和丈夫那高大魁伟的身躯相比显得那样的小巧玲珑。她贤惠善良，孝顺老人，不善言谈，人多时一开口就脸红。受过高等教育的她，思想开明，常劝丈夫别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民族的事。解放军刚入西南，她就再三劝丈夫顺应潮流、弃暗投明，终日里为丈夫担惊受怕。

罗广文抱着妻子不断抽搐的身子，手轻轻拍着她的背，半晌才长叹道：“尧华，我何尝不想立地成佛呵……”

五

就在罗广文离开部队的第二天，在南川“走散”的原十五兵团政工处长谷若虚，二四一师七二一团团长吴德辉突然出现在三六六师师部，谢师长颇感惊异。

谷若虚，湖南桑植人，贺龙将军同乡。谷曾在胡宗

南部任过职，在陕北时多次和贺龙将军坦诚面谈，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了解。谷若虚告诉谢师长，此行是受解放军三兵团陈锡联司令员的拜托而来。陈司令派专车把他们从重庆送至简阳前线，托他们来找罗广文劝其起义。

谷若虚跟随罗广文十多年，他深知罗的性格刚烈，治军严厉，对部下扰民者、嫖娼者、贪污者轻则训斥，重则枪毙。罗特别注重“忠孝”，看川剧《岳母刺字》每次都要流泪。抗战期间，母亲在家生活艰苦，一次同乡来河南前线，罗母托他捎去几个家乡甜柚并说：“你若看见我家广文，叫他带点钱回来给我买糖，我想吃糖。”罗广文闻言双泪滚滚而下，连连向家乡方向跪拜：“母亲太苦了，儿在前方抗日恐难尽孝道了。”1939年，罗率部回重庆整编训练，冬天，母亲在忠县老家去世，罗闻讯星夜兼程奔回老家为母亲举行葬礼，在母亲灵柩前哭拜再三，几乎昏厥。他也是一个“忠孝不二”的人，从不过问政治，只知军人的职责就是服从。所以，抗战一结束，蒋介石未容他卸鞍下马，又命他马不停蹄兵不解甲，赶赴内战前线鄂西北作战，河南围困李先念部队，山西阻击陈赓部队，山东与陈毅抗争。为此，他被升为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并获蒋介石亲授的“军人魂”佩剑。

谷若虚与谢师长关系甚密，又早知谢厌战，所以首先来找谢师长。

谢师长听完谷若虚的介绍，当即打电话请来二四二师师长黄健三、二四一师长王显庆、一〇八军副军长李维勋，参谋长张荣宪等一批将领商议。谷再次说明来意，并宣读了陈锡联司令的信：“……如再不起义，兵临城下那时将成千古罪人。”

听了陈司令的信和谷若虚对战况的分析，将领们纷纷争论起来：

谢师长带头提出立即起义。

张参谋长唯恐有“犯上”之嫌，犹犹豫豫半天才说：“就怕罗司令官不同意。”

几个青年将领马上提出等罗司令回来时就地挟持其起义。

他们要一直保持沉默的李副军长表态，李推托不过只得坦诚相告：“起义是一条路，但大家都是跟随罗长官戎马多年的，罗长官对我们义如弟兄，如硬来恐罗长官一时想不开自杀，那叫我们如何对得起朋友和长官。”

是啊，在座的谁不是跟随罗长官浴血沙场的弟兄。

一时间大家拿不定主意，陷入沉默、难堪状况。正在这时，部队的智囊人物，兵团参谋长贾应华跨了进来，他刚从灌县归来。

贾应华与各位将领关系都挺融洽，于是大家要他拿主见。

“承蒙诸位信任，我也就直言了。”贾想了想说道：“大家都知道，几天前国防部电令二十兵团归罗长官统一指挥，胡宗南一直催逼罗长官向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三部进攻。经罗将军一再推延，先头部队至今才开始向温江移动。眼下，解放军离我们尚远，我部北有胡宗南的裴昌会兵团，东有李振兵团、西南是李文兵团，四十万部队把我们围得紧紧的，此事如不慎将会给部队带来灭顶之灾。”

“再说，在罗司令官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贸然起义，部队非乱不可。现在各位最重要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部队到了温江再说。至于罗长官处由我和李副军长劝其起义。”

数日后，十五兵团刚到温江就接到胡宗南电话，要罗广文和二十兵团陈克非司令马上去双流参加军事会议。

会上，胡宗南先来了一通开场白：“诸位，委座把保卫川西之大业交给我们，还望各位为党国事业精诚团结。”

“广文兄，委座命我部迅速打通西川路，控制康藏。我的先头部队已出发了，由你率领十五、二十兵团向东，经璧山、江津往云南边境突围，掩护我主力部队西进。”

事后，罗广文清楚的记得，当时胡宗南一扫往日的蛮横，脸带微笑做出一付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模样问道：“广文兄，你看这行吗？”

就这，值得为他胡宗南卖命吗？罗、陈二人对胡宗南这种牺牲别人保全自己的作法非常气愤。贾应华相机提出十五兵团立即开到郫县同二十兵团靠拢，届时好商量，罗当即同意。

十二月二十三日，胡宗南乘飞机逃往海南岛，其部队西进又被解放军击溃的消息传来，罗广文深感受了愚弄，国民党大小权贵卷细软不辞而逃，留下他当替死鬼。罗广文愤慨不已当即与陈克非聚商对策，在贾应华的劝说下，罗广文与陈克非认识到：只有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

罗广文马上命贾应华与彭县刘文辉、邓锡候通电话联系起义事项，一面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

会议大厅里，罗广文首先拿出胡宗南的手令让情报处长林茂宣读，林茂还未读完军官们已经哗然。有的怒骂胡宗南，有的表示不再干了，有的向罗进言，走刘（文辉）、邓（锡候）路线。

罗广文挥手让大家平静下来，然后对林茂说：“你把最近搜集到的情报给弟兄们讲讲。”

重庆撤退后,罗广文就多次和林茂单独聊过,他发觉林茂头脑冷静,对时局的战败早已洞察,林也和司令部的一批谋士极力怂恿他去凉山插黄旗,保存实力。所以,罗广文早已私下交待林茂掌握的别动总队,届时务必迅速准确地提供国、共两军的情报。

林茂再次站了起来,这时,满座的赳赳武夫似乎才发觉他们历来害怕的“御史”竟是这么个弱小的躯壳。林茂和往常一样,旁若无人地讲道:

“战线东面,陈锡联的三兵团已沿成渝公路西进到简阳石桥镇一带;西北方向,贺龙的十八兵团及一野一部正沿川陕公路逼近成都;在川西一带的胡宗南主力兵团已被全部击溃,余部朝西康方向败退。根据贺、陈二部的进军速度,不出三天我们的退路即会被完全封死,而我们的正面是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部和解放军三十六师及地下党的岷江游击纵队。照上面指令,我部向云、贵边境突围,遇到解放军主力必遭歼灭,幸未遇上解放军主力而突围然后方无支援恐亦难维持,总之,这么远的突围就是不打仗也非拉垮不可。”

军官们再次哗然不安,罗广文由着部下议论纷纷,好长时间后,他看着时间差不多了,便站到会议厅中央,大声说道:“林处长已把我们的处境给诸位交了底,大家意下如何?”

“我们听罗司令的!起义!”

贾应华和李维勋副军长带了头,军官们也纷纷表态,一切听司令官的。

当晚,罗广文将军回到兵团部,向林茂探询兵团副司令官兼一一〇军军长向敏思对起义的态度,向答林曰:跟罗司令官走。于是,罗广文立即下令各部队火速集中郫县城关。随后带着贾应华、张荣宪赶往灌县与郫县的交界处安德铺,与刘、邓的代表直接见面,并由邓

锡候的秘书长杨永浚当场执笔和贾应华一道草拟起义通电。

六

罗广文将军的起义通电于当晚十二时被国民党成都城防司令盛文收到,盛文见大势已去,紧急下令所率部队连夜撤退。十二月二十四日,成都市民一觉醒来全城已无一兵一卒,大众莫不拍手称快。

也就在这天早上,距成都市中心三十公里的郫县大操场上,罗广文将军向所属将士正式宣读了起义通电。其后,罗广文将军缓缓摘下军帽,低头凝视帽徽上那犬牙交错的青天白日图,良久良久,忽地涌出两行热泪,一时间思绪万千:

自1929年由日本归来后,从军征战,百战沙场,负过伤立过功;从江西“剿共”、“八·一三”抗战至不久前的“南川兵败”……

回首往事罗将军百感交集,好久才抬起头来,巡视一周,旋即将帽徽狠狠扯下掷于地上,左手高举军帽,向全体将士大声宣布:

一律摘下帽徽!从此跟随共产党。

公元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潇潇春雨中,罗广文将军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率部离开巴山蜀水,进行六千里长途行军。在泰山南天门,茸茸雨丝里,将军凝望着祖国的山山水水,忏悔之情油然而生:祖国啊,过去我用炮火毁去了你的容装;今后,我将用有生之年为你编织一件绿色的新衣。

一九五三年,党中央根据罗广文将军的坚决请求,任命他为山东省林业厅长。在这块曾被他的炮火数次“耕犁”过的土地上,将军焕发了青春,脚踏泰山,足涉黄河,为绿化祖国的山山水水而不停地奔忙着……。

(接82页)称,其实何尊之有?当时为臣下者,劝请举行,以致后人议论,往往有之。”他又说:“见今西陲用兵,外则官兵披坚执锐,冒暑冲寒,劳苦已久;内则民人负重跋涉,挽运远道,力亦疲困;兼之被灾之处,民多受累。朕每念及此,惟当修省图治,加惠黎元,有何(值得)庆贺?”最后,他更集中揭露了剖析了所有热衷于奉上尊号者们的种种心态。他认为,其中虽不乏真心实意的拥护者和赞许者;但更多的却是别有用心的人。后者又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微贱无耻之徒”。他们认为“举行庆典,必有殊恩,

(而)邀望非分”,即乘机大捞一把;第二类是“奸诈辈”。他们则妄图借此“得邀殊恩”,以便恃宠仗势,恣行威福,胡作非为,致使“军前功罪,轻重颠倒,钱谷混乱不明”;最后一类便是坏人。他们有的知道“六十庆典,必有殊恩”,随后更有大赦、特赦之旨,所以借机“故杀故犯”。但最坏的莫过那些“幸灾乐祸”者。他们则企图利用皇上寿诞恰当“暮春清明时,正风霾黄沙之候。或遇有地震日晦”,好借机“煽惑人心,恣行讥议,私相记载”,以貽讥后世,则后果更不堪设想。因此,他毅然决定:“凡诏赦恩赉等

项,概行停止。”康熙这番精辟的剖析,真可谓鞭辟入里,是相当敏锐而深刻的;随后做出的“概行停止”的决定,更有力地堵塞了这些别有用心者们以求一逞的通路。

总之,康熙的拒尊批尊是一贯的。如果从年龄上看,他的首尾两次拒尊批尊,是始自不满“而立”,直至年届古稀,四十余年间,不仅“慎终如始”,而且老益弥坚。除自身终生未受尊号,保持了晚年的高风亮节,又影响所及,终清之世,均无此无益之举,做出了良好而可敬的典范。

原始村 遐想

大地湾纪事

●王守义

一座现代村镇从地图上被抹去了。复原的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原始村。于是，今日与明日的世界，多了一个回首昨日的窗口。

去年夏天，我去闻名遐迩的大地湾参观，是先到的天水市，下了火车顺便去市北看了“一画开天”的伏羲庙，而后转赴秦安。——这原是预定了的游程。

秦安乃历史上成纪古地。“成纪”来源于伏羲的传说。据说伏羲孕十二载而生，古人谓十二年为一“纪”，故把伏羲的出生地称为“成纪”。《帝王世纪》载“伏羲生于成纪”。因而秦安素有“羲皇故里”之称。这里地处陇西黄土高原东部，在古代是引人自豪的地方，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勘为渭河流域文化的摇篮。其文物古迹自然不少。但我到秦安县城时天下着雨，城里正翻修道路，满街泥泞很难下足，因之一些值得一看的文物景观都未曾去看。幸亏县文化局的同志给我找来一部“秦安县志”，才免去局促到宾馆里的那一份雨蒙蒙黄昏和夜晚的沉闷枯燥。翌日晨便冒着霏雨上路。

大地湾在县城北面，从地图看稍微偏东。距县城四十多公里。车子一出县城便在颠连的山地里向北行驶。仲夏的雨胜似秋霖的绵绵，车窗玻璃上的雨刷不停地挥动，从烟雨蒙蒙里抹开一片明晰来让我做蜃景似的窥看。黑云、白雾、雨丝将山地遮掩得混沌，目力捕捉的一点两点的树木、田畴、村舍，及忽隐忽现的穿蓑衣的农夫，仿佛从深不可测的神秘境界倏忽而来又倏忽而去。时近午天，车子来到一道开阔河川，公路贴近河边。司机告诉我，这条河叫五营河，是条从东向西流的倒淌河，它在莲花城之西入葫芦河而南注渭水。初来大地湾

观光的游客，往往被这倒流水搞糊涂，倘若头顶有煌煌的白日照着，你站在河岸会以为那日头是从西边出来向东边逆转。今日虽是阴雨天气，然而这西流的水，这烟雨的混蒙，加上这片黄土地关于伏羲的种种传说，我的思绪沉浸在朦胧渺远的幻想里，觉得我是被时间的小舟载着，顺着历史长河直往那涓涓源头去。

一、一座现代村镇被抹去了，大地湾到了。

这是在北纬 35 度，东经 105 度 54 分的地理坐标上。然而当你站在这里，所见的山川景物仍就是一副黄土高原的典型面孔，黄土的梁峁，黄土河川，山坡与河川被耕地复盖，垄亩里是清一色麦地，已经灌了浆的芒穗吸了雨水沉甸甸给风雨掀动的绿浪，一层层推向远去。这是一个弓样的大山湾，像一个分开腿蹲坐的巨人静静地浓重的雨雾里，他俯身张开双臂，把开阔的田野连同一个偌大的村镇拥抱怀中。倒淌河贴着村镇北边山脚流过。这山湾就叫大地湾。山名长春梁。村镇名邵店。是秦安县五营乡政府所在地。就是这片貌不惊人的黄土地，掩埋着一个新石器时期最远的先民的村落遗存。国家自 1978 年秋季开始大规模的勘测发掘，至 1984 年七年时间共发掘 1.3 万平方米，出土原始人的房屋遗址 230 多座，原始人墓葬 76 个，灰坑 328 个，烧彩陶的陶窑 200 多座。包括刀、斧、铲、磨、铤等石器、壶、隔、罐、钵等彩陶器及骨器一万余件。还有六段供防卫用的壕沟和排水引水道。遗址面积包括已经暴露和尚未暴露的文化层 160 万平方米。根据科学测定，这庞大的原始村落群距今约有 7300——7800 年。这就把人类新石器时代的实物证据比半坡时代提前了一千多年。

考古学家告诉我。人类野蛮时代的最高阶段，黄河流域出现三个大文化圈：辽宁的赤峰红山文化，山东胶东半岛的北辛文化（或叫大汶口文化），甘陕泾渭流域文化。大地湾是泾渭流域文化最杰出的代表。它表示原始文化的进入亚洲腹地。从人类文明的进程讲，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一个中心，中国的大地湾是一个中心。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当中，黄皮肤的大地湾和白皮肤的巴比伦乃为人类的两个最老的同龄祖先。比起埃及和印度来，大地湾是老大哥。现在，当我站在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时，我因为看到中华民族深深的文化根而感到历史的自豪且倍增民族的自信心。

我怀着急欲洞达远古神秘的心情走进这个被烟雨紧密裹着的村镇。然而首先扑入望眼的不是楼房，不是店铺，不是黄土高原上司空见惯的现代乡镇的建筑物。而是一派十分奇异的尖顶茅屋。我竟怀疑那不是村庄

而是被雨雾虚化了的一个个麦垛。一道铅丝网围墙把这些怪屋围护起来。墙内新植的杨柳在轻风细雨中摇曳。茅草屋有大有小,呈圆锥体的屋顶尖尖地伸向天空。屋顶是稻麦秸杆所苦,一层一层整整齐齐叠压上去。用兽皮条或草索编扎牢固。圆而深的草檐覆盖着低矮的木骨泥墙。

陪我来的同志告诉我,这是一个被复原了的原始村。原始村遗存的发现,使邵店这个现代的村镇从地球上抹去了。因为它正好是遗址的中心。于是乡中心小学拆迁走了,商店和供销社拆走了,邮局、银行、医院、收购站及民宅村舍通通迁走了。拆去了邵店镇的热闹繁华,恢复了一个全国最大的原始村“博物馆”。今日与明日的世界多了一个回看昨天的窗口。

沿着原始村围墙往前走。来到大地湾文物管理所大门。高大的门墙是新修的水泥与现代建筑材料的典雅古朴的造形。两面门墙各有四个长方形橱窗由高而低排列。窗内陈列的不同文物标志代表大地湾有四期文化:一期前仰韶文化,二期仰韶文化的半坡期,三期仰韶文化中期,四期仰韶文化晚期。人类史前时期的社会形态在这里明确而完整地保存下来。在门房传达室与管理人员联系参观的事。他们婉谢因雨原始村不能进入参观。让我们先去乡政府招待所住下。

我们再往镇里走,街道两边只有几间私人小店铺孤零立着,铺堂里摆一些大地湾出土彩陶的复制品做游人的生意。从长虫梁西边逶迤而下的一条深沟将邵店切割成不均衡的东西两半。这沟叫闫家沟。一道公路桥虽然把断裂沟两边的村镇连接一起,然而这沟正巧是原始村落文化层的界沟。座落在沟西边的乡政府因而得以幸免。我过了桥来到乡政府大院门前,见它显得孤零零,原来这边已是村镇的尽头,只有十数户农民的庄窠院与之相伴。

二、原始村即景

第二天雨停了,管理人员才许我们入内。原始村里的泥土小路上有许多彩陶碎片,被雨水冲淋得色泽鲜艳。文物所负责人王瑞珍同志陪我们参观。他告诉我,复原的原始村里,有原始房屋真迹的修复,也有仿建。屋内塑造了原始人,陈设了生活用品。那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塑造。原始屋都编了号,如门牌钉在门上,门牌号数下还有一行神秘数字,这是碳 14 测定的年代。管理员领我来到 F307(F 代表房屋)屋前。碳 14 测定年代 7300—7800。说明我举步之间走进的这一原始人家是距今 7800 年的房屋遗存,这一步我迈的多么遥远遥远啊!这是中华大地迄今发现的最远的原始人住

宅,是刚从旧石器时期脱胎出来的原始人类的建筑。站在它面前,我有如观仰圣物一样的心情。这是个半穴半顶式屋,昔日的草屋顶和泥墙自然不会在了,留下来的是一圆形地穴,约二市尺深,以及穴四周九个圆柱孔。柱孔向内倾斜。这样栽入的屋柱便自然地在顶端收拢。地穴无火灶。说明距今七、八千年的母系氏族社会原始人过集体生活,只设集体灶。火种为集体保管。居家个体不得保留火种。因为猎物十分有限,只能由公众共有吃大锅饭。私藏生肉和火种会被判有罪。墙角位置突出一点土台,上置两只圆底陶钵,约碗大,但比碗深。陶色里灰外红,带着烟火的痕迹,外表粗糙。那是因为刚从旧石器时代过来的原始人还不会使用轮盘制坯,只用手捏,烧窑的火候也不好。我默默看着这距今八千年也许是人类有生以来最早的彩陶制作,想象这间屋的主人每日端着这粗陶钵到集体大灶上去领取烤肉,去舀倒淌河里的水。人的生命如流萤一闪很快熄灭了,这两只钵却遗存下来盛着原始共产主义的悲惨文明昭示后人。

我来到另一幢屋,编号 F408,碳 14 测定的年代比 F307 晚了两千年。王所长告诉我,这座屋是在与 F307 同期房屋的废墟上叠压修建。其与 F307 的区别是在与门道紧挨的地方有一火坑,屋柱由暗柱改明柱,房面积大了。火坑内埋着一个存放火种的陶火罐。说明家庭的雏形开始,个人可以拥有火种来自主地烤野味做黍粥吃了。整整两千年漫长岁月,人类才从吃大锅饭当中解放出来,才摆脱了原始共产主义的桎梏开始了物质的私有。这是多么缓慢的进步。

我来到另一个完整的锥形草屋前。管理员告诉我,这是第二期原始人屋复制品。屋面修建很整齐美观。草从锥顶倒披下来,密密实实复盖在木骨泥矮墙上。门是一个高度略长于宽度的方门。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内靠里打一草铺,为原始人的卧铺。四个明柱上挂着彩陶葫芦瓶、弓箭,箭头是兽骨和石头打磨的,屋周地穴的边沿挖削出一些平台来,放置着彩陶的盆罐和瓶。石刀、石斧则放于另外一个墙台上。

两个原始人,一对夫妻。男人跪在火塘边吹火,妻提着尖底瓶眼看门口,仿佛正要出门打水。她身穿麻织背心,腰系麻织片。丈夫则光着上身仅腰间系麻片。两人都戴陶耳环,骨针簪发。这是两个石膏塑形,肢体皮肤用肉色涂染如真人一般。

另有一座仿制的茅屋给游客展现了这样的情景——这是距今六千年的时代了,大概是一个清风习习的美好夜晚,一个青年男子来到他心爱女子的门前,将

一串新制的兽骨项练放到草屋门口,然后退后一点,用手在地上拍打出响声。这是求偶的信号。那茅屋里暗淡的火塘的光亮照出女子欲向门口窥探和听那拍打声的表情。倘若她喜欢这个男子,便出来收了那礼物,于是男子便进屋与她做一会儿夫妻。倘若她不收礼物,他知道求爱被拒绝,只得离开。文物所同志告诉我,这便是当时大地湾原始人风行的“阿注婚”。

村里,还有复原的陶窑,光身裸背的陶匠于黑暗草屋内坐在按装有轮盘的坑内制坯,有女人搬着制好的陶瓶的泥坯在外面晾晒;还有断木、打制投掷器者;还有规格不一的原始人墓葬……我不可能把这里的“原始人家”一一访遍。因为原始村里这曲折有致的嵌满彩陶碎片的小路贯穿着中华民族延续了四千年的原始文化。这里的每一掬黄土都是一部不可卒读的文化人类学典册。我只能有所选择。

三、巨大的原始人“大会堂”

下午,文物所的小宋陪我去参观原始村最大的建筑——原始人的“大会堂”。

“大会堂”在原始村南面山坡台地上。远看如一座钢筋水泥的巨幢。金属屋顶与大玻璃窗的反光耀人眼目。那是大会堂遗址的大护棚。小宋告诉我,大地湾发现这样的大房遗址三座。这座是已清理出来供人参观的。主室室内面积达一百三十多平米,加附设面积共四百多平米。考古专家惊叹它的巨大,称之为原始人的“人民大会堂”。在上山坡沿途,或因农民取土、修路,挖掘过的崖、埂、坎的土茬,处处显露原始人留下的灰层、彩陶片、房屋的柱孔、烧窑。一层叠压一层。我十分惊奇,这山怎么竟有如此稠密的遗址显露呢?由此可以想见在那遥遥远古,这儿村落一定很大,人口也稠密。我将此想法就教于小宋。他点头称是,说山下遗址有四层、五层的叠压关系,说明旧屋倒塌后,在上面又起新屋。远古时期的大地湾,山下河湾,宜于捕鱼,长春梁和东南的丘陵形成一道弧形屏障,不仅避风,气候温和,还宜于防守。梁上森林茂密,山下绿草如茵,河水清澈,于畜牧、狩猎、采集、农耕都极相宜。大地湾构成了古代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那么这儿究竟聚居着多少原始人?是一千?一万?还是更多?

保护棚所在的台地宽阔而平坦,那新建筑物如一座大型电影院,前面一片广场,周围是麦地。一些花坛和雕塑正在修建。保护大厦正面是一扇扇两米多高的大玻璃门窗,门墙塑有象征性浮雕,拱形大跨度钢架屋顶,给人宏伟庄严的感觉。

小宋开了门。我们穿过门厅。小宋又开第二道门。

我们绕屏壁出侧门而入,来到一道长方形环廊上。原始大会堂遗址赫然呈现眼前。

这是一座长方形建筑的遗存。房顶、墙壁、廊柱坍塌下的堆积层一半还原封不动保留,一半已清除露出干净的屋地。墙壁倒塌时墙基部还留有一圈断墙,大约一尺多高。屋中竖着两个顶梁大柱的二尺高断柱。沿四面墙基留下的辅墙大柱的柱孔,前八后八共16个柱孔,结构出八柱九间的主室。门窗都向南开。会堂开正门三个,进门是一宽大门庭,门庭很艺术,两边有两个带有装饰意味的大立柱。柱脚坑内垫青石制做的圆柱顶石。大门外面,有六块大柱顶石成一排等间隔摆放,这是宽大门廊的廊檐柱顶石。进入大门,过门庭入主室处有一大火塘,直径两米多。这样大的火塘,且修于主室、门庭之间,所起的作用之一是取暖,入门庭的冷风会把热气散布全室,且保持空气新鲜。作用之二是当原始人会聚时,熊熊大火封堵大门,猛兽不敢攻入侵害。屋内屋外残存的大柱的直径都在五十余公分,堪称是巨柱了。柱的结构:中心为木料,外包泥皮,再用料浆石粉饰,打磨得很光滑。一是防火,二是审美作用。还应该提提原始大会堂的墙。墙体厚四十公分,比现代人修二十层大楼的钢筋水泥墙还厚。现存的墙体外表也都用料浆石粉刷打磨,十分光滑细腻。剥开外层,里面层有直条形纹。原来原始人砌墙是这样:先用树枝编织的笆片夹堵两边(相当于今人的壳子板),往里灌泥,待干,将笆片挪宽,再灌泥,如此反复便成厚墙。它的坚固远非今日大地湾农民的土坯墙可比。

还应该提一提原始大会堂的屋地。

我得到小宋允许,走到大会堂遗址蒙上轻尘的地面,用手抹开尘土,现出青灰色镜面似的屋地,得了四周天窗射入的光亮,清晰地映出我的身影。我很惊讶原始人怎么会制出这样坚硬光滑的地板呢?小宋说,这是原始人采来当地料浆石,用火烧后磨细、拌水做地板,待凝固后用小石板反复打磨光滑。它的硬度相当于现在一百号水泥。考古专家叫它为原始水泥。揭开原始人大会堂铺地材料之谜,是考古和建筑学家花了很大力气才研究证实的。

四、“凤”的联想

从“大会堂”保护棚出来,站在被青青麦地围起的“大会堂”广场上,久久回顾这宏伟的原始建筑遗存,脑海里矗起这座巨厦的完整形象:六根刷成土红色的光滑大柱撑起高大门廊,四坡顶、四檐双重大屋顶映衬着蔚蓝天空,三道大门开启,前庭屏壁上画的黑红二色变体的鱼鸟与几何图案格外醒目……(下转第87页)

拒绝尊号的康熙皇帝

彭云鹤

康熙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帝王，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英主之一。他在位 61 年间（1662—1722），守成兼创业，顺应当时国情民心，励精图治，勇于进取，兢兢业业，对清王朝的巩固发展和祖国历史的进步，都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在政治上，他平定“三藩”叛乱，巩固了西南边陲；降伏郑克塽和刘国轩，统一祖国宝岛台湾，稳定了东南海疆；三败噶尔丹，保全喀尔喀，增强了对漠北地区的管辖；挺进西藏，驱逐准噶尔部上层分裂势力，使该地区重归统一；进军乌鲁木齐，为后来戡定新疆打下了基础。同时，他又胜利地开展了著名的“雅克萨”自卫反击战，赶走了沙俄侵略者，签订了较平等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北边界，明确了祖国北部和东北疆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最终奠定了祖国辽阔的版图。在经济上，他彻底废止了清朝入关以来招致广大人民强烈反对的“圈地令”，推行“更名田”，颁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旨，开创“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改革，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兴修水利，全力治河，发展漕运事

业，促进了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缓慢增长，开启了一个多世纪著名的“康熙盛世”，终于奠定起有清二百余年的宏伟基业。所有这些，都雄辩地证明，康熙帝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英主之一。同当时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法国的路易十四，堪称并驾齐驱。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除因其顺应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同他不务虚名、惟求实效，谦逊而明智的处世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他敢于冲破旧的传统陋习，屡次坚决拒绝并严厉批驳群臣为自己奉上尊号的作法，便是最突出、最有力的一大佐证。

在封建社会里，为突出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地位，特意确立起许多推其专用的名号。它们包括最高统治者生前所用的尊号、年号、宫殿号和其死后所用的庙号、谥号和陵寝号，等等。

“年号”，是封建帝王为纪其在位之年而创立的年号。始于西汉武帝刘彻，为后世历代封建皇帝所仿效。

“庙号”，则是帝王死后在未入陵墓之前，于太庙（即天子祖庙）立室奉祀时所起的名号，又称“宗庙号”。如，“清世祖”即顺治帝的庙号。

“谥号”，乃是帝王死后，按其生平事迹评定褒贬而给予的称号。

“陵寝号”，就是封建帝王死后所入葬的陵墓名称。

以上这些，都是为突出帝王特殊地位而定的名号。但在此诸多名号中，最能显示其威严的还是尊号。

“尊号”，即封建帝王生前在位期间所得到的最尊崇最高贵的名号。最早是“皇帝”二字。它起源于秦朝，是在秦统一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后，由秦王嬴政创始的。全国大一统的实现，他已不再满足于原有的“秦王”称号，正式要求群臣为自己议定尊号，并最后审定为“皇帝”。显然，他是自以为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将二者名号合而为一，定尊号为“皇帝”，当作了自己的尊号。皇帝何义？《太平御览》解释说：“皇（者），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也，美大之称也。”“帝者，德象天地，……父天母

地,为天下主。”可见,“皇帝”这一尊号实际上就是自然界至大至美的“天”在人世间的总代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子”。因而它被后世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所沿用。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唐朝皇帝的威望和影响不断扩大。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被西北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共尊为“天可汗”(“可汗”原为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君主的称号)。唐高宗李治则在其父被尊为“天可汗”的基础上,于咸亨五年(674)秋八月壬辰日(十五),让群臣为自己议上“天皇”的尊号。其皇后武氏(即武则天)亦同时被尊为“天后”。从而开启了公开给在位皇帝频上尊号的先河,成为历代封建帝王大多沿用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如果说公开奉上尊号制度的创始,尚有让群臣根据皇帝执政时间长短和治绩大小进行某种程度评议的积极的积极意义的话;发展到后来,则百害而无一利,带来的消极后果和不良影响非常严重。首先,它空前地助长了朝臣中阿谀逢迎、歌功颂德的歪风。或迫于“君叫臣死臣不死,谓之不忠”的专制淫威,或出于邀功取宠、固位图升的阴暗心理,在敬上尊号时无不极尽其逢迎拍马之能事,以迎合绝大多数封建君主的虚骄心态。唐朝连武则天在内共有二十二帝,真正称得上明君圣主的惟有太宗一人。武则天、唐玄宗虽亦不错,但已相去甚远,其余都是平庸之辈。然而在上尊号时,却也都被奉以“大圣光天文武”、“圣神文武”等等的美词艳称。甚至连被黄巢起义军推翻的那个“以谏佞为爱己,谓忠谏为妖言”的唐懿宗,竟亦被敬上了“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真是莫大的讽刺!其次,公开奉上尊号制度的确立,也使谥号失去寓褒贬的原意,而蜕变为专替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工具。它不但字数由原

一、二字,逐渐以四字四字的速度递增,宋以后便由唐代的八字渐增至十几或几十个;且用词也越来越华而不实,已根本不能反映其生前的功过特点。如北宋亡国之君徽宗赵佶,死于五国城(在今黑龙江依兰县境内)金兵俘虏营中,南宋高宗赵构君臣,竟也为其遥上了“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神仁德宪慈显孝皇帝”十八字的美谥!真可谓“谥者,饰终之称也。”完全成为给死者最后奉戴的一顶美丽的高帽子。

对于奉上“尊号”这一无益举动,康熙同其他所有有作为的君主一样,始终持以厌恶和否定的态度,不断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康熙在位期间,功绩巨大,所以自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叛乱起,至六十年(1721),即其逝世的前一年止,四十余年里,按照传统习俗,每当国家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或逢皇上五十诞辰,花甲圣寿,及其执政四十、五十或六十年整庆之际,诸王、贝勒、满汉文武大臣、蒙古王公以及达赖喇嘛等,便都争相奏请为其奉上尊号,据不完全统计,竟有十余次之多,其中规模较大者就有四、五次。但都毫不例外地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和猛烈抨击。不单他本人坚持了终生未受尊号,而且影响所及,其后继者也均无此举。这里主要就其中首尾两次奉上尊号活动略做叙述和分析。

康熙二十年(1681)十二月,历时八载、震撼南半个中国的“三藩”叛乱,终被平息。捷报传来,举朝欢腾。当月初九(1682年1月17日),湖广道御史何嘉祐首倡,群臣响应,以“天下荡平,皆赖皇上一人之功德所致”为由,“请上两宫徽号,以广圣孝;上皇上尊号,以彰功德”。这是为其敬上尊号的开端。

对此,时年二十八岁的康熙帝明确表示,只同意给祖母孝庄太皇

太后和母亲孝惠皇太后两宫奉上徽号,而坚决拒绝并强烈反对为自己上尊号;尤其对所谓“天下荡平,皆赖皇上一人之功德所致”的提法,更是深感“彷徨靡宁”。尽管康熙皇帝平叛的功绩显赫,早在他亲政伊始,便将“三藩”同河务、漕运并列为国家重要的“三大事”,书写下来并悬在宫中柱上,誓志解决;又不失时机地力排众议,决计撤藩,并胜利地领导和指挥了这场正义的平叛战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是,他却保持了十分诚挚冷静的谦逊态度。他认为“今乱贼虽已削平,而疮痍尚未全复,君臣之间宜益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宣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号,滥邀恩赏,实可耻也。”群臣再次力争,康熙帝便亮明了对尊号的看法。他说:“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他又以古代帝王为戒鉴,说:“朕自幼读书,览古人君行事,始终一辙者甚少,尝以为戒,惟恐畿务或旷,鲜克有终。以故宵衣旰食,祁寒暑暍,不敢少闲。”目的是“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最后,他坚决表示:“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乃朕实意,非粉饰之词也。”

这首次奉上尊号的余波,一直持续到次年二月。当时一些“外藩”(即蒙古族等上层)的“诸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即太子)”等,又联合奉上尊号给康熙。他则仍以同样理由降旨回绝。旨称:“请上尊号,已经有旨。这外藩王等所请,亦不必行。”一个年仅二十余岁的年轻皇帝,竟有如此深邃的洞察能力和明晰正确的见解,实属难能可贵。

此后,随着国家各方面胜利的不断扩大,为其奉上尊号的赞颂风潮日益迅猛,而康熙的批驳和抨击,也就愈来愈严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群臣又以郑克塽、刘国轩等率众归服,台湾统一,请加上尊号。康熙帝以“此时虽颁赦加恩,小民未必均沾实惠”为由,严加拒绝,并指责说,“治天下之道,但求平易宜民而已,何用矜张粉饰!”

三十六年(1697)五月,平定准噶尔,武功告成。五、六月间,礼部与和硕显亲王丹臻等,先后奏称:“皇上圣德神功,超越千古”“永清四海,手致太平”,再次吁请加上“神圣文武大德广运皇帝”尊号。这时的康熙已经磨炼得相当成熟,他不仅驳斥说:“方今外寇既靖,正宜休息生养,徒加尊号,何益于治?”而且,在总结此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时,除仍归功于“众将之勤劳”,并推辞自己“何(功之)有?”外,更自责说:“当初议定灭贼方略时,自己虽不畏孤立,毅然做出了‘断当急图’的决策,并最终取得胜利,但在乌兰布通决战中,自‘大臣而下至军士,阵亡被创者甚众’,至今‘其不致蒙咎者即幸矣’,还要上的什么尊号?”他这种勇于负责,敢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某种程度上已超越了一般帝王《罪己诏》的范畴。在其影响下,孝惠皇太后也再次坚决拒绝接受为她上的徽号。她说:“皇帝既不受尊号,这加徽号不必行!”这也有力地支持了康熙屡拒尊号的坚定性。

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二月,群臣以次年三月十八日是其五十整寿为由,再次请上尊号。康熙则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尊号和祥瑞的见解。他说:“朕即位四十余年,未尝一刻不以民生休戚为念,远迩安宁为本。虽或庆云景星,嘉禾瑞草,天书麟凤之奇,总无关于黔黎(百姓),亦无系于朕怀。侈言祥瑞,贻讥史册。朕以实心为民,天视天听,后人自有公论。若夸耀功德,取一时之虚名,大非朕意,不必数陈!”结果是诸王大臣“再三奏请,终不允。”次年正月,康熙第四次南

巡出发前夕,群臣又认为五十寿诞正值南巡期间,不便举行庆典,要预为庆贺,并进献了大批鞍马、缎疋等物。康熙以影响不好而严加制止。他说:“朕之诞辰,尔等如此进献,在外督、抚亦必效之。朕必不受。”最后只是抄录下“庆祝万寿无疆”的屏文,聊领众人心意外,余皆拒收。至其生辰之日,他又正式下诏,阐明其屡拒尊号的理由。四十三年(1704)十一月,他更借撰修《明史》之机,在其《御制文》中检讨了自己即位以来的治政得失。甚至说:“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尝一时不自责也。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他这种永不满足于已有成就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何等之可贵啊!正是这种精神,有力地支撑着他,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赞颂风潮中,能始终保持着清醒冷静的头脑,丝毫不为所动,傲然挺立在狂浪之巅,稳操航舵,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五十二年(1713)三月十八日,康熙帝走过了他人生旅途中第六十个壮丽春秋。当此花甲整寿之际,举朝轰动。从头年十月起,直至该年三月初,满朝文武便将为其祝寿当作了头等大事开展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万方普庆,千载一时”的良机,再再表请要为康熙加上“圣神文武大德广运”的尊号。对此,康熙持其一贯态度,斥责为:“请旨之奏,悉属虚文,无有实际。”继而表示,他只求“臣清子孝,兄友弟爱,人人皆读正书,勉尽职业,国安民治,盗贼宁息,各以至诚实意”为其祝寿即可,“此外仪文”均“不准行。”从此,他对人们按照传统观念,日益将其圣化神化的趋势,更加警觉。始终清醒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人。在五十四年(1715),当有人奏称他这“皇上

(实)由天授,非人力所及”时,他严厉指责这种“称誉”,实际是掩盖了自己的“虚心勤学处”。他说:“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慎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慎中得来,何得谓天授,非人力也?”因此,他对某些言过其实的不恰当的颂扬,大都能做到一定程度的抵制和反对。在阁臣所拟的谕旨中,凡有“海宇升平”等词语,也多被他坚决删去,并批评说:“今海内虽定,民生未尽悦安。……若遽谓升平,则泰然自足,无勤求上进之心,非朕意也。嗣后谕旨,此等夸张盈满语,勿复拟入。”正是他这种对神权先验论的深刻认识和对这一切虚假浮夸现象本质的尖锐洞察,构成了他屡次拒绝和批驳奉上尊号行为的坚实思想基础。

旧的传统势力是非常顽固的。尽管康熙反复诚恳推辞,并陈明奉上尊号的诸多危害;但是,到他登基六十周年(1721)之际,满朝文武大臣再次发动了迅猛的奉上尊号的大规模攻势。他们历数其“敬天尊祖”,“至德大孝”,敦本仁、展亲礼,莅政勤、持躬俭,厚民生、安民命,知人明、用人当,敷文德、同文化,养兵厚、练兵精,治河有功,用兵得法,好古敏求、开物成务等十一项“古未有也”的丰功伟绩,交口称颂他“以七十岁(此处指虚岁)寿考之圣人,为六十年太平之天子”。因此,“博采众论”,为其奉上“圣神文武钦明浚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二十字的尊号。从而将唐宋以来公开奉上尊号的活动,推向新的高峰。但也正是在这时,康熙仍一如既往,以坚定不移的态度,拒绝得更干脆,剖析得更深刻,批驳得更严厉。他首先表示“朕心深为不悻”,接着,谈古论今揭露上尊号活动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说:“从来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此乃相沿陋习,特以欺逛不学之人主。以为尊(转76页)

根之深

——李政道与中国

李政道和他的老师吴大猷在天坛

顾迈南/文
杨武敏/摄

对于中国科技界的人们来说,1979年的春天是难忘的。一年前,在北京召开了盛大的全国科学大会,这就是说,10年动乱成为历史,中国人要全心全意搞建设了。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数百位从全国33个科研单位和78个高等研究院赶来的研究生、教师和科技人员齐聚北京科学会堂,兴奋地等待着聆听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讲学。那天,李政道教授笑吟吟地走上了讲台。他身穿灰色中山装,微笑着向在座的人们点头问好,把讲义放在投影仪下,就讲起课来。他用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今天,讲粒子物理。大家请看这张表,在这里看都是数目字、符号,这都是前辈和近代科学家经过长期的探索得来的……这中间有一大部分已成为历史上的东西,科学是发展的,最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和未来。进入70年代以来,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不停地讲,不停地写。有时他讲得满头是汗,把外衣脱了再继续讲。在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里,从强作用、弱作用的发展史,讲到粒子物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课堂内外,一片寂静,人们随着讲课人的娓娓话语,进入了奥妙无穷的粒子世界。

这一年,李政道在北京科学会堂的报告厅里连续7个星期的讲学,天天座无虚席,这次回国他共讲授了“统计力学”和“粒子物理”两门课程;在国外,他每年只讲28—30个小时,这两门课一般要讲两、三年。

“过去,政道对这类事(指联系培训人才)从来不感兴趣。去年为了给中国培养高能人才,他花了4个月的时间,亲自打了五六十个电话,联系54名实验人员的培养问题。别人都说政道变了,就连讲课,政道也变了。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集中讲过。”他的夫人秦惠芬深情地说。

过后,当有人问李政道教授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时,他沉吟片刻,说:“这次回来深深感到,大家都想使中国尽早实现现代化,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家都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动起来了,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不应该袖手旁观。”

李政道教授讲的这些充满深情的话语,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他的根深深地和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相连。

坐茶馆读书的少年

1946年一个秋风飒飒的日子,烟波浩渺的黄浦江上,行艇飞帆,时隐时现。远洋轮船《美格将军号》长鸣着汽笛,乘风破浪驶离了上海滩。送行的人们在码头上挥舞着手臂,呼喊“再会——再会!”祝福远行的人们一路平安。在甲板上的人群中,有一位举止文静、面庞俊秀的少年,那少年穿着一身半旧不新的西装,他双手扶着轮船的栏杆,用深情的目光凝视着烟云氤氲的上

海滩,直到消失在波涛汹涌的地平线上,才依依不舍地回到船舱里。

李政道就这样告别了他出生的故乡,告别了亲人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老师、同学华罗庚、曾昭抡、唐敖庆、朱光亚等人,乘远洋轮船漂洋过海到大洋彼岸的北美洲去了。这时,他虽然还不到20岁,但他在物理学方面已有相当根基。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出生在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里。他原籍江苏省苏州市,曾祖和祖父都和东吴大学关系颇深,父亲李骏康入金陵大学学农业化学,后来在上海做化肥生意。

苏州和上海相距咫尺,李政道少年时代跟随父辈在上海读书,当时的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统治者抵御不了列强的入侵,只好割地赔款,以致上海这座城市成了典型的半殖民地、冒险家的乐园。城里到处是外国租界。走在外滩公园、兆丰公园,“华人和狗不许入内”的标牌不时地赫然入目。

“这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中国人要被外国人统治、被他们歧视呢?”少年李政道愤然地心想。

有一天,李政道在上海的英租界乘电车,下车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位40来岁的外国人,下车后,不料那个外国人竟然找来一个“红头阿三”——印度巡警,那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李政道的双手反背起来,让那外国人凶狠地打了他,那时候他才13岁。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李政道因不愿受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于12月22日离家,由上海取道杭州、富阳,穿过封锁线,去大后方求学。本来他是想去重庆的,由于路途遥远,又缺乏路费,只得改奔贵阳。从1941年到1943年他过的是流浪生活。经常山、建阳、南平、永安、瑞金至赣州,一路上跋山涉水,大部分路程是步行的。1943年才由赣州搭车至贵阳。

现今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想象,一个15岁的孩子,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举目无亲,几乎是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只身一人,千里迢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经历种种的艰辛。求知心切的李政道正是在这种极为困难的境况中生活和长大的。

两年间,他到处流浪,又身染恶性疟疾,每两个星期就发一次高烧,浑身发抖,退烧之后,周身无力,步履艰难。真是祸不单行,就在这时他还生了一身疥疮。在流浪的日子里,当然也就无从求学。幸而,他随身带了一本达夫著的大学物理(中译本)。而他对物理的兴趣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1943年秋季,李政道在贵阳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上了浙江大学。在这之后,经湄潭去永兴。那时,中学没有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参加大学考试,但是成绩必须特优,称同等学历。李政道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没有毕业。

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校本部在遵义,理学院在湄潭,一年级学生全部在永兴。湄潭是一座非常偏僻荒凉的山城,而永兴更小,只是一个“场子”,两地相隔,从永兴到湄潭要走半天的路程。浙江大学迁来后,山城、小场都活跃起来。李政道小时候就有专心念书的习惯,在浙大时更是全神贯注地钻研物理、数学。艰苦的环境,丝毫也没有挫伤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强烈追求。浙大的物理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对他特别照顾教导。大学二年级刚开学不久,日军侵入贵州,浙大停课。1945年他又转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求学,处境依然窘迫。在学校里,十五六个学生住在一间草房子里,又闷又热,蚊虫肆虐,臭虫到处爬,他和同学们在拥挤不堪的寝室里睡上下铺,隔几天就得把床搬出去消灭臭虫。战争破坏了一切,这里同样没有宽敞、明亮、安静的教室,而他依然在课余自寻幽静,专心攻读。那时西南联大的教学水平极高,物理名教授如叶企孙、吴大猷、赵忠尧、王竹溪等都是非常杰出的,他们都对李政道很重视,让他在1945年至1946年一年之中念完了全部大学二、三、四年级的课程。尤其是吴大猷教授,对李政道的培养更是着力,这与他后来的成就有莫大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昆明,人口急增,电力不够,电灯仅见灯丝红,根本不能用来照明、念书。李政道和其他同学发现茶馆里用的汽灯,晚上可以用来读书照明。当时茶馆的规矩是先来先坐,只要占一个位子不离开,就可以从早到晚不加费,当然茶也变成了白开水。李政道和同学们每天一早就上茶馆,上课时互相轮流看着坐位,下课后夹着书本回茶馆。因此,上茶馆读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因为仪器不好,设备不足,有比别人差的想法。杨振宁、朱光亚、唐敖庆和我等等,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若干年后,李政道成了世界著名的大物理学家,回忆往事,他无限感慨地说。

推翻“神圣”的定律

1946年秋,李政道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念研究生期间,爱神悄然而至,一个偶然的机,他结识了中国籍姑娘秦惠粲,两位年轻人一见倾心,不久,毕业后便结成了终身伴侣。

经过将近10年的辛勤探索,李政道在统计力学、场论和基本粒子物理学等许多方面,都有了很深的造诣,他的才华使得许多美国物理界的前辈,不得不刮目相看。

“T·D李是当代最杰出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美国理论物理权威、爱因斯坦的同事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谈起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时,总是赞叹不已。10年中,李政道不仅在统计力学、场论和粒子物理学等许多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著名论文,还广泛涉猎研

究了固体物理、天体物理学、核物理和湍流理论。1953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聘请为助理教授,三年后升为正教授,成为这个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正教授,当时,他还不到30岁。

1957年1月16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了一份实验报告,《纽约时报》全文刊登了这个实验报告,题目是:《对等性定律的推翻》。

实验报告在前言中说:“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宣布,在粒子物理方面,最近的几项实验,已造成极为重要的发展,这些实验包括:

(1)排列中原子核的B衰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吴健雄与国家标准局的安勃乐、海瓦特何勃斯及哈德逊等人合作完成。

(2)MU介子内电子衰变的不对称角度——哥伦比亚大学迦久博士、莱德曼教授及文立澈先生合作完成。”

报告特别提到:“上述两项实验,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杨振宁教授提出的。三篇连续论文的第一篇已经发表,题目是:《在弱相互作用中对等性是否不变?》实验的目的,在于对这个问题提出决定的答复——对等性不是不变的,从而推翻了30年来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定律……。”

这就是说,从1925年量子力学创立的时候起,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无可非议的物理学基本定律之一——宇称守恒定律,被两个年轻的中国人推翻了。

讯息传开后,世界各地著名的物理学家们的祝贺和询问,如同潮水般地涌向李政道和杨振宁:

“这个发现,在现代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个发现,可以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887年米契尔逊——摩莱两人证明‘传光的以太’并不存在的实验相提并论!”

“这个发现,为今后建立新的物理学定律扫清了道路!它可以和爱因斯坦打破牛顿力学万能理论相媲美!”

“李、杨的发现,比分裂铀原子的发现要重要得多,因为它说明了物质奥秘的要害!”

世界各国的报纸和杂志竞相刊登关于这个重大发现的新闻。美国《新闻周刊》说:“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认为,这个发现是过去十个忙碌的年头中,物理学上最重要的一项发现!”不久,诺贝尔奖委员会正式宣布,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这一年的12月初,李政道应丹麦A·玻尔教授(A·玻尔教授也是诺贝尔奖得奖者,其父N·玻尔是原子构造的创立者)的邀请到丹麦讲学。8日,李政道和夫人由丹麦同乘飞机去斯德哥尔摩。

两天以后,瑞典皇家科学院音乐大厅里张灯结彩,颁奖典礼正式举行。在诺贝尔奖委员会代表的陪同下,

身穿中世纪服装的武士们吹起了嘹亮的古号角,李政道领先,其后是杨振宁和其他获奖者,依次登上讲台,李政道先用中文然后用英文发表了演讲。诺贝尔委员会的代表们在演说中盛赞得奖人的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代表克莱恩博士在演说中高度评价了李、杨的成就。他说:“两位物理学家由于对所谓宇称守恒定律作了精湛的研究,从而导致次原子粒子方面的重要发现,因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奖金……,这两位获奖者所进行的研究,实际上推翻了 30 多年来被普遍认作是自然基本定律的所谓宇称守恒定律。”

随后,李政道和杨振宁接受了 42000 美元的奖金和金质奖章。典礼结束后,李政道代表 1957 年全体得奖者致答辞表示谢意。

那时,李政道和杨振宁是祖籍中国的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李政道的成就是 29 岁时作出的,就年龄而论,他是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金年龄最小的两个人之一(另外一位是英国的 Bragg,他是和他的父亲合作,共同得诺贝尔奖。)

对故国情深意长

多年来,李政道教授虽然远在大洋彼岸,但他时时都在关注着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动乱的 1974 年,他回来亲眼目睹了“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非常痛心。他曾这样诉说过自己的心情。他说:“考虑到我如果提出从高中直接招收留学生,这在当时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所以就想了理科人才也可以象文艺、体育那样从小培养的办法,估计这是唯一有可能被接受、采纳的建议,于是就提了出来。”后来,根据他的建议中国科技大学办了少年班。如今,李政道教授虽已年逾花甲,而且身体欠佳,但他的刻苦勤奋精神仍不减当年。在不懈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他还为中国办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帮助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另一件事是给中国培养科技人才。早在 1979 年他在北京讲学的时候,就有 CUSPEA(即中美物理联合考试的缩写)的想法。他对中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说:“为什么不派正式的研究生呢?这样做可以得到学位。如果同意派研究生,我可以帮助动员美国民间所有第一流的大学,让他们接收中国学生,资助和培养他们。”回美国以后,他还在牵挂着这件事。一天,他把他所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请来说:“请你谈谈美国各大学招生的程序!”

“噢,这么复杂,我在美国教了 30 年书,想不到招生手续竟这么复杂!”听完介绍,他说。思索半晌,他拿来一张纸,一面划格子,一面用英文写道:“这样吧,今天我为中国物理学生创造一个新的招生办法,不用考 GRE,也不用考 TOEFL,先向招生处申请,这个办法的名字就叫 CUSPEA(即中美物理联合考试的缩写)!”

在这之后,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日夜张罗,自己花邮费、电话费跟美国的各个大学物理系联系,希望他们

接纳并为中国代为培训科技人才。

自那时以来,全中国规模的招生已经办了许多届,这些中国研究生分别在近百个学府从事 60 多项与物理有关的专业研究。在美国,李政道教授不辞辛劳地为这些中国学生操劳。每年开学以前,他和夫人以及秘书爱莲小姐日夜赶送、打印各种有关的报表、材料,分送到美国的有关学校。他们不是一天,而是好多年,从 1980 年到现在,全部是义务工作,未收取中国的任何报酬。对几百名中国留学生除了关心他们的学业外,连日常生活小事也无微不至地关怀。以致他的夫人诙谐地对人说:“过去政道念物理到了入迷的程度,谁如果占他一点时间,他是不干的。现在,为了给中国培养物理人才的事情,他都搞得发疯了!”

人们不禁要问:李政道教授为什么如此热心地给中国培养人才呢?早在 1985 年,在与中国研究生聚合时,他讲了这样一番话。他说:“同学们,请大家考虑,今后 20 年全世界物理和与物理有关的各科技领域,那时候的领袖是从哪里来?”

“有人曾经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在学术界,这句批评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犹太族经过了纳粹多少年的残害,通过他们自己的互相帮助,仍然使很多犹太科学家可以找到新的环境获得发展的机会。日本是另一例子,因为日本人有坚强的互助精神,所以日本能成为今日世界的科技领袖之一。”

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但是,今天我们有一切理由可以确信,中国科学家必然是世界科学领域将来的主要人物。因此,你们必须共同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争取这个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此相聚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科学的将来,就是世界科学的将来。互相帮助,就是帮助自己和帮助你们整个一代。你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后的成功,则必须依靠你们这一代集体的努力。”李政道对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们情真意切地说。

李政道教授对祖国的一片深情,还表现在他对故乡苏州深沉的眷恋。他的父亲李骏康客死在日本东京,在台湾的母亲张朋璋叮嘱他务必把父亲的骨灰送回故乡苏州安葬。遵照母亲的意愿,他把父亲的骨灰安葬在苏州一片长满苍松翠柏的山坡上。

1983 年 2 月,他的母亲在台湾得了急病,闻讯后他立刻飞越重洋赶到台湾,不幸的是到达时他的母亲已经病逝。慰病之行成为奔丧。这年的 3 月 2 日,他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从台湾护送母亲的骨灰回故乡苏州安葬。这是台湾政府首次允许将旅居海外华裔亲属的骨灰送回大陆安葬。李政道亲自带着母亲的骨灰来到苏州,苏州灵岩山的早春季节,满山梅花盛开,遍山新绿。过后,李政道在给他二哥李崇道的电文中,表达了

他把父母骨灰安葬于故里，心意圆满的情绪。电文说：“葬礼是在晴朗天空，庄严和爱戴气氛中举行的。”“到落葬时，发现周围的梅花开了，母亲在九泉下会笑的。”

李政道在故乡苏州埋葬了亲爱的母亲的骨灰，过了些日子，他又匆匆踏上了旅途。无论走到哪里，那姑

苏乡亲的话音，那秀美山川的景色，都使他永怀心田。为了表达对故乡人民的感情，每年他都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一些钱来，奖励苏州考试成绩最好的前5名中学生。

(上接第79页)好一座前廊后厦的宏伟会堂。它难道是一个两个百几十人的原始村落所拥有的吗？不。考古学家说，在原始社会，这样大的建筑是十分罕见的。它应当属于一个庞大部族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中华民族原始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峰颠标志。我想既然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中心，这巍峨大厦的顶上还会有一面图腾希腊飘扬。这该是什么图腾呢？龙？龙是河南仰韶原始人的图腾。鱼？鱼是半坡氏族的图腾。它们都比大地湾文化来得要晚些。是凤吗？对，应该是凤图腾。

凤图腾，黑红勾勒，红色涂染，就象彩陶的颜色，画在几十张兽皮缝制的大旗上。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造型，使那振翅奋飞的火红的凤鸟更具象征意义。

于是，我又想起伏羲。“凤”的大旗当属于他。

明代李贽著《史纲评要·三皇五帝纪》载：“帝生于成纪，以木德继天而王，故风姓。有圣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人生之始，茹毛饮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网，以佃以鱼，以贍民用，故曰伏羲氏，养六畜以充庖厨，且以为牺牲，享神祇，故又曰庖牺氏。”这段记载说明伏羲的姓氏——风。“风”姓之说是远古社会“图腾”的抽象化。在古代“风”“凤”相通，因此可把伏羲看成是一支以凤鸟为图腾的部落集团的化身。

伏羲的传说在先秦以前就在这片黄土地存在。在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传说便是历史的载体，史事的纪录。到了西汉这里始设以“成纪”为名的县置，以后的北周、大唐都在这带建置成纪县。唐亡之后因成纪地陷吐蕃，城毁，移治秦州(即今天水)。历史上成纪城虽

有几次变迁，但最早建置的成纪却在秦安县北面距大地湾仅二十里的地方。大地湾的地理位置恰与“羲皇故里”的传说，史家考证大体一致，碳14测定又为我们界定了那个人类亘古文明的伟大历史时期。因而我们能否说大地湾规模宏大的原始文化遗址当属于伏羲氏的生活圈呢？“一画开天”的伏羲部落，在生吞活剥的原始社会里，率先开拓了织网捕鱼，驯养动物，种植谷物的农、渔、牧并举的经济，创造和发展了烤、炙、蒸、煮等各种方法，分火种于私人，建立家庭的雏形，从而使原始生活发生历史性变革，于是整个部族变得很强盛。他们修建起这样堂皇富丽的殿堂，在这里召集会议商讨狩猎稼穡，举行隆重祭祀神祇的大典，公布财物分配处理诉讼纷争，嘴唇上涂了牲畜的血举行庄严神圣的盟会，为了战争，为了生存和发展……

天水伏羲庙那是元代才有的。庙中主殿“先天殿”塑着一尊伏羲神像。他粗眉大眼，赤足赤腿，腰间系着树叶缝缀的短裙。他憨厚朴实，强壮而智慧。他身上无丝毫神的气味，而是一个中华民族原始先民的纯厚形象。我觉得他简直就是领着大地湾这一块东方时空早已消逝，但七千年前却真实存在的村民们到长春梁背后的森林里狩猎，到倒淌河里网鱼，到那一马平川里用木棒石刀耕翻土地播种谷物的慈祥 and 善的部落首领。

已是日薄西山时，浓浓淡淡的浮云在天上涌动。西边天际的轻云给夕照拷贝似的映着，变成桔红。桔云随风不断变幻形状，将我的感觉也变成了幻觉，于是伫立在长春梁上的我，分明看见那一面“凤”图腾裹着流火流火的暮色在遥远天际飘扬。

炎黄春秋杂志社首届理事 会名单

- | | | |
|-----------|--------------|--------------------------|
| 理 事 长: | 杜导正 | (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
| 名誉理事(单位): |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 |
| 副理事长: | 贝兆汉 | (广州白云山集团公司总经理) |
| | 李广尧 | (黑龙江省广泰实业公司总经理) |
| 理 事: | 白亚南 | (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总经理) |
| | 蔡道峰 | (广东潮州市振园运通仪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
| | 林春露 |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工会主席) |
| 秘 书 长: | 徐 孔 | (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经理) |



我与505元气袋

●陆 丽



陆丽：国家体操队女队队长。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15岁的她，在高低杠比赛中以10分的满分成绩获得金牌、平衡木银牌。全国体育十佳运动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南省劳动模范，著名运动健将。

我小时候身体弱，常闹病，爸爸妈妈整天为我身体发愁，5岁上就送我去业余体校练体操，编着法儿让我的身体棒起来。训练很苦，每天要承受着超负荷运动量，再加上吃饭没有规律，以致胃口不好了。9岁上转到省队训练，熊教练专为我设计了

一套高难度高低杠动作，不下苦功夫绝对完不成，累得吃饭胃疼，上杠腰疼，多次医治，时好时犯。为了奥运会的需要，除了练规定的动作，还要加练自选动作。这种大运动量的训练，是常人承受不了的，每天要从2.5米高的男子单杠反复跳上跳下，天天无数次地练这落地一站，站稳了还练。腿、肩、腰疼痛难忍，教练让休息，可是，正在迎接奥运会的节骨眼上，怎能休息呢？稍一停，技术恢复起来就难了，“技巧技巧，熟能生巧”，我体会最深。

正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咸阳保健品厂的来辉武厂长，给我们运动队送来了505神功元气袋，我先戴上试试，这一试可就摘不下来了，戴上它睡一宿觉全身松快多了，疼痛减轻。一次我得了肩周炎，硬是抬不起胳膊来，经按摩、电疗都没有多少好转。我打开一个505元气袋绑在肩上，同时，肩、腰、肚脐共用上三个，不久病好了，我高兴极了。在奥运会上，505帮了大忙，打这儿以后，它成了我的生活伴侣，难舍难离，戴上它，有病医病，无病防病，真是良师益友。

咸阳保健品厂与国家体操队结缘，我的不少教练和队友都得益于红裹肚，只是药品太少了，希望厂家再多提供给我们队些505元气袋，让每位运动员都戴上，在大赛中夺取好成绩，为咱们国家增光。

附第六期要目：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
政治风波中的胡乔木
王安石冤案再曝内情
「江青服」出笼的台前与幕后
毛泽东为刘胡兰两次题词的前前后后
外国监狱里的中国女犯
游说于现代商战中的神秘女性
大汉奸汪精卫死因之谜

帐号 032-066117-51

开户行：北京工商行地安门分理处

户名：炎黄春秋杂志社北京发行部

春秋杂志社北京发行部郭小姐，批销款到发书。

邮购请寄：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100802)炎黄

春秋杂志社北京发行部郭小姐，批销款到发书。

由于特殊情况，本社尚存1995年第六期刊物数千册。

这期刊物96页，印制精美，内容翔实，具有较强的资料性和保存价值，欢迎读者邮购，欢迎集体、个人和国营的书刊

经销单位联系批发事宜。邮购每册2.98元，另收10%邮

费，批销100册以内70折（不低于50册），500册以内50

折，1000册以内45折，邮寄费用一律由我社负担。



启事

邮购·批销

炎黄春秋



根之深——李政道与中国

耿飚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关头

关于《黄药眠现象》

西蜀沉戈——蜀广文南军起义纪实

原始村遐想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